爱将人连接，而自由使人分离。二者如何共存？这是今天所有恋人面对的两难境地。作者帕斯卡尔·布吕克内透过婚姻与爱情的各种变体，对浪漫激情与结婚的挑战，性解放与摇摆的忠诚，以及爱情给人带来的快乐与痛苦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剖析出爱的各种悖论，对爱这一永恒的话题作出了全新阐释。

上架建议：人生哲学
ISBN 978-7-5675-7633-9
9 787567 576339 >
定价：58.00元
www.ecnupress.com.cn

责任编辑 / 高建红　装帧设计 / 姚 荣

VI HORAE

爱的悖论
Le paradoxe amoureux

［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著　董子云 朱珣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3

轻与重
63

爱的悖论

［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著　董子云 朱珣 译

姜丹丹 主编



Pascal Bruckner

Le paradoxe amoureux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主编

爱的悖论

[法]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著 董子云 朱珣 译

Pascal Bruckner

Le paradoxe amoureux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部分　救赎大梦 / 1

第一章　心灵的解放 / 3

第二章　诱惑市场 / 26

第三章　我爱你:被爱冲昏头与俘获芳心 / 51

第二部分　田园牧歌与时序 / 71

第四章　恋爱结婚的庄严挑战 / 73

第五章　摇摆的忠诚 / 94

第六章　共同生活的乐趣与奴役 / 115

第三部分　肉体的奇迹 / 135
第七章　性革命是否发生过？/ 137
第八章　厄洛斯行将破产？/ 161

第四部分　爱的意识形态 / 183
第九章　以温柔进行迫害 / 185
第十章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拖鞋 / 206

尾　声　别为表现真我而害臊！ / 223

引　言

巴黎，70 年代初：在左岸的穆夫塔尔街区，一座另类的幼儿园私自开张了。幼儿园免费开放，注重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父母的参与。那时候，我每天都带儿子去。几个月过后，幼儿园支撑不住了：成人们在一楼懒塌塌地待着，有的做爱，有的吸烟，由着小家伙们闹去。大的欺负小的，孩子哭得稀里哗啦，没人给擦鼻涕，没人给擦屁股。玩具和药品常常丢失。少有的几个负责的父母逐渐开始将他们的孩子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幼儿园里了。这个另类的幼儿园，终于在一片混乱和争吵中关了门。不久之后，我去了克里斯杰尼亚，一座位于丹麦哥本哈根附近的自由城。在那里，我参加了一个集体农庄式的煽情晚宴，十几个耶稣发型的壮男和他们披着金色长发的伴侣围坐在桌边，可爱的小男孩、小女孩们站在桌子上乱蹦乱跳，大喊大叫，互相揪打，脚踹在盘子里：奶酪、土豆泥、火腿被甩得漫天

飞。父母们则对此视若不见，有的忙着卿卿我我，有的“自娱自乐”渐入佳境。实在被吵得烦了，大人们干脆纷纷离桌，由着小东西们闹去。没有了责罚，孩子们反而觉得没劲。这时候要是来扇个大嘴巴似乎最合时宜了。

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人，回头再看，会觉得那是一个无比慷慨的时代，混合了天真与荒谬。一种无穷的潜力随时等待被释放：没有禁忌、没有疾病能够束缚这股冲劲。经济繁荣，各种禁忌遍身蛀洞，纷纷倒落。这一代人，感觉自己注定生活在可憎的世纪，因此怀抱有形形色色的创举。彻底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地球翻转成不可思议的乐园，语言文字有了新的含义。我们将自己与前人划开几个世纪的距离，再不要重蹈覆辙。性的解放成为接触非凡的最平凡方式：每个早晨创造出新的生活，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的旅行胜于地球表面的旅行。即便在最遥远的国度，也有人敞开胸怀等待我们的到来。自由的感觉，沉醉，没有边界。世界是我们的朋友，要好好待他。

时代鼓励人们释放欲望，幸福就是激情的投注，并使这激情立即得到满足。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希望成为生活的先锋。人人来者不拒，探索内心最深的奇想。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不可思议的艺术多样性、音乐、文学，都是这个天真年代的产物。

是什么将美好的感觉击碎？艾滋病的出现、资本主义的残酷，还是伦理秩序的回归？更简单的答案是：时光不再。我们的存在只有一个季节：永恒的青春。生活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我

们就这样老去。曾经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精疲力竭。与其说这是一场革命，不如说这是一次历史进程的圆满谢幕。被连根拔起的禁忌没有再像狗牙根一样疯狂地生长。这个时代取得的进步是不可置疑的：妇女地位的改变、避孕、离婚、人工流产的合法化、大量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六七十年代制造出最奇特的概念：自由的爱。长久以来，它意味着混杂、身体的交换和轻浮的性行为。现在，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把它当作一个完美的矛盾体去解读。它体现了归属与独立的不可调和。这一新的状态影响着所有人，无论我们所处环境、思想意识和兴趣爱好有何差别。究竟如何让依恋的爱情和独立的自由共处？

关于爱，多种论调汇成了两个主要的观点：一边是“惋惜”派，另一边是“颠覆”派。惋惜派认为，爱的真谛早已消失在行吟诗人和浪漫主义作家之间的某个时代；颠覆派则相信，只有当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浮华，挣脱最后的枷锁，真爱才会到来。由此也产生了两种方案：一个要重建，一个要推翻。一个要抹除可耻的 60 年代，恢复传统家庭观念，夺回赋予妇女的权利；另一个则完全倒过来，要将夫妻制和嫉妒扫入历史垃圾堆。就这样，我们得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落后要么向前，要么困厄要么挣脱。好像爱成了一种疾病，必须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赶紧进行医治；好像我们要为我们爱的方式道歉。

必须得承认，在爱这个论题上，想一下子彻底掀翻旧的观念

是行不通的：婚姻、家庭还有对忠诚的要求，都仍旧存在。但是，维持现状也是妄想。就连最落后的思想也已经在骚动中受了影响；人们常常对社会的新风尚感到惊奇，甚至反感；令我吃惊的，则是风俗在经历了那么多改变之后，仍然持久存在。这是一代人的奇特旅程：他们本想改革人心，却发现了一连串不可触碰的规则。如今的人们既不想革命，也不想重建。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尘埃落定，它既不会回望过去，也不展望未来。谈不上超越，只是移动而已。

这本书写给那些拒绝被要挟的人们，他们不会错过老的激情剧场，也不会拒绝新的改变。与保守者不同，他们庆贺得到的权利；与激进者不同，他们不为自己的过时趣味感到不安。诚实地说，我们一直在逃离的旧世界已经再次把我们抓住，其情形甚于抒情诗的年代。我们成了受挫的浪荡子、浪漫的好色之徒、多愁善感的享乐主义者，在忠贞不渝和红杏出墙之间挣扎。满心陈旧的嗜好，满口革命的宣言。

爱的自由，是斗争的果实。曾经付出的代价，应当记得。(应该写一本书，专门讲述黑色的60年代)自由，不是懈怠，而是更多的责任。它不能让人变得轻松，反而加重负担。与其说它解决问题，不如说它引出了更多的悖论。如果这个世界有时候看上去有些粗暴，那是因为它被恢复了自由之身。个体的自由在面对他人的自由时受挫，受到伤害。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限制。这副沉重的担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

今社会中持续演播的浪漫旋律。

结果令人费解：我们都向爱伸手，要求的太多。爱让我们快乐，爱让我们受折磨，爱让我们得到救赎。没有别的文化像我们一样，赋予爱那么多的期待。基督教世界里爱神的存在，将爱诠释成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数不胜数的救世主降临说从此衍生出来，虽命运各异，却皆把爱捧上尊位。这证明，情感，一旦成为一个政权或一个机构的追求，就会变得如炸弹一样危险。当爱被解放出来，它就显现出全部的面目：一面光彩照人，一面猥琐卑劣；高尚又无耻。

第一部分

救赎大梦

第一章

心灵的解放

我疯狂地爱着女人，但我更爱自由。

——贾科莫·卡萨诺瓦

上帝啊，从前我爱你胜过爱自由。现在，自由在我心上的分量是如此之重！

——莫泊桑，《如死一般强》

1860年，反对拿破仑三世的雨果，流亡在盎格鲁-诺曼底的岛屿上，他前所未有地将思想的自由和爱的自由联系在一起："意识自由的两个方面：一个回应心灵，另一个回应头脑。我信仰什么神，我爱什么样的女人，别人无权知晓，法律更无权过问。"[①]雨果

① 维克多·雨果，《随见录》，1849—1885，Gallimard出版社，Folio系列，第410页。

认为，资产阶级婚姻是一场不幸的奴役，他写道："你爱的男人不是你的丈夫？很好，去找他吧。当你不爱一个人，你就是他的妓女；当你爱一个人，你才是他的妻子。性的结合，只遵循心灵的法则。自由地去爱和思考吧，剩下的留给上帝去处理。"①雨果为不忠而兴奋，向夫妻制提出了大胆而正当的抗议，他鼓励妇女逃离没有爱作为基础的婚姻坟墓。②

（1）爱需要被重新创造（阿尔蒂尔·兰波）

雨果站在反抗者的阵营里，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从大革命前的哲学家们、乌托邦主义者夏尔·傅立叶、无政府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戴花嬉皮士，直到精神病学家威廉·赖希，这些反抗者们一直试图将爱放入自由解放的大事业中。启蒙运动学者相信：爱与美德、肉体的快乐与精神的升华，是可以相容的。只要能够去爱，就能向伟大看齐，引领他人一同走向进步。卢梭认为，意识的高度透明与相互呼应，印证了人性的美好、道德的

① 维克多·雨果，《随见录》，前揭，第112页。

② 讽刺的是，1845年7月，刚刚被路易-菲利普提名为法国贵族院议员的雨果，被当场抓获与蕾奥妮通奸。蕾奥妮的丈夫，一位官方画师，命令将妻子关进监狱；而贵族院议员的身份使雨果免于牢狱之灾。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更加离奇：阿黛尔·雨果，大诗人的法定妻子，本身也是个用情不专的女子。她更关心的是如何对付丈夫的老情人朱丽叶。阿黛尔成功地将蕾奥妮从监狱里解救出来，没过几个月还邀请她来自己的沙龙作客。

升华和情感的相通。在《新爱洛伊丝》中，卢梭驳斥了风流献媚和装腔作势的礼貌，要还爱以本来的天真纯洁。完美的爱情可以让人类自我超越（贝纳丹·德·圣皮埃尔），这种说辞，至少在大革命初期，在1789年的众多事件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一切重新开始，"净化直至心灵"，就像弗洛雷亚城①里那个名叫毕罗·瓦海纳的人宣称的那样。改变本性，解剖刀一直深入我们的内心规则。两个世纪以来改革家们的雄心壮志是：使爱再生，从爱中再生。揭掉丑陋的面纱，还爱以最初的使命：让人类热忱地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大家庭。卢梭对此发过美丽的誓言，他曾不遗余力地这样预言母性的美好未来：

> 我敢于向伟大的母亲们担保丈夫们的忠诚、子女们的温顺、公众的尊敬、幸福而顺利的孕产、健康并且精力充沛的身心……只要母亲精心地养育孩子，风俗自会变好，自然的情感会在每一颗心里被唤醒；国家的人口也会越来越多。②

① 城市名，Mona Ozouf，《再生之人》（*L'Homme régénére*），Gallimard出版社，1989，第142页。

② 卢梭，《爱弥儿》第一部，Garnier-Flammarion出版社，第48—49页。关于欧洲新的哺乳方式、新式的夫妻温存，以及出生率问题之间的联系，可以阅读Edward Shorter撰写的《现代家庭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famille modern*），Points，Seuil出版社，1977，第227—229页。Shorter认为，卢梭在《爱弥儿》中阐述的观点只不过是当时社会已有观点的总结。

费奈隆(Fénelon)在《泰雷马克奇遇记》中写道:"所有的灾难加在一起,也没有爱可怕。"经历了古典时期对于激情的批判之后,18世纪发生了一场亲密情感的革命。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亲情眷恋将父母与孩子联系得更紧密。家庭变成了情感实验室,为社会契约的形成奠定基础①。过往时代积淀的炉渣,经过重新炼造,可以变成美德,将人类从野蛮推向文明。

这种想从头到脚重新造人,从里到外重塑社会的愿望,在20世纪后半期,又加进了性来助阵。性,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辅助药品;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替代药方。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一直想构建"一间人性修复工作室"(弗朗西斯·蓬热),还爱以本来的面孔,以此为基石垒起一个装满亲情与爱情的社会。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疯狂的理想。

(2)性高潮的拯救

针对资本主义的心胸狭窄和浪漫主义的过分腼腆,产生了两种反驳的声音:有人提倡专一的爱情,有人赞同快乐的出轨;

① 除了上面已提及的Shorter的研究之外,还可参阅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Plon出版社,1960。(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译注)

一方面,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1884年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推崇的幸福的一夫一妻制将获得最终胜利,从而结束对女性的奴役,根除通奸与嫖娼。另一方面,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艾米尔·阿尔芒(Emile Armand)在1914年之前,就提出了"爱的同志情谊"这个概念,提倡"性"的多元制,鼓励人们摆脱虚伪心和嫉妒心。

将希望寄托于一场关于人性的新教育,结合卫生、快乐与爱慕,将身体从教会和资本的双重禁锢下解放出来,摆脱教士虚伪的祷告,摆脱老板强压的工作节奏和时钟的独裁。这里就涉及到要重新划定"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莫娜·奥佐夫[Mona Ozouf]),还赤裸以亚当式的纯真。最初的基督徒认为,性是一只需要被锁住的野兽;而如今,性成为了一只需要被释放的传奇神兽。从宗教异端到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人们坚信欲望的美好,只有它能拯救社会的丑陋。揭示了文明下面肉体基石的弗洛伊德、去美国执教的赫伯特·马尔库塞①,还有1957年在美国去世的德国共产党员、特立独行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②,共同将这种普罗米修斯重建式的战斗精神推向高潮。拒绝将社会革命与个人革命区分开来,坚持"性生活不是一件私

① Herbert Marcuse(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出生于德国柏林,1940年定居美国。——译注

② 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译注

事①”，赖希做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终其一生寻找着逃脱“人类奴役体系”的最佳方法。只有充分享有快感，才能让人们接受自己，摒弃那些幼稚的消遣，如色情出版物、侦探小说、恐怖故事，还有对上级的服从，这些行为都与恐惧有关，是一种挫败感。“专制的机械文明”、宗教的神秘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压迫，在每个人周身筑起了一副“情感的盔甲”，它扼杀了生的乐趣，阻碍了人的成长。情色快感中的压力释放正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北极光只不过是一种宇宙的性高潮），只有它能够结束“对元首的盲目服从”，让占有欲、癌症、专制和暴力逐渐消失。

性革命不是性器官骚动的改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它是一道历史的分水岭，将我们从史前带入史后。赖希引出了一种建立在救赎空想上的生物功利主义，正如圣宠之于加尔文主义，性高潮是一道赎罪的大门。这种肃清一切的力量是让我们远离政治或身体疾病的万灵丹：“人民在性方面的幸福是社会安定最好的保障。”②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它是孤独的，就像希腊文化中的宇宙和气候运动一样。最重要的环节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里进行。那里是美丽的花园还是压抑的地狱，这取决于我们自己。因为痉挛中穿越身体的这股生物能量正是点燃生

① 威廉·赖希，《性革命》，哥本哈根，Sexpol 出版社，1936；巴黎，Plon 出版社，1968。

② 威廉·赖希，《性革命》，第 302 页。赖希提倡，文学与电影中有关性的表达应该是进步的和理性的。

命，推动星星运行的动力。（晚年的赖希在美国流亡，遭到 FBI 的骚扰，他动手制造一种试图捕捉“奥根”射线的奇怪机器，即一种能够在沙漠制造降雨的破云机。）大地变和谐还是变混乱，完全取决于你快乐不快乐：傅立叶发现人类交配与星球交并的相似性，他在银河中看到的是一片巨大的发光精液。如果人类在拥抱中投入双倍的激情，许多新的星系会由此诞生，它们会像泛光灯一样照着地球，这样不费几个钱就可以解决照明问题。萨德曾将性快感比喻成火山爆发，将纵欲者的冷漠比喻成冷却的熔浆。

60 年代，这些作家被重新发掘出来（还有某些千禧年宗派的启示），性登上大雅之堂，被赋予救世的身份：通过它，以混乱的方式表达出的，正是人类之谜。爱神厄洛斯搅起的波澜，被假正经的人指为不知羞耻的躁动，而历史学家鲁日蒙①在 1961 年将爱的欲望称为“灵魂的起义”，就是要以堕落为工具重造天堂，重塑一个新的夏娃，一个新的亚当。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清晰表达的想法，我们的祖先早已结结巴巴地说出。他们之中最优秀的，曾是我们的先驱。如今，我们走入了那座王国，走入了人类最重要的时刻。曾让人类羞耻的事，变成了光荣的、需要捍卫的事。勃起是一种反抗，兴奋的身体撞翻强制的秩序，欲望是非常道德的。无需再求救于弗洛伊德关于升华的旧论，本能自身就

① Denis de Rougemont（1906—1985），瑞士作家，欧盟思想的先驱。

是高尚的，它包涵了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既然性冲动是恶的根源，那么我们将通过做爱来变好。性交既是一种对社会的反抗，也是人类本性的释放。众先知深入探索自由解放，兴奋溢于言表，大放厥词、争论不休。

如今，人们又提出了启蒙运动时代曾提出的质疑：爱只不过是一张欲望的面具，一个人类用来掩饰贪婪的谎言。罗伯特·穆齐尔[①]曾说："爱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性和友情。"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将矛头直指"想要被爱的无耻欲望"。感情坐上了被告席，要想被无罪释放，它必须放弃优势地位，满足于它在新脚本中的小角色。从此禁止再使用"我爱你"这句老话，取而代之的是唯一的真理："我要你。"歌颂裸体，歌颂人最宝贵的财富：身体——物质主义唯一的真实。压抑会引发神经紧张和病态反应，破例的许可永远也不及放纵。五月风暴[②]继承者的过分举动远不及他们父母的约束丑陋。对于各种形式的诱惑，包括乱伦和恋童癖，那个年代都给予宽容的态度。人们确信，在性方面，孩子拥有与成人一样的权利。稚嫩的言语掩藏的是并不纯洁的行为。人们决定要一鼓作气让爱脱离家庭的禁锢，重塑家庭，重塑教育。钟情于传统的人被指责为叛徒。不允许有怀疑：这个时代已经找到解决情感苦痛的办法，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社

① 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

② 指1968年春天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

会苦难的出口。

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是一场说教式的革命，其形式如同18世纪产生的艳情小说：各种色情与堕落都被转化为用来推翻旧秩序的革命论据。我们太不了解那个时代近于宗教式的雄心，一方面，从拉辛到普鲁斯特，它要将这场可怜的情感闹剧扫入历史垃圾堆；另一方面，它要开启一段史无前例的探索。马尔罗将巴黎公社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比喻成"愤怒的田园派"，一种以暴力为代价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从那以后，一切都"政治化"，即便在今天，左右派之分仍根深蒂固，萦绕寝侧。教会和婊子划归右派，鸡奸和同居合约划归左派！这个时代怀揣着一种信念，并坚信它的优越性：世上没有悲剧，只有不良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构成主义是西方思想的典范，在今天的风格理论中可见一斑）。六七十年代的人，膜拜爱神厄洛斯，在摆脱了审查、神甫、政治专员和资产阶级之后，他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对"性欲经济学"（让-弗朗索瓦·利奥塔[①]）和"欲望机器"（德勒兹、加塔利）的赞颂。每个人从中寻找自己的真理。彻底的颠覆：一度遭质疑的快乐变成了强制性的快乐，谁要是扭头拒绝，就会被怀疑患有严重疾病。取代昔日禁忌[②]的是性高潮这种新的恐怖主义。厄洛

① Jean 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法国哲学家。

② 此处请参看《新的爱情放纵》(*Nouveau Désordre amoureux*)，由 Pascal Bruckner 和 Alain Finkielkraut 合著，Seuil 出版社，1977。

斯曾被旧时代的人奉为神，在现代人这里，他要把我们变成神。

降半调来看：不带偏见地读一下六七十年代未删节版的萨德侯爵[1]的作品，那些狂热信徒应该可以将热情降降温了。这位失势的贵族，无度的放纵者，从旧王朝到帝国，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待在监狱里。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关于专制、野蛮和屠杀的情节。萨德制造的真正丑闻，不是他的极端淫荡，而是他在启蒙运动旗帜上插的这面黑色旗，是他的悲观主义，是他以一种凶恶的方式确认了宗教对于性的看法：性远非中立之物，它直接导向凶残的行为。《闺房哲学》中的人物说："没有人在勃起的时候，不想成为暴君。"只有萨德，懂得"没有束缚的快乐"：快乐直到别人的毁灭。欧洲挥舞着萨德的旗帜，性联合了色情放纵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了立法者，一种以强凌弱，直至上演灭绝政策的立法。这个快乐昏了头的时代，除了一个巴塔耶和一个布朗肖，只生产出了神圣的萨德侯爵圣绪尔比斯修会式的作品：萨德是古怪句文的承前启后者，是在烟雾和飘忽音乐中做爱的长发青年的先驱。

(3) 情感的诡计

我们从这些传统中继承了很多令我们困惑的东西。没有

① 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尤其以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译注

这些先锋人物，没有这些高尚的疯子，这些面对牢狱、流放和禁令毫不畏惧的勇士，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60 年代是实验的十年，人们通过音乐、毒品和旅行，发明了新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在这方面很有必要做个总结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消除一个误解：情感不但在厄洛斯狂热支持者的狂轰滥炸下存活了下来，它甚至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力量。1968 年 5 月，在运动正沸沸扬扬进行着的时候，当时还是修道院长的未来红衣主教鲁兹提彻(Lustiger)来到索邦大学。在一片反对的喧哗声中，年轻的神甫这样说道："乌七八糟，完全背离了福音。"相反，正如莫里斯 · 科拉维尔[1]和他的朋友们所认同的那样，1968 年的五月风暴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一场精神的起义，它重新燃起了人们通过善和团结来拯救世界的梦想。科拉维尔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指头试图想要堵住一个开着的水龙头。水龙头，是神圣精神的象征；手指代表反抗的力量；溅出的水点则是这场对抗产生的奇迹结果。永远也不要全盘相信事件参与者们的言论。他们庆贺欲望的绽放，却给福音的爱戴上了胜利的光环：没有击退，反而加深。有了血肉的心灵能够更好地开屏。

这就是情感的诡计：每一代人只能担负一个有限的历史角色，过后才发现，他们的行动和初衷背叛了他们，南辕北辙。情

① Maurice Clavel(1920—1979)，法国作家、记者。——译注

感谎言的猛烈抨击者，糊里糊涂地亲手托起了情感的复兴。五月风暴使性得到平反，但同时也为爱开启了新的道路。1977年，罗兰·巴特认为，相对于性，爱将被视为一种非法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也不能卖俏地说："我们俩比萨德侯爵更猥亵。"①遭到否定的不是爱，而是利用爱来束缚女性的父系社会秩序。棒打的是面具，不是内心的理想。尺度夸张的有关性欲的巧辩，成就了情感的神圣化，它安全闯过了那个要将它灭绝的计划。

我们拯救了爱，就像拯救了一个沉睡的公主。我们同时也将个体从传统、宗教和家庭的假面中解放出来。爱的拯救与个体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从此，个体从集体中解放出来；从此，工资制开启了个体自主的新篇章，让人们开始关注情感的质量，尽情地赋予它更高的价值。从此心灵的法则高于宗族的法则，个人不再畏惧社群的压力。在初生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欧洲开始了一场情感革命。第一次，大众拥有了从前王子和诗人才有的

① 罗兰·巴特，《恋人絮语》，Seuil出版社，1977，第207—211页。在1975年出版的《RB》一书中，当巴特与他的毛主义同志结束了中国之行后，他这样写道："中国人，每个人都在自问（我是第一个）：中国人的性生活在哪里？……我想……我们所说的性，是社会压迫的产物，是人类糟糕的历史产物。"（第167—168页）在2009年首次出版的巴特的《中国日记》中，我们才明白他并不是这么想的，当年的中国之行其实让他非常害怕。用带着糖浆的过时杂志的口吻对性做出肯定，这样的举动比萨德更具有颠覆性。把性解读为糟糕的历史产物，对于一个左派著名学者来说，不是为了欺世，就是为了享受逆着时代潮流前进的感觉。

特权：高尚的情感。只有在个体自由的社会中，爱才能获得自由。但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自由意味着独立（不屈服于任何一种权威）、时刻准备（对于各种机遇都持开放态度）、主权（将自己的快乐强加于他人）和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以上有三项不符合两人共同生活的关系。所以，今天的男人和女人受制于一对相互矛盾的准则：一方面热烈地去爱；另一方面，如果可能的话，在保持自主权的前提下被爱。我们期望爱人双方拥有更多弹性空间，和谐共处。

我要求另一个人选择放弃自由，我自己也做出同样的承诺。但我是一个狡猾的俘虏，我希望能够随时重获自由。如果爱的快乐就是失去自我，那么自我的快乐就是永不自失。这是现代小说用滥了的悲喜双刃句。世间的男女，害怕自失、害怕被欺骗，又想要感受爱的颤抖。于是现代爱人之间产生了这种可怕的关系：互相寻找，彼此逃避，一场交织着激情承诺和迅速抽身的芭蕾。法国社会学家辛格里（François de Singly）给现代婚姻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一起自由"：支持稳定的婚姻，但不能以妨碍个人价值实现为代价。早在20世纪初，罗伯特·穆齐尔就指出搭档一词取代夫妇的重要性：合约关系可以通过双方的协议来取缔。其实这是经济模式的延伸：每个人从此都将自己当作一个小公司去经营，心的业务占据最显眼的位置。人们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感到了种种新约束的重量。尤其是女人，她们从此要在事业、爱情和家庭三方面都获得成功。人们开始将亲密的情感关系嫁接在

劳动力关系上：投资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这种自由的经营模式给现代社会戴上了虚伪的面具。退却和付出参半，一种很难掌控的剂量。梦想一种永不越界的关系：我喜欢你，我要你；我厌倦你了，我抛弃你。人们把彼此当作产品来试用。

相爱的人都说两种语言：依恋的语言和自由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叠加在一起，让爱的关系变得既扣人心弦又单调无味。在巴黎，有三分之二的婚姻以离婚收场；在外省，离婚的比例达到二分之一。重组的家庭越来越多。爱情关系是一种机会，但也让我们窒息。既要冒险，又要自我保护：这就是现代人的要求。这种追求快活的文化，成为瘾君子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性不足是病，性过度也是病。从香烟到电脑，都为人们反对病态依赖提供了口实。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它在宣扬快乐的同时保持怀疑，它认为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毒物癖的模式。与追求共同解放的60年代不同，此时人们更急于将自己从他人的阴影下解脱出来。

(4) 自相矛盾的指令

个体的窘境：想要只以自我为基点，却焦虑地寻求着周围人的认同。想要像前嬉皮士杰瑞·鲁宾[①]一样宣称："我要足够爱

① Jerry Rubin(1938—1994)，美国社会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译注

我自己，才能不依赖别人而快乐。"这句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却让人联想起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另一句话："自由，就是感觉与他人互不亏欠。"唯我论行不通，屡屡受挫。不需要任何人同时意味着没有人需要自己，自给自足的高傲伴随着孤独的恐慌，一面渴望与众不同，一面又疯狂地模仿着他人。来看看愤世嫉俗者的苦恼：一面展开诱惑，一面痛斥诱惑；一面恳求人们的赞许，一面蔑视他人；将对伴侣的渴望隐藏在冷漠的外表下。他必须存在于世上，然后批判这个世界。如果世界背离了他，他便在这冷淡中读到了自己诊断的正确性。他预言，大众都怀揣着坏心。

至少在民主体制下，我们可以自由地爱我们所爱，自由地拥抱自己选择的性对象。然而总有一刻来临，需要我们承担风险：他人可能搅乱我们期待的脚步，将我们从凄凉的独处中解脱出来。独立不是人类最后的言词，爱可以让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盲目的信仰。地球上最深的苦难莫过于失去最亲的人，没有他们，生活既无意义也无滋无味。如果说人类的命运是无聊和痛楚的，那么爱不应该是我们最后的语言，个人主义才是。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两种指令，一直在将爱的选择自由(巨大进步)和个体的自由混淆。一方面，配偶间建立起一种超越孤立个体的团结；另一方面，自我又跳在前面，形成并列孤独的危险。如果存在一个现代的梦(与世界一样古老，如今终于得到了广泛认同)，那它一定立足于这个双重的期望：做自己的主人，同时享受与他

人相依为命的快乐。

另外，人们也不想失去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建立的友谊，正如美剧《老友记》或《欲望都市》中所展示的那样：朋友间多元的亲密关系被放在了比情侣关系更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直到成年还维系着朋友帮，拒绝让职业生活破坏掉中学或大学时期的朋友关系。我们想维系这些小团体的存在，它们见证过青春的团结和荒唐。我们拒绝将好朋友和法定配偶对立起来。爱是一次探险，我们不想缺席，但前提是它不会阻碍我们进行其他探险。简而言之，像一群大孩子一样，我们想得到一切，正反面都要。既要在一起，又要不依赖任何人，这就让科技有了用武之地。电话就是这样一种单身者的伴侣，它使他既和所有人在一起，又没有和任何人相处。网络、手机，这些用来打破孤独的工具，不但巩固了孤独，还将它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这句著名的话最能恰当地表达出女人的心声。长久以来，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受制于统治制度，关于爱和母性的选择，都要听命于人。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没人想要，那这种归属又有什么意义？任人欺凌的性对象固然可悲，而无人问津的境遇也让人神伤。一味追求自我归属的我们，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得到。结果令人费解：为了保住自由，不得不放弃爱情；或者，为了保住爱情，只能放弃自由。

(5) 旧的世界没有死

风俗的开化，有利于女性的解放；欲望当先，身体的流通更顺畅；人们从小就开始接受性教育，以及关于性传染病的知识。除了少数还受父权传统控制的地方，绝大多数婚姻有爱为基础。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可能延长或者重新开始自己的爱情生活，直至晚年。至少在城市，弱势群体开始公开地摆脱羞耻感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然而，诚实地讲，旧世界并未灭亡：解放并没有解决当代人情色生活的种种问题，性变得越来越焦虑，沦为色情交易和精神治疗。爱仍旧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不允许年老的、丑陋的、畸形的或没钱的人居住。而男性身份危机并没有些许撼动男性作为强势性别的特权。美丽的外表和年轻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裁，生物的宿命依然沉重，女性四十岁以后很难再生育，而男性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有繁衍后代的可能。不论怎么变，"钓金龟婿"的做法还是从 19 世纪延续至 21 世纪，结婚依然普遍讲究门当户对，钱依然是左右着亲密关系的潜规则。大概有 90%的女性表示愿意与比自己年龄大、学历高或更富有的男性结婚或共同生活①。经济条

① 根据 Marcela Iacub 和 Patrice Maniglier 合著的《性教育的反手册》(*Anti-manuel d'éducation sexuelle*, Bréal, 巴黎, 2005, 第 12 页)中的引述。这是一种长久的卑下感，想要摆脱现有的生活条件，找到一个有钱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的父亲？但多少男性也希望娶到富有或高学历的妻子？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是缺失的。参见 Serge Koster,《性与金钱的识字读本》(*Abécédaire du sexe et de l'argent*), Léo Scheer, 2009。

件比较差的男性不被看好。权力和财富是性的诱饵，童话般的幸福建立在丰盈的银行账户上。人们更爱和自己同等阶层的人或者比自己更高阶层的人。简单地说，爱的改革受到了旧日固习的阻碍，如果有人要用钱铺路，那也没法阻拦。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爱就意味着将自己重新植入神奇的腐土，让儿时的恐惧、膨胀的期许、从属感和残忍交织并重生①。没有了旧日观念的延续，我们怎么来继续阅读《克莱芙王妃》、《危险的关系》、《少年维特的烦恼》、《呼啸山庄》、《贝姨》、《包法利夫人》、《上帝之美》或《追忆似水年华》？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可以读一读萨德、傅立叶、赖希、马尔库塞，还有马克思和巴尔扎克。他们庆祝资产阶级权力、金钱和性的三位一体，并将此归功于叔本华，因为是他将情感描述成自然为了物种延续而施的诡计（反过来讲，物种本身就是爱为了补充盲目机械的繁殖而耍的花招）。在半个世纪的高谈阔论之后，人们又回到遗传、社会以及政治的法则，个体的骄傲彻底破灭。情感固执地诋毁和镇压着个体主义情节，不承认它是人类最古老的预言。现代人惊愕地发现：爱，并不总是可爱的，它并不总与公正和平等共存，它是一种反民主的、封建的激情！爱是一

① 很多例证中的一例：2009 年 5 月 25 日，法国东部的一名警察阉割了妻子的情夫。这名五个孩子的父亲潜入妻子情夫的住所，将他打昏，拖到车库废了（法新社，2009 年 5 月 25 日）。陈腐的手段？也许。但陈腐的东西只能留在过去，不能带到现代。或者我们永远摆脱不了陈腐的行为和态度，不过是从一种陈腐发展至另一种陈腐罢了。

只被放出瓶子的妖怪，喝起来既甜蜜又苦涩。

在这场解放中我们最终获得了什么？孤独的权利！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一直批判自给自足论（自给自足，不需要别人），认为那是高傲的罪证；19 世纪的社会则将单身视为耻辱，将单身与手淫和物质条件拮据联系在一起。今天，法国单身人群的数量达到 1400 万，欧盟区为 1.7 个亿，这已不是一次事故，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单身不再等同于孤独或者没有后代。单身者通常比有伴侣的人生活得更宽裕，更加有条不紊。免受另一个人的领导或指使，这也算一种被动的征服。

（6）两种伪善

从阿拉伯-安达卢西亚神秘主义的诗歌到波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文学，爱（不同理解并存）属于所有文明。西方文明——从柏拉图的《会饮》，到福音书，再到现代文学——总喜欢给心的悸动指定一个政治化或精神性的结局。爱的意义缺失，让大多数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感到绝望：必须赋予爱一种意义。对于柏拉图来说，爱是理念的冥想；对于基督徒来说，爱是天国的到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爱是革命的成功。创作了《爱弥儿》的卢梭，一个人，单凭文字的力量，不但重塑了教育学，而且有板有眼地定义了主人公理想的婚姻生活、最理想的妻子、腼腆与放纵的尺度、服

从与平等的拿捏[1]。这就是欧洲意志主义的特点：它不是从实际观察出发来描述爱的发展进化，而是制定出一个关于爱的理论，在施行的过程中又难过地发现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我们谈论了过多爱应该是什么，却忽视了现实中的爱是什么。

在语言和行动之间，在理想的快感和心碎的现实之间，横着一道深渊。遍地的陈词滥调告诉我爱是可以实现的，而各种关于婚姻幸福的书籍又让我觉得现在和从前一样艰难。我们给自己制定了一套不可能达到的规范。卢梭另辟蹊径：《爱弥儿》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学巨著，是一套教育的艺术，而它的作者却当先背离了自己制定的规矩，遗弃了自己的五个孩子，虽然这种行为在那个婴儿死亡率很高的年代颇为常见。照我说的做，别管我是怎么做的。从启蒙时代开始，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就一直走不到一起[2]。

---

① 卢梭，《爱弥儿》，第465页。实话说，这种想要将一切事物哲学化的怪癖是法国的特色。卢梭引述了约翰·洛克的一篇论文，结尾如下：“既然我们的小伙子准备好要结婚了，是时候把他交到妻子的手上了。”但卢梭不同意这种观点，继续细致入微地描述着两位主人公爱弥儿和索菲的日常婚姻生活。

② 同样的言行不一也发生在美国卢梭主义评论家布鲁姆（Allan Bloom）身上。这位《爱与友谊》的作者，是现代女权主义和放纵主义的猛烈抨击者，他颂扬持久的爱情。没想到死后被最好的朋友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一部名为《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的书中揭了老底。这部书是第一部“出柜”文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该书中揭发布鲁姆表面上是芝加哥大学出色的教授，而私下里却喜欢追求男孩，享受奢侈，最终因染上艾滋病而送命。以上可以看出，卢梭将言行不一发挥至极致，而布鲁姆则是个费尽心机的骗子。找不到一本关于爱的书，其文字真如作者其人：不是欺骗别人，就是自我欺骗；将自己塑造成典范伴侣或古怪的纵欲者，其实自己哪个也不是。这种做法是对文字的亵渎，是对读者的蔑视。

我们的时代自欺怀有远见卓识，我们的修辞填补的是心灵的空白。传统的伪善见证了社会伦理与个人尊严之间的鸿沟；现代的伪善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的脱节。这种形式主义，这些滑稽的模棱两可，成了我们风俗中的家常便饭（比如伍迪·艾伦电影中的人物）：我们追着自我的美好形象跑，渴望走出迷途，怀揣着普罗米修斯般的野心，期望达到理想的高度。

但是心从不听话，无视导师们的训令。释放、解脱，我们熟悉这些言词。但生活也向往追求荣光，仰慕的感觉胜于批评。于是我们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矛盾中：一边想要对爱进行改革；一边又全力拥抱着爱的每一个侧影。

“前任”是什么？

弗洛伊德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个人在做爱的时候，受父母阴影的笼罩，心理年龄退回六岁以下。现代恋人间更加拥挤，那里还有各自“前任男女友”的阴影。前任的名单有时颇像唐璜的排名表，上面如数家珍地罗列着名人的姓名，像名妓一样收集着与己有染的王公贵胄和亿万富翁的名姓。然而它也见证了一个人失败的过去，记录了那些已经破灭的希望，是一份满载挫败的简历。你的爱人，在另一个人那里遭受感情的挫折，现在来到你的怀里哭泣，这种感觉简直糟透了。“前任”有着幽灵

一样的可疑身份：一个没有被彻底埋葬的死人，一颗可以重燃成烈焰的沉睡火苗（很多女人都曾有过几个旧日情人，她们从不提起，生怕被丈夫视作轻浮）。

知道自己不是他（她）的初恋，在自己之前他（她）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或者可以带来安慰。毕竟喜爱不从无知来，它从理智的比较来。但我们最终可能还是不免要登上一份长长的名单，那是一个虚拟的家族，里面有许多缺席者。接下来，我自己也会变成别人的谈资，我的嗜好和怪癖也会被拿来细数，然后再被装进小隔间，贴上标签，算是一件尘封的往事。情人都有一个天真的梦想：想要擦掉前任的印迹，将其视为草稿，而自己才是完成的作品。然而，爱里面没有进步这个概念，后来者并不能居上。完美的幸福和感官快乐的巅峰似乎只存在于青年时代的浪漫曲中，过后就只剩下啰嗦与拙劣。

"前任"的故事会让我们很扫兴，想到自己的爱人不过是在简单地重复着从前的恋情：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胆量。我们不过填上了一个以前就有的格子。更糟的是，得知他（她）在我们之前曾玩过的精致堕落正是自己被拒绝的游戏。"前任"有一只嘲笑的眼睛，它似乎很有经验地对我们说：你会像我一样败下阵来的，但还是去试试吧。我们多想向它证明它是错的，它有眼无珠，不懂得珍惜眼前这个人。今天，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连续的多配偶制（或者一连串的一夫一妻制），爱的生活是叠加式的。让、保罗、塞尔日、阿琳娜、迪亚娜、拉谢尔，可以一直举出月历上

所有圣人的名字。有的人在一生中积累了很多爱的经历，他们甚至可以做个统计表。

最后，在这群我们曾经爱过、刺痛过、伤害过、辜负过的男男女女身上，我们隐约察觉到自己的影子：他们塑造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永远地留下了一抹烙印。

第二章

诱惑市场

每个人在另一个人眼中都闪烁着错觉的光；每个人都钦羡着别人，也同时被别人所钦羡。

丰特奈尔[①]

我是如此腼腆，总是不自觉地犯着自己最想要避免的错误。

——纳博科夫[②]，《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① Fontenelle(1657—1757)，法国哲学家、科学作家，代表作是《关于宇宙多样化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e des mondes*)。——译注

② Nobokov(1899—1977)，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是《洛丽塔》。——译注

(1) 在多样中沉醉

仅凭着道听途说来的零星信息，既没掌握要领，也不了解规则，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爱的旅程。关于这个奇妙天地的法则，我们还没有领会，就算有一天搞明白了，那些法则也早已变了。在青春时期，我们一面强烈地感觉到美，一面又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接近这些美的化身。年轻的心，未曾识得愁滋味，那个世界是炙热的，上演着无穷无尽的魔法。我们无法抗拒那些嘲笑着我们的美丽面孔：这世上有太多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的美好，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拥抱和期待。源泉远可以满足饥渴。大城市以其巨大的人口密度，成为了激情生活的理想地。在乡村和外省(或在北美的郊区)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里长天老日，哑角稀缺，情节低劣；而大城市里则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各种渴望交织碰撞，人们逾越阶层的围栏，那里是陌生人主导的神秘世界。

青春时期，也是缺乏选择能力的时期。年轻的心贪得无厌，冲动压过理性，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看到美，看到世界多样地绽放。少男少女们是融为一团的美妙群体：每个人的光芒，没有压过对方，而是使彼此更加夺目。在所有的青春集会上，在欲望的火焰上，在不间断的挑动中，总是聚集着无数快乐的陶醉。普鲁斯特曾描述沙滩上的少女"这种在各种选择间迟疑的想爱的感觉"。每个人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群体中简单

的一抹。在爱上一个确定的个体之前，我们品味着大街上、公共场所中多样的面孔。这个选定的爱人，不但将凝聚所有多样的美，还肩负着要超越一切美的艰巨使命。面对天神般的美丽面孔，神秘主义者称这种审美陶醉为“圣祷”。那里包含了神圣的心灵悸动，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寻找、相互倾慕、永不厌倦的爱的凝视。

（2）没有你的份

风气开放带来新的希望：这是一场向所有人敞开的盛宴。然而我们的爱情旅程先要从被拒绝开始。送出的赞美碰壁而归：迫切想要得到拥抱的眼神，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回应。大城市宣称：一切皆有可能。但为什么这些可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在所有具体的悲伤发生之前，关于爱的话题从不被提起。事实上，只有在自由的社会里，受到最严格的主观意识的控制，欲望的障碍才会林立而起：旧的社会秩序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已建立了规则，门当户对是不可撼动的准则。当然，追求爱情的艺术、诚实、善良和慷慨也是社会规范中需要学习的部分。从此，一个小小的因素，如年龄、身高、外表、衣着或声音，既可以在爱的追逐中给我们造成麻烦，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喜爱或是厌恶，强烈如同武断。谁没有经历过从欣赏到厌恶的瞬间感觉转换，只为了一个细节，一次奇怪的表情，或是一种笑

的方式？闪电般的爱，带来闪电般的恨。对一个人的感觉瞬间颠覆，而这个人唯一的错就是他的存在。被抛弃的可能，像毒药一样，萦绕着我们最轻微的情感。从博物馆到商店，到处悬挂着“请勿触摸”的标识，总结出我们每个人的重要经历。

关于爱，有一个词最适用——“市场”，虽然这个词很值得怀疑：也许伴侣的交易是先于物品的交易开始的吧。每个人，在这场人的贸易中，都有一个分数，它随着时间、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浮动。幸运者身后跟了一群追求者，条件差的人则处处失败。除了那些光环笼罩的宠儿们之外，男人女人魅力的市场严格受众人默许的法则所支配。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外貌的战争。观察，就是品评，然后丢弃。遭到拒绝，在民主国家中是这样可怕，因为既不能把它归罪于国家的苛政，也不能把它归罪于教会的条令。不被接受，我只能怨我自己。再炙热的欲望也是徒然，是我这个人本身造成别人的冷漠。得到如同法庭的宣判：不，谢谢，不要你。

有没有想过，白马王子的传说既是一个男人的梦，也是一个女人的梦(就像女孩对于阴茎的欲望，男孩对于阴道的欲望)？哪一个小人物没有偷偷幻想过超越现实的自己，醒来后蜕变成另一个光彩照耀的人？传统来讲，只有男性，在注定要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承受着惹怒对方的危险。而可笑的求婚者也早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刚刚获得更多自由的女性，在争取主动权的同时，也陷入了可能遭到拒绝的窘境。自从有了女唐

璜[1]以后，唐璜就不复存在了。很多男孩对于这种角色的倒置感到不满，其实他们应该高兴才对。旧式的追求由三个角色主导：社群、礼节和女人。安抚社群，遵守礼节，诱惑女人，三项必须一步到位。说"我爱你"，就是说"我要你"，遵守法则就是为了顺利达到目的。而新的诱惑规则是两个个体面对面较量。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就意味着成为他的附属品，这会让我厌倦。所以必须掌握技巧，在说"不"的同时不伤害到对方。

英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质疑，在一个任何欲望都有可能被实现的世界里，如何成为包法利主义者[2]？回答是：人们现在不会成为包法利主义者，将来也不会。我们的社会，在到处歌颂阳光般快乐的同时，将那些被拒之门外者、那些被剥夺了快乐的权利的人，伤得更深。当享乐主义成为规范的时候，人们的不满依然很深。人们开发了挫折市场，以咨询、照顾和小玩意儿的方式倒卖魅力和无畏。这个"解放"的时代，使孤独者的命运更加凄苦，在全世界都准备迎接快乐的时候，那些被忽视的人只能甘守无名。艾莉森·卢里[3]讲道，其实丑姑娘接吻的次数远比人们想象的多，只不过她们同时要忍受

① 唐璜(Don Juan)是西班牙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以英俊潇洒及风流著称，一生中周旋于无数贵族妇女之间，在文学作品中多被用作"情圣"的代名词。

② 指如同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那样，对生活的浪漫主义幻想和不切实际的追求。——译注

③ Alison Lurie，当代美国作家，代表作是《永远的男孩女孩》。——译注

情人吐苦水，抱怨他们在漂亮女人那里遭受的挫折。对解放的严重讽刺：男人和女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帮凶，以青春、形式和美的名义，相互迫害。那些曾作为自由解放的工具，现在又成为奴役的手段。

破灭与惊喜

萧伯纳曾说："生命中有两种灾难，一个是欲望没有被满足，另一个是欲望得到满足。"我们永远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曳，希望越接近目标，失望越大。有一派思想专门强调希望最好不要被实现，期待中才有美。卢梭极为看重恋爱中想象的力量，他说："没有比'没有'更美的东西。"(《爱弥尔》第 871 页)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也曾说过："独立于实现与未实现之外，只有等待最美。"幻想总是超越现实。青年时代活在英雄梦里，成年以后开始醒悟。克利蒙梭[1]说："在爱里，最好的部分，就是上电梯的时刻。"这种可怕的观点，倒正合了偷情者的心意。

在这种浪漫主义陈词滥调之外，还有另一种相反的经验：当

① George Clemenceau，(184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译注

事件的发展比预想的丰富，人们就收获到惊喜。在梦想美好与生活美好之间，还有第三种表达：带着贫瘠的梦想，在令人窒息的极大丰富里生活。勒伊斯布鲁克[①]说："我将精神的陶醉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芒神秘主义。在这种状态里，快乐能超越欲望的视野。"愿望一旦被满足，即被宰杀，祈祷立刻变得乏味。令人激动的爱情，在期待中膨胀：它制造出我们并不需要的副产品，让人窒息。破灭的幻想，打开了另一扇开向奇迹的门：卓绝的失望。

---

(3) 筛选机器

吸引，就像加尔文教义中的圣宠一样，是一部筛选机器。在世上的日常生活中，我感到自己并不总是被我渴望的人所渴望，被我爱的人所爱，但我喜欢这种随时在淘汰之列的状态。靠边站：这个表达的应用，远超出了舞会和庆典。有的人，一辈子都在靠边站；有的人，一生下来就人见人爱，到处受到追捧。受欢迎是一种奇迹：一种独一无二的恩惠。讨喜和不讨喜一样无从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对我们紧追不放，而有的人根本忽视我们的存在？（萨德给予了他的解答：那些让我们

① Ruysbrock(1293—1381)，荷兰神秘主义者。——译注

心动的人亏欠我们的感情，就像我们亏欠喜欢我们的人的感情一样。欲望，对于萨德来说，是负债；对于傅立叶来说，是可爱的人施与众人的礼物。）

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成功地把黑色幽默与悲观主义混合在一起，建立了一种全球失恋者联盟。他揭发享乐主义的谎言，认为它也是封建主义的一种。维勒贝克成为无话语权者的代言人，在他之前，伍迪·艾伦也在他初期的电影里表达了其貌不扬者对于花花公子的报复。关于爱，与那些夸口相反，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人，只能得到我们能要的人，或者说愿意要我们的人。然而，"所有美好的，都是难得和稀缺的"（斯宾诺莎）。有些人觉得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深信身后当尾随着众多的追求者，甚至把别人的拒绝解读为一种判断上的错误，或者没有品位。

看看那些俱乐部和夜店：或以知名度，或以年轻为标准来筛选客人，那里是身体交易的殿堂。在震耳欲聋的音乐背景下，个体展开不经思考的竞争。人们去这些地方，是为了观看与被观看，交错的目光瞬间宣判。开心的聚会，上百人在同一个节奏下律动。但夜店也规范了相见的形式，一种高分贝声响控制下无语的交流。这些地方如大公司的招聘现场一样折磨人。（这也是闪电约会的精神：每人只有七分钟的时间吸引对方。）纯粹的人造世界，瞬时激情的世界：青春在其中自编自演，注定倾慕于稍纵即逝的美丽。那些跳舞的幻影，是不可思

议的尤物。躯体的光环释放出神奇的魔力。遍身魅影者在众人的一再欢呼中尽情自我展示。这是一个不论智慧，无所谓品行的世界；一个被浮华、钱财和虚张声势所控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外表定义个体，其他皆多余。所有人都可以沉醉于这个激情涨满的世界，然而飙高的拍卖价格几乎是一种惩罚。在这个自恋者的集市，少数人过度曝光，因为剩下的大多数人只有在一旁拍掌的份儿。

欲望，曾经被教士和伦理所禁锢。如今，最严格的分等，又打着欲望解放的名义。觊觎，首先从筛选开始，在面孔和身体上安装栅栏，让它们接受老套审美标准的评判。个体需要冲破旧套路，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最后，奇迹出现，最不受欢迎的人也找到另一半，成功绕开这道将他们与别人隔离的高墙。比传统的对美的爱慕更诡异的，是对随便什么人的不可理解的倾慕。那些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男人和女人，也能引发爱慕和疯狂的追逐，这才是真正的奇迹①。

(4) 速战速决者的反攻

有些人把诱惑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把“萌生”的状态看作

① 在网络上，那些偏爱胖子和老人的消费者直言自己喜欢衰弱和枯萎的躯体。不可思议的嗜好，让所有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至高无上。他们只收集“开始”，为陌生人疯狂，新的出现后立刻抛弃旧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爱的程式很简短：开始与结束几乎重叠，心动便行动，整个过程是一段急进的快板。什么是以男人为食的女人？什么是追着女人裙摆跑的男人？他们都是离题爱好者。对于他们来说，情景比情人重要，追逐比拥有重要，感觉比感情重要。某些浪漫之地，呼唤着他们立刻展开一段恋情，无论跟谁。丑陋的人和臃肿的人都能让他们动心，他们不论瓶中为何物，只追求陌生的碰撞。他们对天长地久和心灵交流不感兴趣，只寻找初次相逢中转瞬即逝的快乐。当他们在五十岁之前稳定下来的时候，自我感觉曾经比大多数人生活得更精彩。他们喜欢爱情的芬芳，胜过喜欢人。他们是快乐的盗贼，大方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以吸引更多的人上钩。他们用精心设计的漫不经心来保护自己：在任何交锋中他们都不会彻底落马，他们总是可以卷土重来。当情人口吃时，引诱者开屏炫耀：他灵巧地展示着他的金衣紫袍，大步走向目标，无懈可击。（那些在大街上勾引人的男子，就是上流社会诱惑者的凡俗版。与其巧进，不如阔步向前，他们能忍受各种羞辱，使用的花言巧语也是一成不变。岁月流逝，大街上的勾引者和面皮失去弹性的寻欢作乐者，都陷入了同样的哀婉境地：徒留一身不堪再用的伎俩。）

没有这项技巧的人，眼睁睁错失很多机会。本该发生的，没有发生：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诱惑与骚扰相似，在公众场

合与陌生人搭腔，像海盗一样登陆。喜欢一个人：如何吸引其注意，同时又不使其厌烦？这个问题可以是一辈子的论题。如今有可以教你交谈艺术的老师，几句俏皮话就可以使最高的城墙卸防。和从前一样，欲望需要掩饰：今天，人们不再开门见山地说“我爱你”，也不会告诉对方我只想要你丰满的胸部和浑圆的屁股。必须懂得迂回地表达。

不可能的等式：越是受到吸引，就越不会吸引，精神被抑制。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中，还得表现出风趣、聪明和无比的放松。晕厥封住了的唇，越想具有创造性，就越笨。追求，首先是竖起领子，美化自己。即便是最麻木的情人，也会使用浮华的手段献殷勤。可爱的情人先从自我炫耀开始，冒着被归入演技派的风险，在叫价的激动中释放光芒。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引诱，叫做拒绝引诱。沉默和简洁的策略比口若悬河更能抓住人心。蠢事连篇的呆子，这号人物往往能捕获芳心。美丽的邂逅，总是不期而遇，没有在乎结果。如果擦出火花，那就像一篇故事没有预设的结尾。不需要强制的热情绽放，海阔天空地攀谈，无所谓结果。天赐机缘伸出援手：要么握紧，要么忘记。

无与伦比的美丽情节：两个人在公车或火车上邂逅，相视，沉迷，拼了全力想要再见一面，于是在报纸上发出了寻人小广告（《解放报》刊登的私人信息饱含现代浪漫主义的精髓）。互联网上，遍布着拐弯抹角的策略：找到了灵魂伴侣之后，人们尝试靠

近的方式是从使用假照片开始。互联网上不存在初次接触的恐惧：对于那些不敢在路上与美眉搭讪，没有勇气向陌生人告白的人来说，互联网是他们的第二次机会。面对这片孤独心灵的集散地，人们有时持怀疑态度。但是，这里没有中介：达成共识的成年人在网站里互相交流，最终被喜爱或欲望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聚集了大量人气的巨大筛选中心。相比之下，婚姻介绍所只是一个地方的小站，由一位熟知教区居民的主任管理着。在互联网上，好色之徒招揽艳遇，多愁善感的人寻求长久稳定的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成双，在那里分手。互联网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加速器，一切的怪念头，甚至是最荒唐的，都可以进驻其中。很多人不求得到，更喜欢追逐：他们被无数的机会和可能冲昏了脑袋，像个大佬一样在虚拟的后宫里游荡，很少或从未将欲望付诸肉身。

网民们只需手指一点，就可以相互删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切尽在掌握中。在 Meetic、Match. com、Netclub 的网页上，人们把自己塑造成理想伴侣的形象，擦去突兀，以最佳状态示人。人们在候选人中吆喝自己，同时也成为了市场的一部分。那些大呼隐私被侵犯的人，同时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掏心掏肺，搔首弄姿：想要得到青睐的渴望胜过了对谨慎的考量。互联网上充斥有趣味的各种误会，遵循着放荡小说的逻辑，妻子监控丈夫，在网上以神秘匿名女人的身份与丈夫定下约会。但信息世界最终也无法回避“相见”这一环，只不过尽量将它拖后，做好充

分准备。面对面交流的法则，从古到今一成不变。很难说网络的筛选，是否增加了相见的恐惧。勒库特[①]的科学哲学创造了"网虫"这个美丽的新词，特指那些深陷互联网中、逃避现实社会的人。

每一个羞涩的人内心都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梦想：一个是肉体与肉体或者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瞬间结合。渴望身体能够不遭厌弃和拣择，轻而易举地享有快乐，就像某些同性恋的性吸引，密室交易，或者交换主义俱乐部，那里是快感的共产主义，没有人会被排斥在肉体盛筵之外。另一个相反的梦想，是心的透明，精神的共鸣，省略多余的对谈和殷勤的形式，与心上人相依相伴。然而，这两个梦想都不是现实的解决方案：交流的顺畅度总是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干扰。总有那么一些男人和女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于是，人们向往家庭的安全感，在那里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不需要遭受无止境的评判。但是，即便是最温和的夫妻生活也需要波澜。勒南[②]认为，国家每日都在经受全民公决。夫妻生活也一样。努力讨好对方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责任，即便是二十年的夫妻，也是如此。吸引是最高主题。

① Dominique Lecourt，巴黎第七大学哲学教授。——译注

② 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怀疑派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译注

什么叫做同意？

一种奇怪的回归，在距离五月风暴[①]半个世纪之后，同意这个概念再次遭到质疑。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一种强制奴役[②]的征兆，反对一切爱情假戏中的欺骗手腕。于是，古老的文化悲观主义悄然回归，宣布人类因为不成熟而不配享有自由。"同意"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接受和愿意。说"我可以"和"我特别想要"是两码事。一边是可以容忍的态度，另一边是强烈的意愿。没有更好的选择时，为了生活，我们可以委曲求全地接受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是否能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或雇员不同意工作？不，他们是有保留的同意，怀着未来会更好的期望：他们的"是"为"也许是"，那不预示最终的失望或拒绝。当一切形式的同意均遭到质疑之时，表现出的是人类饱

① 指1968年春天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其口号有：（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至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2）直到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3）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4）行动一定不要是反应，而是创造。（5）禁止去禁止。（6）我持有对现实的愿望，因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实现。——译注

② 比如法国哲学家、女权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 Geneviève Fraisse 2007 年在 Seuil 出版社出版的《同意》（*Du Consentement*）一书中，提倡反抗默许。

受摆布和屈从的事实。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自由作为主权或"基本智慧"（斯宾诺莎）的双重定义。一方面，我们永远也不是自由的，因为做不到天下无敌。即便是那些最私密的决定，也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带着面具的暴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总是在忽略自身的欲望时同意，在渴望与犹豫的忽明忽暗中同意。为了更好地绕开阻碍，意愿必须与阻力妥协。完全的独立和完全的附庸关系都无法描述人类的社会。这就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从法则、社会本源和自然中找到答案。每个人都有犯错和改正的机会。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较量，那么在关系交易中，一切都受到束缚，人生是一座无止境的地狱。然而，这种论调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当绝大多数人都带着锁链时，一小部分人拒绝加入这场化装舞会，摆出旁观者清的姿态。他们是如何避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呢？这种清醒本身是否是一种极度自大：以家长式的态度，宣称与其同时代的人都是受奴役者。批评别人幼稚的同时，暴露了批评者自身的盲目，藐视一切，唯独忘了藐视自己这种藐视的态度。以为揭开了人心秘密的真谛，其实只不过是一场天真的手舞足蹈。

(5) 欲望管制

一些女权运动，尤其在北美洲，四十多年来一直试图将"引诱"罪行化，或者至少加以约束。在公司、在大学，人们制定了着装规章（建议女性不要穿透明或贴身的衣服）和言谈规章（一切言语的赞美、眼神的专注和侵略性的评价都被视作骚扰的开始），这给两性关系打上了僵硬的烙印。来看美国电影千篇一律的情节：高压锅处在即将爆炸的边缘。一男一女，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认识，发现彼此相互吸引。于是故作冷漠，互相攻击，直到心的颤抖将他们推向致命的一环：二人搂抱在一起，交叠缠绵，大喘粗气，完事后再穿好衣服。压抑的回归：性被演绎成了癫痫发作①。这样荒谬的陈词滥调，让人们不禁怀念老电影中优雅的相爱。这些演绎的言下之意是，性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想要摆脱它，就要先满足它。法国人说"我们做爱"；英国的电视剧和电影中则说"让我们做爱"。区别不是语义上的，而是反映了两种世界观：法国人表达的是一种急切的、动物本能的需

① 在 Brian De Palma 的《黑色的大丽菊》（*La Dahlia Noir*）一书中（2005），朋友关系的两个人，在一次晚餐上轻触双唇，于是二人欲火中烧，将餐巾、碗碟和菜肴全部扔到地上，互相撕裂衣服，就在桌上抱作一团。就像好莱坞大片中原始印第安人礼物交换节上的色情疯狂情节。如果是这样，那还买那些昂贵的精致布料做什么？反正粗野的人一下就将其撕破。

求，如同饥渴。英国人则描述了一个复杂的色情行为，爱是一个做和被做的过程，是一种细致的构建，而不是一次器官的宣泄。一边是兽性，另一边是仪式。

在英语文化国家的大学校园里，所有针对学生的面试，或者被录音，或者在一个敞门的房间里进行。任何暧昧的行为都可能被起诉。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即便是有共识的成人行为，也会导致教授被解职①。在英语文化社会的公司里，如果你认为别人的私人交谈中使用的词汇过于淫秽下流，以至于"污染环境"，你有权介入。如果属于同家企业的两名员工决定结婚，那么企业要通过特别开会讨论，或者签署"爱情合约"的方式，来保证两名员工如果将来离婚，不会将企业告上法庭。我们都还记得，90年代初，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颁布一项规定，规范学生间的亲密行为，未果。规定要求：学生在发生亲密行为前，需向校方负责人提交一份书面的文件备案，具体描述每一步细节（摸胸部，脱上衣，等等）。在法国，工作中性骚扰，滥用职权的欺辱行为，都已被定罪。有些人想要把这

①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今天的英语文化国家里，就是教授与学生间的完全被禁锢的爱情故事。很多小说都描述了这种新的社会氛围，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南非人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的《耻》，还有美国当代小说家菲利普·米尔顿·罗斯的作品。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的列斯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因为一系列关于他二十年前性骚扰指控的匿名信的出现，2008年不得不放弃牛津大学诗歌讲坛的候选人资格。而参与到这场匿名信风波、并得到了这个教授职位的女诗人茹特·帕戴尔，后来也被迫辞职，并做出道歉。英语文化国家的大学，已经成为新的宗教法庭，监视着成员的私生活，要求他们招认、忏悔、自我改造。新教世界又重新建立起天主教的一些最糟糕的制度。

种做法普及到一切社会关系中，将误会、暗示和挑逗一并量刑。但是，目前法国并不认同这种道德上的麦卡锡主义。

针对女人的粗暴行为，与女子的独立程度成比例增长：我们甚至会见证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压妇女的暴力迸发。某些男子所感到的愤恨就如同奴隶主听说奴隶制被废除一样，怒火中烧。妇女的解放与自由妇女的仇恨并生，但如果就此推断"引诱"被抵制，那就荒唐了："引诱"将一直存在，万幸，这也出于女人的愿望。女人同样参与到平等进程中来，说服取代威慑，人们要的是对方的心许，强扭的瓜不甜。我在政治学院的一个漂亮的日裔魁北克女学生，曾经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她对于北美男子的失望，他们被框在"正确"的两性举止中，动弹不得。女孩说，她去意大利度假，那里的男孩会大方地表示好感，她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她自信能够打发那些讨厌的人。在美国，两性的共处似乎总是处于爆炸的边缘；而欧洲的氛围却相对轻松，这要归功于古欧洲的"献殷勤"文化。他们继承了"行吟体的色情"（雷诺·奈力①），在骑士与贵妇之间织构出忠顺与服从的礼仪，而这种礼仪也背负着将贵族风范重新引入民主社会的任务。这不只是一种"殷勤"的预备教育，它将粗鲁的欲望转化成细致和体贴，将不纯洁的心灵文明化。它使两性间培养出共同的志趣，有话可谈，有互动，交流得更加深刻和生动。（孟德斯鸠曾说：法国人的艺

① René Nelli（1896—1982），奥克语诗人。——译注

术，是将琐碎的事讲得很严肃，将严肃的事讲得很轻松。）它是一种取悦对方的快乐，一种游戏方式，以为捉弄了对方，其实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就算要节省步骤，一些形式还是要保留。比如，从“您”到“你”的过渡，在许多语言中，仍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赞美”的含糊地位：18 世纪时被看作献殷勤者的假面，60 年代又被激进的女子怀疑动机不纯。其实，得体的赞美之词，是对被赞美者自尊的致敬。最美的赞美，是那些来自陌生人或同性的赞美，因为它最不含私心。摒弃面具，拒绝若即若离的游戏，一上来就要求心灵和身体的清晰透明，这种做法扼杀了跌宕起伏的考验，那是爱情萌生必须经历的过程。一切花招和小诡计，都比可悲的清楚明白更有利于情感的生发。

（6）幻想破灭

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是否真的选择另一半？当我们以为自己清醒地判断时，其实是受到某种程序的支配？两种说法都将怀疑的阴影投向偏好的无动机性：社会学在其中看到阶级性，精神分析学强调与父母之间未解决的心结[①]。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剖析，即便是在一个局限的框架内，最终还是要通过选择来决定取舍，这个过程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即便考虑到私人和社会的种种制约，人们还是有相对自主的选择权。人们有时甚至会做出令自己也感到惊奇的选择：爱上与自己的生活圈很遥远、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比这个拜占庭式的空洞问题更有意义的，是宿命论：自由最后发明出一种决定论。情人不可能互相错过，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相遇。他们把这种在某日某时邂逅的巧合，理解为命运的安排：无法想象这场相遇也许不会发生。这种怀疑太残忍：如果不是你，也可能是别人！在见过的十几个人当中，情人的脸孔应当脱颖而出，像刀片一样锋利鲜明。就是他（她）：神魂颠倒。

① 遗传学家提出了另一个影响伴侣选择的因素：“气味印记”。在体味中，有 HLA 系统（组织相容性主要的复合物）介入，这是免疫系统的主要基因组区域。俗语说“闻到某人”可以有两层含义：一个过敏，另一个是不可抗拒的吸引。我们不能感到某人，但是我们能够愉快地嗅到亲爱的人，大口呼吸到他（她）的气息。

有人会在别人的欲望里晕头转向，他们缴械的原因不一定是真心愿意，而是对于来自爱慕者的致敬的一种回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产生与从前大不同的偏好，对粗俗的标准美没什么感觉，大胆拥抱多样的人群：气质胜过美丽，性感胜过温柔，迷人的与众不同胜过无味的高贵。爱，崇拜美丽的小瑕疵，喜欢令人感动的缺陷，胜过完美无瑕的身体。不应当禁锢这种偏好，应当丰富它，使它更加多样化。它在局限人们的同时，也让人们扎根于真实。爱，是幻景的破灭，但同时也具有可塑的品质。我们可能会爱上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扩大“爱人”的搜索范围。比如下面这个奇怪的相互扑空的例子：当欧洲人、澳大利亚人和北美人冒着被太阳晒伤的危险，想要变黑的时候，非洲人、中国

人、印度人和菲律宾人则一味想着怎么变白，即便冒着损害皮肤色素沉淀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是殖民文化偏好的主导，还是美国标准的盛行？不见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梦想成为别人，皮肤白皙的想要变得黝黑，皮肤黝黑的想要变得白皙。美女与丑男，丑女与帅哥，少年与妇人，少女与老头，穷人与富人结合，所有与主流观点相左的，与时代方向相反的选择，都值得庆祝。

与其幻想美丽的独裁就此终结，不如期望它变得错乱，期望在同一只眼中不同标准的并存。毕竟，潮流的存在不是要将美丽的标准强加给我们，而是让我们安心，告诉我们如何穿衣、如何化妆。潮流是一剂定心丸：它在将大众同化之前，先让我们摆脱尴尬。引诱，对于某些只能依靠脸蛋和身材上位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职业。谁会批评他们呢？巴尔扎克在《贝姨》①一书中质疑：如何让一位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以美貌为生呢？他提倡一种快乐的、合时宜的竞争，一座大城市里满是无所事事的人和百万富翁，又优雅又有思想，没有顾忌，也没有同谋的老公。从前，这是女人的专利。如今，自从莫泊桑的《漂亮朋友》通过诱骗贵妇一路爬到社会上层以后，这条路也向男人敞开。（俚语管这个叫海狸小白脸，这种动物靠尾巴来建窝。）多少政治圈、商圈、文化圈的高位是凭实力得到呢？多少又是靠“色相”换来的呢？

① 巴尔扎克，《贝姨》，Folio，Gallimard出版社，第172—173页。

就算是怀揣着野心，男女之间的引诱也有默契的成分，总是想要在一起，不愿分开；喜欢相互吸引，不喜欢无动于衷。归根结底，什么都没有过时：从前的殷勤追逐、简短的邂逅、轻骑兵式的绑掠，还有一见倾心。极端的费尽心机和极端的肆无忌惮并存。一切都失效，一切又都合时宜。这两种状态的交叠存在，使得现代人茫然不知所措。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并非一幢新楼，它与从前的风尚出奇地相似，只不过放纵得到更多的标榜，伴侣之间的分分合合的周期也缩短了很多。现代人连续相撞的心理：与传统同居。

现代西方的通行做法，不是继往开来，而是交叠并存。我们的野心想要择要，实际行动却是兼容并收。浪漫又放纵，利他又任性，礼貌又色情，一座巨大的回音室中，约定俗成和特立独行交相呼应。弗洛伊德将罗马形容成一座完美的隐迹纸本①之城，在那里各个世纪交叠存在，从共和国到文艺复兴，爱情忽视时代的分隔，让遥远的年代照进现实。这就是情感的现世规则，一张千层饼，既超前又陈旧，海阔天空任人遨游。因此，期待充满矛盾的人们有一天决然迈向更好的社会是妄想。传统与现代将继续并存，就算有部分的改观，就算有暂时

① 擦掉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稿本，但可用化学方法使原迹复现。——译注

的美好,它们也将永远并存。从此,拒绝挽救情感,拒绝为爱的浑沌世界寻找出口。

分手,花招艺术

现代的分手,不可避免地引发共同生活的破裂。这是一个让感情双方都难以拿捏的时刻:既要剜除脓疮,又不想溅出污点;既要"瘦身",又不想悲情上演。另一半必须接受失宠的事实,不能呻吟,不能哭泣。为了摆脱累赘,人们什么都干得出来。退缩,昧心,耍花招,就为了让残酷的事实显得不那么突兀!宣布这个消息时的语气再温柔,也掩饰不了那种想要立刻甩掉对方的迫切心情!如果对方不服,那他(她)就成了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别说没提醒过你!于是,在流放之外,还要为失势买罪。事实真相劈头盖脸地袭来,就好像读到侦探小说的最后一页,才知道有罪的原来是自己!肆无忌惮到了极致,像个证券交易人那样一条短信就把对方除名了!

在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康斯坦和普鲁斯特)也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分手没有将爱终结,而是让爱的火焰重新燃起。"这就是人心的悲惨和奇怪之处:明明是离开自己不喜欢的人,却还是有揪心之痛。"(《阿道夫》)另一半只有离开,才能让我们真正爱上对方:耳鬓厮磨的日子将我们麻醉,分手又将彼此唤醒;只

因为不再在身边,对方变得那么美好。修改版:对于这种致命的宣告无动于衷,不予一字置评。情人本来期待看到的是哀求和恳求,你却扬长而去,眉头都不皱一下。让对方深深怀疑:我和他分手,他却嘲笑我,大概她内心深处早就想和我一刀两断了。优雅式分手:即便你早已一步一步策划决裂,也要让对方先提出分手。把对方逼到不得不要求分手的境地,避免麻烦。被抛弃一般总要比抛弃别人要好,这可以避免承担责任。相反,很多男人和女人因为惧怕自己被年轻的情敌战胜,而不得不主动提出分手。为了避免将来悲剧发生,他们现在就让暴风雨来临,虽然内心承受着无比的苦痛。

爱的路上有两个时刻:一个是自动放弃自由的时刻:在恐惧和痉挛中抓紧对方;另一个是幻想破灭的时刻:在失望中酒醒。我要重新找回自由,这意味着:我要清醒,不要束缚,我要走出沉迷。幻想破灭常常是一种悲伤的战利品。我们看到大多数人,刚刚走出一段感情,就幻想着再次被甜蜜的枷锁捆绑。翻开新的一页,和另一个人重新开始,重复相同的错误,重复得更好。摆脱一个人,是摆脱与他有关的整个世界。当这个人离开你的时候,他的小宇宙仍旧像幽灵一样围绕在你身边。

毋庸置疑,离开比开始更难:即便你已经不再爱对方了,你还是为分手犹豫,因为这个人毕竟给你舒适和安全。那些抛弃我们的人有时算是帮了我们的忙,逼着我们行动起来:最可怕的是那些感情衰竭的夫妇,互相抓着不放,好像两条绦虫互相耗

着，精疲力竭，谁也不敢逃脱。在美国和欧洲，离婚促进员会举办一些“拆件”活动，将结婚戒指放在棺材里埋起来，将结婚礼服扔进火里。

传统离婚的剧式，那些相互指责的控告信，就是厌恶的制造者。人们想要将离婚轻松化，从失败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打开新的篇章。丈夫跟比自己小十岁的女子跑了，人们这样对伤心的妻子说：现在你自由了，快乐起来吧！但是没有分手是简单的，翻开新的一页不是如此轻松：分开日久，旧人依然萦绕于心，好似执袖未去。十五年、二十年后，爱的火焰复燃，只为年轻时那场没有被珍惜的相遇。有些情侣虽然已不再相见，却依然心系对方。分手是他们为爱选择的道路，共同生活所破坏的，分离能够修复和保存。

第三章

我爱你：被爱冲昏头与俘获芳心

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就是对他说：你不会死。

——马塞尔[①]

有一些人，如果他们从未听说过爱，他们永远也不会爱。

——拉罗什福科[②]

我告诉一个女人我爱她……我只是简单地承诺，我们将在生活中共同赋予这个词意义，不是吗？我们将重新创造，这是一项大工程。爱要的不就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吗？

① Gabriel Marcel（1889—1973），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译注
②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思想家。——译注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赋予它意义，那么我们就要一切为了它，而不是为我们自己，因为爱是主宰。

——巴汉①，《语言研究》

我们都很熟悉莫里哀作品中那位资产阶级绅士自我启蒙修辞艺术的那段长篇独白，这是浮华派(Précieuses)的特长。他有滋有味地翻来覆去地说："侯爵夫人，您美丽的眼睛让我爱得如痴如醉。"即便是反过来说，这句话仍具意味。献殷勤，这种贵族的习气，给那个时代烙下了三个严重的缺点：晦涩、虚假和荒谬。以卢梭为首的哲学家们，对这种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坚决地将其置于真实的对立面。不过人们忽略了这样的设想：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形式夸张，但有时也不失真诚。

一切爱的语言都是借来的，这里的"借"有两层含义：受到约束；先于我们存在。用已经被重复了千万次的句子，来表达情有独钟，情并不假，只是乘了公车去私人目的地。爱首先是一个谣言，是倾诉于耳边的甜蜜誓言；在它真正被付诸于生活行动之前，我们崇拜它，我们在懵懂中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场戏。爱并非一种自发的情感，社会和家庭把它当作准则一样灌输给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掌握了一批温柔的词，可以将其无区别地应用于我们的亲人，家里的宠物和小孩。这些可笑而感人的表达方式，先于我们存在，混合了温柔和习惯：我的心肝，我的天使，我亲爱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所有人，谁也不是。更别提我们通常是以相似的方式喜欢不同的人，与每个人玩相同的游戏。"我爱你"：最亲密的情感受困于最无表情的表达，第一次表白，形同于在复述一句古老的连祷文。必须创造出唯一的语言，它只在当下开口时盛开，随后便凋谢。我与我爱的人一起创造的道路，始于千百万前人已踩出的路。

① Brice Parrain(1897—1971)，法国哲学家。——译注

(1) 不可能的巧合

"我爱你"，像一句祷告，一份协约，一段掌控，一种债务。这句燃烧双唇的表达，首先是在承认自己的迷失。我一边庆祝另一个人带给我的痴迷，一边抗议着这种情绪引发的无序。一个陌生人，仅仅是他的出现，就将我的生活劈成两半。我想要回归自我，同时又不失去他。爱的遭遇，就是平静生活中突起的高杆；它痛苦又快乐，猛烈又归真，灼伤又芬芳。如何驯服那个令我沉迷的人，那个高高在上击中我心的人？通过一句表白，既是恳求，也是询问。

在"我爱你"的沉醉中隐藏着强迫对方作出回答的目的。在我表白自己的无助的同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呢，你爱我吗？如果奇迹出现，对方也爱我，那么我便重拾安宁，进入相爱的快乐世界。"我爱你"是一个同步器：它将爱人双方的时间调齐，让

他们进入同一个时区。它让你和我成为同时代人。它是踏入对方领地必须出示的护照，是进入对方宇宙的准可证。然而秘密拒绝失去童真：一切都说了，但什么也没有做。一旦这个致命的句子被说出口，情人双方就要据此重新校准生活的步伐，并忠于誓言。说出口的话很难再收回，从此要同船而渡。“我爱你”不能容忍副词：不是“有点”也不是“非常”，它是绝对的，它决定，它支配。

“我永远爱你”，这句话是说话人当时的承诺。“永远”是普通时间里的另一个时间。我表示将永远爱你，虽然我并不能控制自己情感的变化。我生命中的男人，我生命中的女人：只不过是一生中多个宿命中的一个。誓言类似于信念和赌注，跃过怀疑和恐惧，它假设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幸福地在一起，保证不变心。但是，驱除了不稳定因素之后，誓言将情人双方同时置于不安全境地，将他们变成彼此潜在的杀手。表白之后，我便陷于暴君的刀口之下，既荒诞又神迷，曾经被你从深渊中救出，转瞬就能重新掉入。我进入了一个高危境地，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对方是不是不再理我了？我想我已迷失。我还能保持镇定吗？他把我冷冻起来，不置一词。意大利作家卢卡[①]讲述：当他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病了，高烧发抖，女朋友来看他，慢慢给他温暖，以一种极其美妙的方式与他做爱，他觉得自己到了天堂。温存过后，女孩安静地宣布和他分手。原来那不是天堂，是永别。

① Erri De Luca，出生于1950年，意大利作家。——译注

语法表象具有欺骗性：面对我爱的人，我就像佃户面对地主。对方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无法撼动。互为奴役的契约无法生效，面对对方，我仍感到咫尺千里。想把对方拴在家里，关进爱的金色监狱。结果是自己做了阶下囚，对方成了狱卒。自从我想要占有他(她)，我已不再是我。需要一遍又一遍，不断地重复誓言。这种重复，既能驱避危机，又能修复创伤。可惜和睦的日子不长，最温柔的誓言几天后也会凋谢，必须重复再重复，直到令人作呕。

男人/女人：传统角色的变化

女人轻佻、温柔、情绪化、水性杨花、包容、淫荡；男人懦弱、自私、好色、粗鲁、喜新厌旧。男人已经不存在，他们都辞职了，他们都是不负责的人。两性强加于对方的陈腐观念从未如此之泛滥，相互指责对方失职。虽然没有完全颠覆，但却背叛了传统观念定义的角色。女人指责男人变成了她们想要他们变成的样子，男人指责女人本分之外的额外付出。从前，一方持家，以感情为重，另一方主外，为事业拼搏；前者显露天性，后者体现文化。两性双方如今都打算涉足对方的主业：母亲工作、领导、学

习，父亲照顾孩子，承担一部分家务。男人在家比女人做得更好吗？人们批评他们缺乏权威，花里胡哨。女人在外面工作得出色吗？人们批评她们忽视了子女。

这就是自由带来的厄运：斗争轰轰烈烈，但胜利令人失望，将人孤立，让我们面对如山的责任。女性获得的自立，并没有抹除她们的传统责任，而是让她们超负荷工作。女性在男人那里失去的优势，并没有让她们摆脱从前的职责。大家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境地，人人都必须在过去的模式上编织出新的模式。男女之间无法再相互理解，一直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状态。在这种迷茫中，一些女人怀念起曾令她们厌恶的传统大男子主义。于是男人们惊异于女人们的这种既开放又传统的思想。正是自由和解放将我们变成令人困惑的个体，游移于多个角色之间，受到束缚，无法塑造自由之身，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些越格的人，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人，让我害怕。寻找"真男人"和"真女人"，就是寻找带来安全感的典型，就是控制眩晕。女性并不否认母亲、女才子、缪斯或是妓女这些角色，男性也并不否认领导、老板和一家之主这些角色。大家都怀念那种一清二白：告诉我你是谁，这样我才知道我是谁。两性都想回到从前的时代，男女角色一分两边，简单清楚。人们想要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将对方圈进一个定义中。生活在这个混沌的时代，人们觉得难受。这种身份危机，同时蔓延在两性双方之中。

外形不再决定一切，即便它仍占优势。男人永远不可能生

育或体会女人的快感，女人也永远不能了解勃起的快乐。如果每一种性别都能重新创造对方，那么就不会有困惑，不会有批评，但依然会动摇。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们确切的意义，但那些概念一直存在着。那些关于每个性别的笼统描述，并不十分恰当，也缺乏真实性。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的词语，比如温柔、可爱，都可以用在男性身上。法则在这里只是例外情况的总和。一些优点和缺点在两性之中平均分布，就像一种共同资产。毋庸置疑，男女体会爱的方式不同：这说明不论是谁，男人还是女人，至少有两种方式去爱。女人不必否认女性身份，男人也不必否认男性身份，至少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塑造自己。当然，即便在当今社会，做男人还是比做女人容易。为什么要想尽办法重建一个有归属感的家园，来填实这种焦虑呢？

以个体权力至上为名，后性时代的乌托邦，在外科医学和化学的推助下，想要模糊自然的分界。即便是隐藏在哲学的晦涩语言中，也不难识破那是一种出于宗教的、对于身体和性的古老蔑视，是贯穿基督教的天使梦："复活之后，男人不再需要女人，女人也不再需要丈夫；他们将像天使一样生活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人类一分为二是好的：这种两分可以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既能肯定又能驳斥自己固有的性别，同时抽离表象，另辟蹊径。男人和女人不总是说同样的语言。关键在于他们越过误会和曲解，继续对话，而不是求助于一种干瘪的世界语。至少需要两种性别，

让每个人去梦想成为对方。来生，我愿意投胎做女人。

---

(2) 重新创造自己

谜一样难解的训示：你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正常的逻辑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或者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根据这表面看来荒谬的逻辑，我们只能这样做：毫无保留地爱自己，从而惠及他人！然而这并非接续，而是同时。我爱我自己，因为别人爱我，告诉我我是谁。我需要他们善意的目光和专注的倾听[1]。他们肯定了我，他们的意见有着生发的力量。

爱自己，就是承认一种分裂。亚里士多德将有用的自私和无用的自私区分开。一个根本的发现：想要自爱，必须有分歧。“马不会和自己有分歧，所以它不会成为自己的朋友。”只有人能够成为自己的敌人，并最终想要自我毁灭。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存在，来与自己保持距离。基督教也捍卫这种双重自我的概念：世俗的和神性的，浅薄的和深刻的，错的和对的。在我和我自己之间，介入上帝的巨大身影，要想将其迎接

① 阿兰·德波顿，《爱情笔记》，一本优秀的小说，描述了他与一个名叫克洛伊的女子的情感故事：“只有被爱才能活得完整……如果别人不给我答案，我是谁？”(Denoël, Empreintes, 1994, 法语译本，第 168 页、第 172 页)

入怀，必须远离瞬息即逝的一切：生气勃勃的死和死气沉沉的生，圣方济各·沙雷[1]如是说。帕斯卡认为，如果我是可憎的，那是因为它是一道厚厚的障碍，将我们与自身中高大的自己隔开。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就是爱自身中永恒的那一部分，那是我们一起分享的部分，标志着可能来临的共同救赎。最后，卢梭将好的自爱——唯一真实的保证——与被社会宠坏的自恋分开。

这些传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必须先自重，然后才能自忘，留出一个位置给他人。重要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完成自我认知，之后便不必再想。尼采说：“成为你自己。”但同时也要跳出自己，变得更好。启蒙主义者指望人类可以变得更完美：我们并没有开发出自身的全部，在我们身上，还有潜在的智慧、善良和勇气等待被发掘。因此，一个人至少出生两次；塑造自我，从固我锻生出解脱的我，从旧人变成新人。精神分析学的用处，在于它让每个人走出自身神经官能式的悲剧，接受本来的自己。与自己休战：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表达，并不是说要结束一场激烈的大战，而是要结束一种争斗，这种争斗将我们抑制，让我们不断地重蹈覆辙。弗洛伊德说：不论是谁，不够自恋就缺乏力量，就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有一种好的自恋，它能让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同时也能成为别人的朋友；还有一种自恋，则暴露了我们对自身价

① François de Sales(1567—1622)，萨瓦主教。——译注

值的深刻怀疑。然而这两种自恋的界限微妙难识。

引用西蒙娜·韦伊[①]的话:像爱自己一样爱一个陌生人,反过来意味着像爱一个陌生人一样爱自己。完美的平衡,可惜并不确切:像爱他人一样爱自己,就是用过于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自己扮演的陌生人,这样一来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为了更好地排除障碍,靠近远处的那个我,必须远离自己。即使是日夜自我唾弃的人,也不过是摆脱不了自己的奴隶。虚荣,有一千张面孔,而自我鞭笞则是其中最精心策划的面孔之一。可悲的是只为了自己存在,注定要到处捕捉自己的反射光(广播和电视的成功:创造出一个"假他",没有说话人的对话,没有目光的相视)。

爱,让事物变得生动,让我们重新走入世界的深层,发现那些之前被忽视的东西,更丰富,更厚重。爱,将我们从存在的罪恶中赎身:当爱情碰壁时,生活便失去了意义。一个人,我觉得自己空空的,又满满的:如果我只是我,那么我就多余了。在分手的可怕时刻,那个被收起的我,好像一捆无用的烦忧,飞镖一样奔回。于是,生活又变得死气沉沉:起床,洗漱,吃饭,忍受疯癫的内心独白,打发时间,像受伤的灵魂一样游荡。这种空虚是一种多余。"强烈的,无法平息的爱情,都源于一种想象,想象从对方的目光里看到了最私密的自己,那个自己窥视着我。"(罗伯

① Simone Weil(1909—1943),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译注

特·穆齐尔)然而这个秘密的我,完全由对方创造出,一切取决于我被爱冲昏的程度:被爱,意味着在有生之年得救,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爱有一种生发的力量,它能让潜伏的东西绽放;它将我们从重复的自我中解放,那个贫瘠的自我是我们内心最基本的部分。爱,将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因为轻盈而快乐,所以更强大,更有担当。

两种羞耻心

一种羞耻心是自然的,藏在目光之后;当我们无法理解对方的沉醉时,另一种羞耻心在色情的激烈处显现。了解一个身体,就像学习一门外语:有些人是天生的语言天才,另一些人则永远磕磕巴巴。然而,爱人的身体是晦暗不明的大陆:它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深刻反映了它想隐藏的东西。即使在迷乱深处,我也能感到它的不可侵犯性。淫荡之中,依然有所保留。猥亵,不是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见识、无法拥有的部分。那是下流与缺失的结合。

裸体,首先是脆弱,然后才是慌张。脱光,就是让自己暴露于拳脚与嘲讽之下,变得不堪一击。仅仅是脱掉衣服,并不足以勾起色欲,还需要一种天赋,一种并非人人都能驾驭的艺术。最简单的工具最复杂。一些脱衣舞表演比盔甲更懂得隐藏。裸体

是一种创造。它在相互的爱抚里慢慢生长，身体在指尖绽放，如同一种日本的纸，入水成花。对方向我们最私密处的致敬，将其高贵化。他那温柔的野蛮，让我的身体释放出光芒。我又重生为我，一切平凡的都变得美好而炽热。

羞耻心：不是爱之前的退缩，而是过程结束时的痉挛，它宣告最后的分开。在快感的顶峰，相遇并没有发生。“躲藏者不愿意现身，夜未消散。”(伊曼纽尔·列维纳斯[①])融合失败[②]。当你自己已经沉醉和燃烧，还有什么比爱人脸上辉映的快乐更让人感动？在这些痉挛的表情中，我们触及了天堂。就像那些神秘主义者，在闪电的瞬间瞥见神的面庞，惊愕不已。紧抱所复活的，是爱人的贞节。这里的贞节，指的不是引发邪心的小女孩的处女膜，而是在爱抚中重生的一种品格，无限重生。我刚刚将手放在这个人身上，厌烦了我的贪婪，她已远不可及。相拥，重生。我待在对方的边缘，永远的陌生人，就像摩西止步于乐土的门槛。

(3) 泛滥的表白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从小时候起，就从未怀疑自己是受到宠

① Emmanuel Levinas(1905—1995)，法国哲学家。——译注

②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整体与无限》，1990，Livre de Poche，第289页。

爱的那一个，是被期待的那一个[①]。这种确定让他们释放出光芒，确保他们将成为别人的意中人。当然，生活常常惩罚这些被宠坏了的孩子，惩罚是残酷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可战胜。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地享有这种一直被宠爱的保证。爱，创造出一种新的“我思论[②]”：你爱我，则我在(克雷蒙·侯赛[③])，我爱你，则我们在。然而那种源自对方的爱的存在，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我爱你”这种表达，可以成为日常联络感情的万金油，就像在那些好莱坞电影里一样，甜言蜜语在父母、孩子和伴侣间泛滥。戏剧的主人公不再有名字，他们都叫做“我的爱人、亲爱的”，哪怕在互相痛骂时。有感情冲动时说出的“我爱你”，它随着痛快的痉挛结束而失效；有匿名的“我爱你”，它不针对任何一个人；有咄咄逼人的“我爱你”，它好像扔出的一捆脏衣服；有安慰剂式的“我爱你”，它既可以安慰听者，也不会伤害说者；有恳求版的“我爱你”，它呼唤一种全权负责；有自恋式的“我爱你”，它表达的是：通过你们，我爱我自己。这是歌星说给观众的话，是大众偶像崇拜的高潮！还有长久沉默之后爆发的燃情宣誓，让听者既欢喜又害怕。伤人的，不是陌生人的冷漠，而是亲近者的冷淡，或是他们

① 参见弗洛伊德：“如果我们曾经毫无疑问地是妈妈最宠爱的孩子，我们一生都会保持这种征服感。事实上，这种对成功的确信，几乎总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② 笛卡尔学派的“我思故我在”论，简称“我思论”。——译注

③ Clément Rosset，生于1939年，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

时有时无的热情。我们以为将他们拥在心上,然而我们只是拥抱了一个空白。人们不相信紧紧相拥时给出的誓言,好像做爱妨碍了说爱。肉体尽兴时,舌头便脱缰,它什么都承诺。反过来也一样:被情冲昏了头脑的腼腆者,什么荒谬的告白都说得出口。

“我爱你”:完美的泛滥表白。它不是一定不可信,而是难辨真伪。那个炽热的秘密,沦落成重复不绝的老调。结果,从喜欢的人那里只得到一点基本的信息:他还爱你。这是唯一的讯息,而这也是决定生与死的讯息。所以说,所有的被爱者,都自然地具有致命性:是他,不是别人,没有人可以代替。即便他离开了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我还是认定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4) 情人变仇人的故事

爱的告白,是一张急等收钱的空白支票:送出的大礼变成对方的欠债,送礼人要收回本钱。我爱你:你欠我的爱,当百倍奉还。爱,成了交易术语: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开了一个账户,持续互相投资。如果一方在检查收益单时,发现自己的钱被偷了,那么这种平衡随即被打破。爱,首先就是脱离社会,漠视一切,除了爱人之外不闻不问。然而这种奉献要求补偿,甚至是带有利息的补偿。我爱的人,必须每日向我证明:我将他捧上宝座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为他摒弃别的温柔乡是正确的。

18 世纪初,英国的伦理学家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家庭中爱

的发展形成,总是伴随着无数的争斗和越来越深的仇恨[1]。一对情人,以前没精打采,离婚审判时都变成愤怒的斗士,短兵相见。这是关于人类本性,最令人困惑的教训之一。他们是如何从相爱走到互相憎恶?两种时间性在共同的生活中持续交叠:一面是共同经历的事件,幸福的或艰难的;一面是无情的缺憾,记入负债栏。关于美好岁月的鲜活记忆,关于冤苦点滴的悲伤回首。情人有时像放高利贷者,向对方赊借他们的心,又无情地要求对方为所有的错误买单。让对方付出代价:这句话必须字对字地诠释。作为补偿的钱,可以修复受骗者的自尊,做了太多的奉献,必须要求追回过期未付款。记录损失的匣子被彻底打开:我被骗了,我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给了你。在这个禁止将金钱和爱情挂钩的时代,赔款的要求重新被提出,因为金钱能够擦拭道德的伤口。大西洋彼岸,富豪们的婚前协约,至少可以让这些事更明白些:在婚前就确定离婚时富有者向伴侣支付的赔偿金额,这避免了将所有事都混为一团,避免了心的干扰[2]。

---

① Wilhelm P. J. Gauger,《1700 年伦敦杂志关于性别、爱和婚姻的观点》(*Geschlechter, Liebe und Ehe in der Auffassung von Londoner Zeitschriften um 1700*),博士论文(柏林,1965),第 300 页及以下。(法语译文引述自尼克拉斯·卢曼,《爱情作为激情》[*Amour comme passion*],Aubier 出版社,1990,第 196—197 页)

② 关于这个敏感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女性认为,即便是在女性得到“解放”之后,仍旧应该是男人支付一切;而一部分男性也认为被一个女人邀请很没面子,如果自己赚的没有对方多,那也是令人羞耻的。可以说,前者的态度前后矛盾,后者的态度愚蠢。人们总是想要旧世界的所有好处和新世界的所有特权。

爱，像斯芬克斯一样提问。在冷静的外表下，在微笑背后，它会追问到底。情人和追踪嫌疑犯的警察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需要明白的迹象，不相信任何人。他们能看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能听见最灵的耳朵也忽略的动静。一个沉默，一次犹豫，都让他们陷入困惑。他们把自己当成侦探和间谍：有人雇佣私家侦探跟踪自己的伴侣，有人侵入对方的电脑和手机，进行窃听。单纯的爱慕被看作是背叛的征兆，而光天化日的欺骗行为却被认作是忠诚的证据。有人只在爱抚中看到欺瞒，有人在被欺瞒中感到爱抚。怀疑和轻信都是一种无知。相爱的人，在阐释的恐慌中受折磨，将时间都浪费在破解这种熟悉而又生疏的语言上，这种语言叫做对方。

初相识时情人这样写："我配不上你！"日久互相感到失望的伴侣则说："你配不上我。"就像常说的那样：爱的宣示如同战争宣言，从此开始了争斗。强烈的激情可以转变成深深的敌意。理想中贬低在生发，喜爱中诽谤在酝酿。我爱你，我要你，我恨你，我讨厌你。笼罩在那些老伴侣周围的，常常是恼怒成羞的气氛，因为他们实在受够了所谓的"举案齐眉"和"相濡以沫"。伴侣的生活于是变成了一场战争，惩罚对方和自己在一起。当年小情人的窃窃私语，孵育出愤怒的咆哮，伟大的爱情沦落为琐碎无休的气恼。

(5) 躲闪的礼貌

有时候，情人们抗拒告白，将它弄得支离破碎，来降低危险。

他们用玩笑和不提来回避告白中应有的清晰。坦白不如暗示，将致命的袒露交付以后，留出放弃的余地。选择模糊的爱，不把爱的沉醉变成爱的交易。然而，很少有人能够保持足够理智，管住自己的嘴，懂得躲闪的礼貌：大多数人总想知道感情到了哪一步，以平复内心的纠结。这种质问浓缩了爱的全本剧情：占有和抛弃，吐露和反感，迷乱和法则。几何般准确地拿捏：在坦白里乔装，在袒露中遮掩，在真实中说谎。"我爱你"不是结束，它拉开了新的一幕。虽然情人们背诵了第一段台词，但却不知如何继续。只有时间能证明那段开场词是否具有力量，还是仅仅是胆小者用来驯服对方的咒语。

有一种"我爱你"是纯洁的奉献，就像父母对孩子的爱：日复一日地给予，不求回报。"你是我永远不会厌倦的奇迹；你的存在，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礼物。"这样的话，不是用誓言来制约听者，而是让被爱者从我这里解脱。奇妙的是，这种奉献并不会将奉献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而是让他比从前变得更富有。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即便有一天他们会与我们疏远；我们给予孩子无尽的关怀和温暖，为了有一天他们可以走向自立。我们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他们的伤心令我们心碎。他们不属于我们，不亏欠我们，时候来临就会离开我们。在渺小的人的脆弱中，爱有它的弱点和致命点：它就是这丝纤弱的生命的火星，只求燃烧。所以，爱是允许失去对方，即便这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还有什么比没有家人的家更令人悲伤。爱是

将对方从我们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不让对方受困于不可能的职责：相爱。“被爱，是经过；爱，是持久。”（里尔克）

温柔的情伤（魏尔伦）

法国诗人阿拉贡著名的诗句——“没有爱是幸福的”，非常美丽但严重错误：它从结果的角度去评价整个爱。判决降临，毫不容情，无法改变。如果这句诗只是为了告诉我们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人类不可能得到绝对的幸福，那么它是多此一举。如果没有爱是幸福的，为什么很多人刚走出一段伤痛的感情，就期待再次陷入危险而又令人沉醉的爱情魔爪？应该支持反过来的说法：只要激情还在，幸福的爱情就在，即便激情总有一天会熄灭。何必费力地玷污和诋毁可能无法持久的东西，何必贱卖被夏尔·佩吉[①]称作“令人心碎的无法持久的伟大”？两个人能够给予彼此的最美好的东西，不只是交相辉映的身体、快乐和天分，还有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将双方永远相系，哪怕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分手。

伴侣的诸多小幸福：温柔的目光，耐心的倾听，一起完成梦想，两个人敢于去做一个人不敢做的事。只要有爱人在身边，见证我的点点滴滴，我就得到拯救。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益处：宽容。接受本来的我，接受我的弱点，不去批评。暂缓宣判。和爱人在一起，我可以做我自己。在社会上，我必须不断地证明我自己。懒得离开幸福的小窝，变成一只社会动物，戴上面具谈笑风生。两个人的愚蠢充满诱惑，不受指摘，可以幼稚，可以糊涂，可以给对方起各种小名。

琴瑟和谐的夫妇，陶醉其中，倾情演绎，相互有说不完的话。两个人的生活循规蹈矩，但那是一种幸福的循规蹈矩，是安全的承诺。熟悉的温柔，每晚有爱人在身旁的快乐。不要让对方感到爱的沉重，不要束缚，在最正确的间隔上建立最稳固的亲密关系。为了不再想念，为了不再承受相思之苦，我需要对方在我身边。

爱的苦痛，总是与快乐相生相伴，伤心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快乐，一旦消逝，总让人欲罢不能，苦乐交叠。人们可以诋毁爱，诅咒它，转而追求简单的浮夸，可是最终只有爱能够将我们带向高处，享受命运中最珍贵的时刻。激情也许注定没有好结局，但从未有过激情的一生更加不幸。

---

① Charles Péguy（1873—1914），法国诗人。——译注

第二部分

田园牧歌与时序

第四章

恋爱结婚的庄严挑战

要想真正了解妇女被抛入的苦痛深渊，要么变成女人，要么结婚。

——弗洛拉·特里斯坦，《女贱民游记》，1837

今天，我收到女友的两个短信。第一个短信说全都结束了……第二个短信说她发错人了。

——摘自 www.viedemerde.fr，2008

为了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试着摧毁爱你的理由。为了找到爱你的理由，我活得很苦。

——保尔·艾吕雅，《当前的生活》

19 世纪，在诺曼底的一座城堡里，一位老妇人在弥留之际

回忆着自己光辉的青春岁月。在她旁边，孙女扎着金色辫子，给她念着报纸上的社会新闻。都是些有关嫉妒心的故事：妻子往丈夫的情妇身上泼硫酸；商店里的售货员小姐向她的年轻情人轻率地开了一枪。老祖母听了这些故事很不平，感慨旧日岁月的温柔已荡然无存：

> 听我说，孩子，我历经了三辈人，了解男人也了解女人。婚姻与爱情不是一个东西。人们结婚是为了组建家庭。家庭组成了社会，社会不能没有家庭。如果社会是一条链子，每个家庭就是一环。要想焊接好这一环，人们总是寻找相同的材料。我们只能结一次婚，孩子，这是社会的要求。但是，在一生中，我们可以爱二十次，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婚姻，是一条法律，而爱是本能，它将我们一会儿推向左，一会儿推向右。人创造了法律以对抗自己的本能，这是应该的，但本能永远占上风，不应该过于抗拒，因为本能来自上帝，而法律来自人间。

小孙女听了这些话，害怕地说："哎呀，奶奶，人只能爱一次。婚姻是神圣的。"老太太将旧日贵族的客套与浪漫主义的废话相对立，这个世纪已让所有生存的快乐都降了半旗。

> 你们相信平等和永恒的激情。现在人们在诗歌中宣扬为爱而死。我年轻的时候，诗歌中都是教男人们如何去爱所有的女人。但是，当心灵遭遇新的悸动时，人们还不是立刻就与旧情人说拜拜了。

莫泊桑[①]这篇小说的力量，就在于它模糊了时代，制造出万花筒式的效果。让今天的读者出乎意料的是，落后保守的竟然不是老妇人。出格的老妇人在言谈间表现得更加自由，而年轻的女孩则将自己紧箍在一种令人窒息的理想主义中。我们试图将这两种观点融合。像少女一样，我们相信爱的婚姻；像老妇人一样，我们顶礼激情，无论天长地久。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爱很多次。人们在两种伴侣幸福的概念之间摇摆：一个是静好，一个是激情。现代伴侣已成为它自身的主要忧虑、专属的苦恼和最亲爱的小孩。这是它既美又悲之处。

(1) 被摒弃的激情，增值的激情

婚姻，在西方典范的形式下，伴随着质疑和反对而生。有人认为它太肉欲，有人认为它太压抑。圣保罗一言以蔽之，将两性

---

① 莫泊桑，《从前》(*Jadis*)，Pléiade出版社，卷一，1974年，第181—185页。感谢Luc Ferry向我提及这篇小说。

的结合贬低为权宜之计：

> 我认为男人最好不要碰女人。然而为了避免淫荡，只能让男子有其妇，女子有其夫。我这样说是一种俯就，并不是一项指令。毕竟结婚胜过被烧死。

对于公元4世纪的圣耶柔米来说，“最下流的，就是像爱情人一样爱自己的妻子”。男人太爱自己的另一半，在她“不洁”或有孕的时候与她发生关系，这就是通奸。生育必须有休耕期①。对于圣金口若望②来说，婚姻存在的意义，与其说是生育，不如说是通过避免可疑的触摸来限制淫荡行为③。

从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到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和乌托邦人士，这一并行的传统以平等和激情之名，反对婚姻机制。夫妻的结合在他们眼里是一种丑恶的交易，是对妇女的压迫。在牧师和

① Jean-Louis Flandrin，《亲吻的时代：西方性道德的起源》(*Un temps pour embrasser. Aux origines de la morale sexuelle occidentale*)，Seuil 出版社，1983，第83—85页。

② 圣金口若望(347—407年)，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一世，因善雄辩而被人称为“金口”。圣金口若望是重要的希腊教父，被教会封为圣人。——译注

③ “婚姻机制的创立，基于两个理由：一方面让男人满足于一个女人，另一方面为了生育子嗣。但最主要的还是第一点。至于繁衍后代，婚姻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看看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家庭就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制约淫荡行为是婚姻最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到处是人的时代。”(引自 Denis de Rougemont，《爱的神话》[*Les Mythes de l'amour*]，Idée，Gallimard 出版社，1978年，第308—309页)

道德家的祝福下，逼迫女子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她不爱的陌生人，婚姻将人类变成商品，成为乔治·桑①口中“社会起始以来最野蛮的机制之一”。巴尔扎克的小说情节中充斥着这类可耻的勾当，年轻脆弱的女孩被卖给猥亵的老家伙，权宜安排演变成一场无期徒刑②。对爱情婚姻的呼唤源自于对这种“合法的卖淫”的抵抗(司汤达)，它嘲弄着一半的人类。一直等到19世纪末，公共权力才急迫地意识到婚姻应建立在双方共许互敬的基础上。

对于旧制度时期的贵族来说，公开地示爱自己的妻子简直可笑至极。即便真有爱的火焰，也要像克莱芙王妃的丈夫那样，到死才承认③。夫妻之间的温存可以是婚后感情酝酿的结果，需要时间的培养。蒙田曾经说：“一桩好的婚姻，当拒绝爱的伴随和条件。”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7世纪到19世纪间产生的现代家庭建立在夫妇和孩子间的亲情关系之上。这是渐渐庞大的资产阶级家庭模式，家成了与世隔绝的小小感情社区。从大世纪④开始，女才子们便向往一种维纳斯和丘比特最

① George Sand(1804—1876)，法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浪漫主义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驱。——译注

② “女人是一项可以通过协约获得的财产；她们是动产，随所有权变动而变动；准确地说，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巴尔扎克，《婚姻生理学》，1829年)

③ “我向您隐瞒，我不想让您觉得反感，不想因为做了一个丈夫不适合的举动而失去您的尊重”，克莱芙先生在将死时向妻子说。听到妻子承认她爱上纳穆尔先生，他遭受了山崩地裂般的打击。(拉法耶特夫人，《克莱芙王妃》，口袋书经典读本，1958，第212—213页)

④ 17世纪法国处于极其辉煌的时代，一般称之为“大世纪”。——译注

后胜利的婚姻，将女性从不停生育的重担下解放出来。这个乌托邦慢慢地在法国和欧洲蔓延：1792 年民事婚姻建立，同时伴随离婚的合法化，婚姻制度脱离教会数个世纪以来的控制。1801 年的政教协定重新建立宗教婚姻，民事婚姻并未废除。1816 年，复辟王朝废除离婚，直到 1884 年才重新合法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①]时期，爱成为一种共和国美德，与旧制度下的不道德针锋相对。婚姻成为一种爱国行为，调和了夫妇、子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脱盟的行为，但永远没有脱盟的心[②]！终于，1907 年 6 月 21 日，法国出台一项法律，通过减轻婚礼费用和简化婚礼形式，使得年轻人的结合可以跳过父母的认同，从而开启婚姻天堂的乐土[③]。从前，激情被视为致命之症，现在它成为婚姻的基石。

接下来开始了我们所处的阶段。在欧洲，三四个世纪以来，我们见证着一系列的历史脱钩：民事婚姻脱离宗教婚姻，圣事让位协约。伴侣关系从婚姻关系中剥离。70 年代，同居关系合法化。最后，人们又创造出各种结合形式，使结合本身问题重重。

① 1870 年至 1940 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府。——译注

② “是时候让爱重回它本应一直有的样子：有限定的灵活性，这是夫妻生活的必要条件。只有它具有识别或创造人与人之间配合的优先权。”年轻的共和国代表查尔斯·阿瑞克在《十九世纪的婚姻与爱》(*Mariage et l'Amour au XIX^e siecle*)中如是说。(引述自布洛涅的《西方婚姻史》[*Histoire du mariage en Occident*]，Hachette Litterature 出版社，1995，第 356 页)

③ 布洛涅，《西方婚姻史》，第 354—355 页和第 358 页。

1999 年通过的同居协议，一方面保障了伴侣间的财产转移，另一方面却也加速了伴侣的流动性：人们从此可以单方面解约，只需向初审法庭书记室提交一纸推荐函。(同居协议，以它的方式，恢复了相互摒弃[①]。)层出不穷的亲密关系形式从此进入竞争，加速了结婚率的降低(但并未影响出生率，至少在法国，出生率比从前更高了)：1970 年，人们祝福 40 万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这个数字到了 2008 年只有 27.3 万，降低了 30%。1997 年的离婚率为 12%，2006 年这个数字达到 42%[②]。

简言之，婚姻在某些西欧国家已一无是处，它有着多样的变形，夫妻关系已不再是爱的标准形式。单身和有配偶之间的界

① 自从 2005 年以来，同居协议向婚姻靠近，它提供与婚姻机制相同的财政优势，同时又享有更多的弹性空间。最初，同居协议是为同性恋伴侣设计的，后来使用同居协议的主力军实际是异性恋。2008 年，共有 14 万份同居协议被签署。

②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进程的几个历史阶段：1965 年 7 月婚姻制度改革将妇女从丈夫的监护中解放出来。1970 年 6 月，法律摈除父亲的绝对权威，从此母亲与父亲共同享有这项权威。1975 年 7 月 11 日，通奸罪从刑法中删除。1975 年 7 月 4 日和 1978 年 1 月 2 日的法律承认同居的合法性。1985 年，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管理家庭财产的问题上，享有平等权利。(来源：André Rauch，《女性阴影下的男性身份》[*L'Identité masculine à l'ombre des femmes*]，阿歇特文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2—206 页)。1972 年，立法者宣布婚生子与私生子享有平等权利。2001 年，子女平等继承权得到保障。2005 年，政府颁布条令，从民事法典中删除“婚生”和“私生”字样。在西班牙，自从 2004 年离婚手续简化办法出台以来，仅 2006 年离婚率就增高了 74%，主要由女性提出。在法国，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伴侣，不到二分之一的儿童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三十分之一儿童的父亲并非生父。然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为避免儿童遭到遗弃，拒绝做父亲的亲子鉴定。

限逐渐变得模糊，人们强烈地想要从这两种状态中轮流受益。从此，"试爱"成为可能。人们在周末和假期展开亲密游戏，浅尝辄止，不受伤害。脱下配偶关系铅注般沉重的外套，轻装上阵，随意脱换，随意结合。伴侣们逐渐摆脱传统夫妻关系的三要素：公开性，稳定性，庄严性。或者说，现在的人们既想要这三个特性，也想要它们的反面：不承担任何后果的公开性，口头承诺的永远，曾经拥有的潇洒。

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认为：自从妇女解放后，激情已荡然无存。消费式的享乐主义让宇宙游移不定（齐格蒙特·鲍曼①），并摧毁了那些最神圣的关系②。我们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推理：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感性化的时代。在"爱"这个残酷无情的上帝的判决下，配偶关系已死。毁灭夫妻关系的不仅仅是放纵和自私主义，还有人们对于永恒激情的追求，将之视为结合的基石。颠覆伴侣关系的是情人或伴侣疯狂的不妥协，不肯做出任何让步：要么狂热追逐，要么决然逃离，没有中间路可走。

---

① Zygmunt Bauman，1925 年生，波兰社会学家。1971 年因反波兰犹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人知。——译注

② 比如罗伯特·穆齐尔："我们是爱情的最后莫希干传人"，还有鲁热蒙、罗兰·巴特、奥克塔维奥·帕斯、艾伦·布鲁姆（"今天的浪漫主义，就是在妓院里维持处女之身"），再有众多的基督教小册子作者或马克思主义者。

（2）疯狂爱情的保守性

从恩格斯到 20 世纪的理论家们（罗素、布鲁姆），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解决通奸和卖淫两大社会问题的出路。再辅以社会变革，联系自由与吸引，爱情婚姻能够彻底改面人类面貌。在这场对于可敬感情的捍卫中，两个名字脱颖而出：鲁热蒙和布勒东。一方面，这个在 1938 年就受到萨特推崇的伟大瑞士历史学家不遗余力地为忠贞辩护，不允许婚姻这个词写作复数。他曾充满恐惧地引述年轻的得克萨斯州百万富翁在婚礼前一天告诉记者的话："第一次结婚的感觉真是好极了。"（一年后，她离婚了。①）对于鲁热蒙来说，婚姻的承诺要求的不只"美丽的热忱"，还有未来夫妻双方全身心投入，冷静面对时间考验。另一边，超现实主义之父布勒东在 1937 年力挺疯狂的爱，"婚姻的飞翔……最高希望的承载者，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被转化为艺术"，并邀请人们"将自己从任何与爱无关的担忧、恐惧和疑虑中解脱出来"。这位非凡的辩护人，1935 年在女儿欧泊出生时发出这样的祝辞："我愿你被疯狂地爱着。"然而他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尤其涉及爱情的不专一和同性恋话题时，

---

① Denis de Rougemont，《爱情和西方》（*L'Amour et l'Occident*），10/18，1995，第 318 页。

又显示出让人错愕的保守态度。关于不忠，布勒东给出了这样令人吃惊的分析：

> 如果当初完全是自由的选择，那么就没有任何借口再提出质疑。罪恶的源头便在于此，而不在别处。我不能够接受诸如习惯或厌倦这样的借口。相互的爱，在我看来，是一组镜像机制，它能将我忠实爱着的形象从上千个角度反射过来，那种陌生感总是比我自己的欲望更惊奇，比生活更灿烂①。

去除抒情的浮夸，得到的是梵蒂冈式的教条——婚姻不可破裂（但布勒东自己却结过数次婚）。

思想史上众所周知的现象：政教分离的改革者们，打着反对旧制度的旗号，实际上却常常更加僵化和教条。他们并没有掀翻旧的规范，而是将旧规范重建，以一副不容妥协的乌托邦面目出现②。爱情婚姻，一个建立在自重基础上的小团体，是一个高

① 布勒东，《疯狂的爱》（*L'Amour fou*），Folio Gallimard 出版社，第 136 页。

② 1956 年，另一位超现实主义者 Benjamin Péret 在一部著名的人类学著作中给优雅的爱下了这样的定义："最坚定的一夫一妻制的顶峰、最高的的升华、极值……一枚精神、肉体和心灵合而为一的钻石。"这是最狂热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勒伊斯布鲁克和圣方济各的世俗翻版。（《优雅爱情文选》[*Anthologie de l'amour sublime*]，Albin Michel 出版社，1956，第 9 页）

级伦理道德的结合。它应凌驾于心的摇摆和欲望的冲动之上。卢梭，这个对通奸最猛烈的抨击者（他自己曾与几个已婚妇女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暧昧关系①），将婚姻关系描述为"最神圣的，最不可侵犯的协约"，"不能在任何理由下"破裂，以至于"任何玷污婚姻纯洁的人都应被仇恨和诅咒所包围"。因为爱的承诺自愿成为绝对要求的发动机。鲁热蒙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紧绷态势。夫妻双方的忠诚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幸福，而是取决于一种荒谬的真实，一种"清醒的疯狂"，它要求每时每刻"耐心而温柔地施行"，"生机勃勃地浇灌"。奇怪的婚姻颂歌，它将不理智与秩序糅合：一次到永远，就像克尔凯郭尔口中的宗教皈依。

(3) 淫秽伴侣

过去的几个世纪将配偶关系与肉欲分剥开来。蒙田说："婚姻是一种宗教性质的虔诚关系，因此我们的欢愉应当是克制的、严肃的并带有几分庄重的。"如果说要禁止夫妻间淫荡的行为，这多半是出于对其脆弱性的不屑，而不是对于本性的压制。只有适度的钟爱和有节制的兴奋才能让双方保持距离。我们的先

① "这是卢梭个性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实际行为与理想状态背道而驰。在卢梭的世界里，充满了悖论和方向各异的诠释。"（Agnès Walch，《通奸史》，Perrin 出版社，2008，第 245 页）

人表现出的“更多是谨慎，而非假正经”(爱德华·肖特)。我们相爱，但欲望在别处。财产的传承和传宗接代曾经是首要的目标。但我们现在无需再畏首畏尾了：除了那些欧洲和美国的极端守旧的一小撮人之外，人们如今可以自由地选择、嫁娶或离开。不再有集体或族长硬要将两个人强按在一起。如今，肉欲和婚姻分庭抗礼。查尔斯·弗涅尔说：“少数的幸福者冷眼旁观着堕入婚姻陷阱的不幸的大多数。”从此伴侣生活与放荡行为一唱一和。两个人的厮守不再只是寻求对抗外界残酷的避风港，它还是一块发展独特情趣和幻想的试验田。

弗洛伊德分析，19世纪夫妻性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男性的双极性。为了更有力地贬低妓女，他将妻子理想化：与妻子的拥抱是日常短促的，避孕措施的缺乏使妇女处于不适时的怀孕的威胁之下；与妓女的放荡行为是刺激的，各种不妥的姿势。一位母亲不能像野蛮的妓女一样放荡。对于女性纯洁的浪漫崇拜呼唤妓院的遍地开花，天使曾是放荡之父。19世纪下半叶，极力想要根除不良风俗的改革家们开始宣扬“卧房是唯一的爱巢，它胜过小酒馆、小咖啡馆和其他坏地方”。延及所有阶层，这一运动建议满足夫妻间的色情饥渴，让不怀好意的诱惑没有市场——那是结不起婚的学生和单身者的无产阶级性爱的首选。曾经只在娼家那里才有的淫荡和放纵，现在在夫妻间进行。淫秽的文化从妓院转移到夫妻的床榻上。当嫖娼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泰勒制式的交配时——人们不是和妓女做爱，而是自

我掏空，热力四射的红灯街区实际上像冰一样冷——夫妻们狼狈为奸，极尽各种放荡。

性协作并不是什么新闻，标新之处在于人们对性的过度期望。从前的小事如今已经变成关乎所有人的大事。伦理道德的解放重新定义排列了爱情行为中的优先事项：从前，在女人屈从之前，一切已万事大吉；现在，女人宽衣解带的时刻，一切才刚刚开始。被批评为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现在被要求做一个情人，要有工具、有手段。因为女性已不再羞于表达欢愉。另一边，人们也要求女性有条条对应的能耐。那些呆头呆脑的笨拙女子，会遭到毫不客气的讽刺。现代色情主义受制于成绩的枷锁。情人们相互取悦对方：不然，这浪荡的一对就变成了起诉双方。草率起稿的人要遭殃了！在这个领域，我们都是索取欠款的权利所有者。

性被赋予了一项新使命：测量夫妻的幸福度。根据从前的角色定义，夫妻角色的成功与否只问道于快乐，而如今色情主义成为新的意志，为夫妻生活指路。性并不可怕，它反而给人安全感，它使爱可以计算，将转瞬即逝的强烈情感转化为可以记忆的一串情节。在密闭的卧室中，情人参加幸福考试，他们向内心陪审团展示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今天的黄片是什么？无非是最新的摄制与厨房旁、花园旁的家庭艺术。谁是观众？无非是那些渴望在搂抱中寻求刺激的夫妇。他们有时也录制自己的做爱过程，将互相嬉戏、自我欢愉或与邻居苟且的画面传到网上。既然

情感不是欲望的对立面，而是它脆弱的兄弟——温柔的电波比肉欲的电波更容易蒸发不见——那么肉欲的激情便承担起了测试伴侣关系牢固与否的任务。

于是发展出一种释放压抑的教学法，帮助人们卸下顾虑。上流社会也在接受此类专家的培训，学习刺激会阴，保持胯骨姿势、敞开"能量中心"，了解亲密抚摸的艺术。对他人身体的了解要先从了解自身开始，手淫成为交配的预科，是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认识的练习。医生、精神病医师、夫妻关系培训师竞相登场，鼓励尽一切可能满足疯狂的肉欲。

我们生活在色情主义的旅行神话里。情人好像旅行家，有两种路线可供选择：一种是传统的，传教士的姿态，保证舒适；另一种是探险式的，提供各种奇特经历，抽打擦了爽身粉的屁股，五花大绑，三人行，鸡奸等等。尝试各种最放肆的做法，就像去远方的国家探险：加勒比海地区、中国或坦桑尼亚。除了自己温柔的另一半，我们还指望和谁一起投入到放荡中呢？只有我们的另一半会在疯狂的性虐游戏之后，依然给予我们爱抚和轻柔的吻。在本分的地方做疯狂的事，现代夫妻正具有这种模棱两可性：一面是传统保守的形象，一面是令人难以启齿的放荡。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被称之为蓝色花朵的淫荡中，罪与罚，温柔的私语掺杂在污言秽语中。床头柜成了性用品店的附属柜台，成了情趣内衣和各种假体的仓库（不要忘记，最佳幻想总是最原始的）。就算这些异样行为一般来说不过是轻量级的尝试，而且在

相对包容的环境中保持了私密性。关键是它们在媒体的交头接耳中进入到大众的想象里，形成当代性话题的共同地平线。

（4）身不由己的节操

现代夫妻的噩梦，是眼看双方的相处变成一对太监式的结合，就像"铁轨上两节废弃的车厢，在爱的动作式里相互惊吓"（茨鲁娅·沙莱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性学家、教练和前色情片明星碧姬·莱尔（Brigitte Lahaic）的角色，他们都在广播和报纸中变身快感教练，让客户摆脱负罪感，为人们揭示所有关于肉欲的秘密。他们像传授烹饪方法的厨师一样展开美食劝诱，又像严肃的教练一样手把手地引导你在复杂的迷宫中行走。他们是导师和巫师的结合，教学模式与启蒙模式并施。他们说教式的口吻既严肃又别致，在私密的话题外包裹了学院派的高贵语言。这些婚姻咨询师反对一切过激的解说方式（一些"后起"的广播节目除外，它们保持了经典的顽世风格），他们要的不是颠覆过去，而是展望未来，他们邀请每个人触遍自身感官的每一个按键。

"唤醒你的欲望"①——我们关于性欲失常的担忧是如此巨

① 《唤醒你的欲望》（Réveillez votre désir），载《心理学杂志》，2009 年 7—8 月。

大，以至于每个月，每季的杂志刊物上都有这样的呐喊。现代情人的荒唐赌注，是想要将激情和地久天长结合在一起，水与火的组合，最后很容易二者皆失。时间有足够的力量让最疯狂的欲望淡化。即使是火的脾性也终将冷却。人们不能接受自己对于对方的欲望减弱，我感到气愤，因为你不再让我有被吞噬一样的冲动，我们之间潜在的色情波澜眼睁睁一点点被中和。然而，该责备的不是对方，对方只不过是像我自己一样的可怜人，该责备的是机制的缺陷。可持续的性关系是现代社会最感人的乌托邦理想之一。即便人们将欲望似圣火一般供养，欲望依然破灭，留下悲剧的侧脸。两个人，从前在一间屋子里，独处不到五分钟，就忍不住要扑进对方的怀抱；后来共同生活，年复一年，除了几段插曲，再无波澜。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有几分痛心。想要长久保持肉欲的企图，是西方爱情史最感人的一页。然而当欲望枯竭，节操比压抑更有效。这再次证明了我们面对"激情的生物钟"时，是多么的无助。（让・迪迪埃・文森特）

（5）婚姻爱情的美丽疯狂

我们这个时代的荒唐，浓缩在这样一个失去理智的梦里：全部集于一身。一个个体要承载我所有的期许。可是，谁（无论是富甲天下者还是生活的寄生虫）能符合这样的标准呢？欧洲离婚率的高速攀升，根源并不是自私主义，而是理想主义：无法共

同生活与不知如何面对自己息息相关。欧洲夫妇的分崩，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只剩下爱情，只剩下"神的闪电般的一瞥"（安德烈・布勒东），这是全部问题所在。小舟不堪负荷，承载了过多的期许，最终只能以搁浅作为结局。使我们受伤的不是心的干涩，而是心的潮湿，感情过剩。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依然相信伟大的爱情。然而，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人，脆弱的、不完美的人，而不是一个令人沉迷的抽象的概念。爱爱情胜过爱一个人，那么你钟爱的只是理想。爱从前被排除在婚姻之外，情感将其从内心清空，之后爱又产生过度的野心：贪婪注定失败。当爱没有了能够让它愈挫愈勇的阻碍，它就不能不想办法重生。爱的终结者是顺境，而不是逆境。人们说激情是不可抗拒的。它或许能战胜一切，但它战胜不了自己。经典的悲剧情节是不可能的爱恋与残酷秩序的对立。现代的悲剧情节是爱死于自己的剑下，爱死于爱的胜利。爱在爱的行进中自我毁灭，它的顶峰就是它坠落的地方。浪漫从未如此短暂，瞬间跳跃至夫妻关系，因为现代社会中男欢女爱已没有阻碍。这种悲惨更具隐蔽性，它源于饱足，而非饥渴。

现今有一种普遍的病：人们没完没了地寻找心仪的目标，失望后再找别的代替，一而再，再而三，就像一串鬼火一样忽明忽灭。冲动之后重归冷淡，永不满足。每次我们在不理智的情感中结合，就想起这种不靠谱的一见倾心，正如司汤达所说的，"在一个夜晚，我们相信我们一辈子会爱这个人"。在一起后，心灵

伴侣总是不够美丽，不够聪明，不够放荡。白马王子只是不会做爱的蠢才。性感女郎完全是一个神经质的性冷淡，一个脾气暴躁的泼妇。所有的追求者都考不及格。这就是我们的地狱，是社会进步的黑暗面：人们无法找到符合内心标准的另一半相爱。不是因为别人很差，是因为我们自己贪得无厌。

于是三十岁起，各自逃亡的模式便在伴侣间启动，他们害怕被淘汰，害怕夜晚的相守，对着电视发呆，吃着速冻食品，竖着耳朵等待电话铃响起。在网上或特殊聚会中渐渐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旧货市场的现象，即第二次选择：受伤的心灵相互结合，双方都曾经离异、多次再婚。在游荡的找寻中，对陌生人迅速产生爱的火焰，随即迅速熄灭、终结，又不着边际地勾搭上难以想象的人。

二十年前，我在马德拉斯遇见印度作家雷杰·饶（Raja Rao，2006年去世），他是马尔罗的朋友。他年轻的时候，曾去过法国，那时候，他相信，要想了解爱的真谛，必须要娶一个欧洲女子。

在一部寓言小说《蛇与绳》（1960年）中，他讲述了这次结合的失败经验。欧洲人追求幸福的意愿过于急切和膨胀，没有耐心，这让他很失望。他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印度），我们将一锅冷汤放在火上慢慢加热。而你们将热汤盛在冰冷的盘子里，逐渐冷却。"西方夫妇深陷极致情感的神话，那是一种疯狂浪漫主义的浩劫。错误在于他们过于严肃地对待爱恋，以至于

不能容忍任何瑕疵。你准备好为所爱的人牺牲了吗？我更加准备好与所爱的人一起生活：日常的美好见证的是每时每刻的忠诚，相比之下，那些极端而危险的想法一无是处。从前，情感教育有一部分与幻想破灭相关。必须在心的弯路上找到坐标，避免理智的迷失，逃离青春的幻影，重拾神谕和道德的大路。而当今的文字教授相反的学问：如何拨旺欲火，如何给激情升温。与旧时代相比，可谓是翻天覆地的转变。旧时代认为激情是致命的，脱缰的激情会种下不幸，现在的时代痛恨的是不温不火，是有气无力。我们想要诗意和快乐，我们实际只得到激情的假象，只是解了烦闷。令人生畏的不再是无拘束的行为，而是冲动的丧失。

老情人们的自杀

夏多布里昂在晚年爱上一个年轻的女孩，遭到拒绝；年老的卡萨诺瓦（在阿图尔·施尼茨勒的一部小说中）夜晚扮作年轻人去勾搭一位少女；72岁的歌德向一位名叫玛瑞拜德的17岁女孩求婚，遭到拒绝；年过半百，生活在罗马的美国人斯通夫人（在田纳西·威廉斯的一本书中）爱上英俊的20岁小伙保罗，遭到对方拒绝后认为"虽生已死"，自己的存在已倒塌成"一片废墟，就像一座帐篷的中心支柱被抽走"。很多的例子提出了同样的

一个问题：如何学会退场？答案很简单：别人会将我们赶出场外的，宣布我们的欲望已经不合适，人们不能让肉欲横流的老家伙勾搭青年（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和偏见对于女性更残忍）。

比这些老家伙的虚荣心更感人的是老情人的死。有些情侣，像树根一样互相缠绕，形成拥有两张面孔、两个名字的一个人，一个我们。这个我们不能再分开成各自的我。于是，一个人的苦痛也是另一个人的苦痛。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动人地说："当我妻子的腿痛的时候，是我在受罪。"也有这样的例子：当夫妻双方中一个人得了重病，另一个人决定绝不独活，决心随另一半一起离开。2007年9月，安德烈·高兹的妻子得了难以逆转的重症，高兹在献给妻子的书中这样写道："你刚刚80岁，身长矮了6公分，只有45公斤，但你依然美丽、高雅、性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0年，我现在更加爱你。最近，我再一次坠入你的爱河，我的心潮涌动，只想把你拥入怀中。"[①]在他们之前，其他夫妇，比如前社会党参议员罗杰·基约和他的妻子，在1998年时曾决定要结伴离开人间，共同谋划这场永别，在拉下帷幕前满心快乐和平静（可惜基约夫人吞了药片之后没有死，不得不学习面对可怕的孤独）。既然可以策划一场最后的二人旅行，为什么要等待自然将我和我唯一的爱人拆散？提前谢幕总比被迫坠

① 《致D》，安德烈·高兹，Galilée出版社，2006。（中文版由袁筱一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注）

台要好。正如约翰·邓恩所说：自杀是自身豁免权的持有者，与罪恶不同，自杀只能犯一次。

比自己的死更糟的，是亲人的死，那些人是我们生活的支柱和最基本的元素。独存毫无意义，必须审时离开。还有什么比费莱蒙和鲍西丝的神话更加美丽的故事？在生命的尽头，他们恳请朱庇特将他们缠在一起，变成大树。或许，老情人们的自杀，比青年的爱情嬉戏更伟大。青春是奔放的，而暮年则是优雅的。"我将化作尘埃，但那是爱的尘埃。"（克维多[①]）

① Quevedo，17世纪西班牙巴洛克时代的诗人。

第五章

摇摆的忠诚

我本应为我犯的错感到赧颜；我却为那些我不能再犯的错感到惋惜。

——阿伯拉尔

人们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单纯的，别人的欲望是不怀好意的。

——普鲁斯特

别相信兄弟，因为兄弟都扮演雅各的角色；所有朋友都互相诋毁，互相欺诈，互相欺瞒。

——热雷米

6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社区，四十多个青年男女以

严格的性共产主义原则生活：即禁止结成法定伴侣，要轮换伴侣，严禁以审美和文化标准择偶。一年后，一些肥胖或丑陋的参与者，被拒绝在卧室之外，整晚在阳台上徘徊，恳求一张床栖身，不断地重复：谁要我？

这个反例成为传统婚姻的最有力论据。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理性面对抒情年代胡思乱想的胜利。他们还引述了让·波扬(Jean Paulhan)的著名玩笑："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想结婚：人一旦结了婚，就得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所有其他的女人。我这样回答：如果不结婚，就放弃了所有女人再加上一个女人。"[①]这种诡辩说得很漂亮，但站不住脚：人们可以结婚，同时在一生中恋爱数次，经历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这永远不是一个人和所有人之间的选择问题。特别是在西方的发达地区，人们完全可以不通过市长大人的认可而过上快乐的恋爱生活。爱的世界，在它的每一个极端，都聚集了疯狂的拥护者：一夫一妻制或朝三暮四的支持者都邀约我们走他们的道路，不识抬举就遭到诅咒。他们的互掐着实令人厌烦。夫妻不过是纵欲的一个借口，它是特殊时刻的一种爱恋形式。这个时代真正的创新，是我们不需要再在难以忍受的禁令的缝隙间抉择，我们在一生中可以同时经历婚姻、单身和艳遇。

① 让·波扬，《与罗伯特·马莱谈话录》(*Entretiens avec Robert Mallet*)，Gallimard出版社，2002，第31页。

忠诚这个问题根本而又无解：保持坚贞非常困难，而背叛又是如此微妙。道德的解放迫使我们自己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当社会将从前的问题转移至个体的肩上时，它同时也将个人推向昏惑的境遇，而对这样的责任，人们不知所措。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加重了负担。想象一下，将最炽烈的爱置于重病或人生挫折的考验之下：多少失业者被伴侣抛弃，多少病重的人成为身边人的负担，被希望早日终结？我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我们只是简单的人，牺牲精神有限。

(1) 野蛮，真诚的女儿

资产阶级婚姻的危机导致其最流行衍生物的贬值：通奸。从前在伦理道德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却披上了真诚的外衣。两个个体的自由结合成就了一种非常小心眼的行为方式：有什么说什么总比往昔的花言巧语要好。一个世纪以来，嘲笑被耍的伴侣成为戏剧的招牌情节，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滑稽剧不可缺少的角色，特别是做了乌龟的丈夫。即便饱受诟病，通奸依然没有消失：它自古已有之，这种做法一直存在，而且成为婚姻解体的主要原因。它触及男女两性，人们为了摆脱烦闷，听从欲望的呼唤而相互背叛，过着多面生活。个人主义社会被理想的忠诚和自由的欲望向两边扯裂，形成这样的病征。通奸已与夫妻生活结盟，不可分割。两种说辞不遗余力地向

它发起攻击：一种是标准式的，一种是创新式的。第一种来自于精神分析学，它将通奸视为一种来自于童年时代的不可解的心结。阿尔窦·纳武立(Aldo Naouri)解释说，通奸用基本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法可写作：“游荡的成人，沉默的成人”，迷失的成年人，用沉默来拒绝长大。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中尽情放荡，我们只不过是对父母过度依恋的心结的俘虏。另外一种观点在“背叛”这个旧词中读到了自我否定，这种欺骗的疑云将最珍贵的爱恋腐蚀。最初的疯狂誓言，最终陷入可悲的虚情假意。

第一种驳斥讲的是道德；第二种驳斥讲的是情义。从此存在两种忠诚：一个是纸约，一个是心约。第一个是对于社会规则的机械遵守，第二个是心甘情愿地做出忠于爱人的决定。后者还可以继续分为对于别人的忠诚和对于自己的忠诚两种。随心而为的强烈倾向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在我们的爱情世界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恶行：对自己的忠诚允许我在背后捅上别人一刀。以有权改变心意为名，我可以食言。黑白颠倒的力量：如果我和某某上了床，那是因为在那一刻我不再爱你，我受够了假装对你有感觉。(无论男女，我们在爱里的敌人，除了自己还有谁?)不可辩驳的是，第三者是新鲜的。这就是他不可抗拒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美丽或智力。被耍的伴侣不再能以社会压迫为理由辩解：共同生活的破裂是一种侮辱，“戴绿帽子”成为一种个人失败。如果对方要去别处寻找爱食，那是因为我不再能满

足他的需要。

只考虑自己，这是明目张胆地冒犯。我不否认自己，我成长，一种更高的美德命令我背叛承诺，我的不忠是对自我的忠诚。叛徒式的背信将承诺践踏在脚下，以诡辩为支撑，成为最高形式的道义。于是，只要做自己，怎样都有理。现代社会对于真实的膜拜，将野蛮推向胜利的宝座。为了忠于自我，我们可以摒弃一切虚伪，不承担一丝爱惜对方的责任。只要说话人预告他将以诚相待，那你就等着难听的话铺天盖地而来吧。野蛮是殷勤的逆向工程：将对方像工具一样对待，用过了就丢弃。

(2) 省略的妙用

透明这个神话更像一种惩罚：把自己的每一寸疑虑、心灵最微弱的波动，都和对方分享，这简直就是不停地向对方开枪，直至千疮百孔。坦白的策略首先是一种不怀好意的策略：全盘托出，就是口不择言。适当省略，才是有礼貌有分寸的做法。我感谢对方向我隐瞒了他的某些想法。我们在更多时候情愿选择充耳不闻。就像克莱芙先生去世前在病床上对他妻子说的那样："既然你没有能够抗拒诱惑，你为什么要向我坦白你对纳穆尔先生的爱？我羞耻地承认，我是如此爱你，以至于我宁愿被欺骗。为何不让我像这世上其他丈夫一样，享受盲目的安宁？"康德的

寓言中描述了一个被追杀的人，藏身于一座房子里。康德认为房子的主人有责任将他交给追捕者，因为撒谎这种恶行是违背普世道德的。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对于这种说教不屑一顾，认为挽救生命同样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将所有的真相吐露给伴侣，如同把对方置于法庭之上，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胁迫。传统道德与此恰相反：说谎，是为了考虑对方的感受。挽救双方关系比坦白忏悔更重要。缄默，是保护；坦白，是伤害。与尖刻直白相反，体贴与慎重才是行动的原则。伴侣间，欺骗自有妙用：朦胧的隐情胜于正直的坦言。

欺瞒还有一种无可否认的情诱潜力：怕被发现的恐惧、即兴的约会、心照不宣的共同秘密，都给地下恋情增添强烈滋味，远非夫妻生活这碗薄羹可比。人们说谎不总是为了掩盖真相，有时也为了给生活添加浓郁色彩。普鲁斯特笔下多有被爱的女子演绎这类夸张情节，就像墨鱼释放墨汁来驱赶入侵者一样，只为摆脱情人的殷勤。最荒唐的行径成为标准。对亲人、伴侣和朋友的背叛，成为欲罢不能的毒药：背后捅刀的下手对象总是那些亲近的人，那些将弱点暴露在我们面前的人。亲密关系，是诡计的温床。情人间互相摧毁的黑色小阴谋卑鄙到让人惊叹。一个强盗在伴侣生活边缘窥视，抢劫的激情并未神奇般消失。他是夫妻生活的寄生虫，不断向内侵蚀最坚定的盟誓。(只有在对地下情的期盼中，共同生活才变得可以忍受，那是逃离的出口。)与伴侣的好朋友展开地下情，就是变相邻为杂处，在作弊中加入熟

识的刺激。这就是亲密关系的悖论,靠近只是便于更深的伤害。分享秘密会诱导犯罪。背信弃义者最初总是我们的兄弟或伴侣。

当然亦有不卷入第三者的背叛形式:退居内心深处,拒绝快乐,拒绝微笑,拒绝交流。身体上的严格忠诚,有些神经质的僵化:精力都花在避免出轨上,没有力气再去经营相爱。据说圣雄甘地喜欢在裸女身旁过夜,以考验自己的抵抗力。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忠贞的,其实他们只是懒惰,比起短暂相遇带来的困扰,他们更喜欢安于平静的家庭生活。另一些人对于诱惑浅尝辄止,临渊羡鱼而已:他们与陌生人调情,转头便逃之夭夭。他们不爱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只想证明自己的吸引力和性格魅力。他们可以像圣诗作者一样说:"考验我吧,主,诱惑我:燃烧我的肾和心。"(圣诗 25:2)风骚女子引诱男人,却始终什么也不给予,也是同样的问题。鲁热蒙带着钦佩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女性朋友的逸事。这个女子试图与一位已婚男人调情,没有成功,于是她在离开时说:"我把你加入我的一千零三名单之上。"[①]这样的女子不懂得忠诚为何物。这样的做法不会源自一颗安稳的心,只能来自一颗虚荣的心,这颗心沉醉于自己的力量,从不行动。这是披着道德外套的虚荣心。拉罗什富科说:"为了忠于所爱而相互伤害,不如不忠。"

① Denis de Rougemont,《爱的神话》,前揭,第 120 页。

禁止卖淫?

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期盼资本主义家庭的消失可以终结卖淫问题。这个问题曾是教育和社会革命急于剥去的一道心头疮。威廉·赖希在 1936 年预言说青年女性进入性生活将标志着色情业和性奴役的终结。然而,至少在民主国家,今天的女性虽然更加自由,但性交易依旧猖獗。性交易为何持续至今,我们可以找出上千条或好或坏的理由,但最主要的一条是:爱情的商业化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自由并不能保证爱欲的公平分配,太多人因为他们的贫困、卑微或者老迈而无法享受到爱情的乐趣。

美化它注定是徒劳:卖淫依然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职业,甚至被认为是极其肮脏的;卖淫者因此备受客户的刁难,警察的盘剥,还有老鸨的殴打,老实人的责备。由于贫困和生活不稳定,不少男女在众多名声同样不怎么好的职业中选择了卖淫作为营生。哎呀,看看有关这个主题的辩论,真有点像是在猎巫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动的女权主义者,右派和左派中的保守分子,大家都联合起来对失足女落井下石。[①] 最近,失足女的罪恶

① 就这个主题,Lilian Mathieu 的《妓女的境况》(*La Condition prostituée*, Textuel, 2006)值得一读。该书很好地复原了这场论争在法国的情形,虽然带有严肃的保留意见,但仍然支持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国模式:宽容,但不合法化,仅打击拉皮条和拉客。

标签被拿下，她们转而成了受害者，只是误入了自愿被奴役的歧途，而应当得到治疗。以前，我们将她们视为罪犯，今天又把她们看成是孩童。各种“性工作者”协会一直都在呼吁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而人们却认为这些协会是受人操纵、是没有独立性的喉舌而已。

妓女、皮条客、人妖等等，不是在为消灭而是在为改善自己的职业摇旗呐喊——这令有良知的人大为震惊。人们想的是拯救他们，但他们只想着让职业正常化。实际上，左派里面也分为两派。一方是自由派，他们坚信个人选择的多样性，以社会进步为依托想要尊重这些人；另一方是惩罚派，他们希望纠正个人的恶习，只认准这样一句口号：惩罚，改正，重新做人。这种左派以人的尊严为名，类似于中世纪的基督徒，为了灵魂得救去杀戮异教徒，去烧死女巫。

既然我们找不到好办法，既然我们发现自己正航行于两块暗礁之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两害相权取其轻：让从业者尊重这个职业，允许他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想要离开这个职业的时候，不会因之而打上烙印。保护他们免受老鸨的欺凌，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们为公众提供的服务，这些做法让他们这些孤单的灵魂有了些许慰藉。卖淫是所有焦虑的汇流点，是令人厌恶的赘生物，色情交易令社会惶恐不安。这个社会相信已经解放了厄洛斯，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无济于事，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所以，我们应当做的，也许只有赋予这

些社会助“性”师与其他工薪阶层相同的特权，除去加在他们身上的诅咒，不让他们因此受到封印。

让我们更进一步：既然女性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为什么不为女性开设男性妓院，允许她们付钱选择自己的情人，享受肉体上的片刻欢娱呢？非洲和加勒比已经有了为女性服务的性观光，应招男孩的网络也不少见了。至于那些经典的反对意见——女人太过情感化了，她们不会耽溺于某种匿名的色情——它们将女性本质化了，将一种文化条件与自然的事实混为一谈：男人得知道，我们的另一半也有不少于我们的性冲动，我们也不见得在情感化上不及女人。我打赌，若是明天开了专为第二性服务的享乐场所，那些客人会被人们当成妓女看待，人们会指责她们为了报复而去寻找微不足道的安慰。这就是女性，不论是购买还是出售性服务，都是受到禁止的。这无疑是与时代不符的咄咄怪事。今天，女性能够养活自己，也想要风流快活。为什么小白脸受到的谴责没有妓女那么多，即使他们从事的是相同的行当？我们依然在用生殖来隐喻女性的身体，这样做是以偏概全。男性有一个性器官，而女性就是性器官。性会让女人迷失。今天离弗洛伊德的时代已有一个世纪之遥，但众多人还顽固把持着这个过时的偏见。就是如此。

(3) 欧洲，美国，不同的禁忌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最近几年在北美轰动一时的几件丑闻：1991 年保守派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控对大学里的一位同事进行性骚扰；倒霉的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闹出了绯闻；2007 年纽约州州长艾略特·斯皮策，这位反卖淫运动的旗手，被发现与一位美貌的 22 岁女子进行性交易，令政坛大失所望；而他的继任者，由于害怕日后媒体的披露，在就职演说时当着妻子的面公开坦白自己婚姻中的出轨行为；随后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与旧日女下属保持亲密关系的攻击。每次，美国——不论左右——都会为床笫故事而激动起来，就仿佛这个国家的根本纲领受到了动摇。人们已经不再问政客：您爱您的配偶吗，而是，您欺骗过您的配偶吗？错误犯在规范之前。除了老头子们逢场作戏的表演，在应召女郎怀中碎了一地的节操以外，争论的激烈程度足以让法国人瞠目结舌。在美国，有科学家在寻找婚姻忠诚的基因，给那些爱拈花惹草的人接种；人们会用蜂蜜陷阱（honey traps，也就派人去试探、勾引自己的伴侣）来测试伴侣是否忠诚；人们赞颂动物王国里南极的企鹅大帝，因为它是节制和一夫一妻的典范；人们举行学术研讨会，像苏联对待异见者那样改造出轨的丈夫，而家庭治疗团体还解释称，“妻子受到背叛后的反应，与 911 之类的重

大灾难性事件受害人在创伤后因为压力而表现出来的综合征近似”。这样的类比在我们法国人看来也许是无稽之谈。政治家要做私生活的典范我们还能理解：公共人物并不属于他自己，如果他想要对他人行使权威，就应当首先能够约束好自己的本能。[①] 但为什么这要求必须延伸到普通公民，为什么我们要求他们的行为也要无可指责呢？

这着实是一个奇怪的翻转：给人感觉，美国人已经抹掉了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所说的，满足私人的恶德可以推动公共利益。[②] 而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之际却在徒然地尝试建立“德性共和国”。这就是美国人，他们忘却了政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的分离是现代性的成果之一，所以尝试在风俗层面建立一个善的社会，根除人类内心的腐败。在爱情中不忠，几乎就意味着在质疑 1787 年由来自不同等级、种族、宗教背景的人们所订立的那纸社会契约，婚姻成了建国誓言的象征。美国人私人的那个我仿佛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家庭是缩小版的祖国，如果家庭因为夫妻不睦而动摇，那大的祖国在危难时又会怎样？保守派的首要论据就是：欺骗

---

① 在哲学家对旧制度的批判中，宫廷的道德腐化是用高压统治臣民的君主专制权力的明证。专制权力在道德上纵容他们，让他们忘记自己所受的政治奴役。参见 Agnès Walch，前揭书，第 351 页。

② 别忘了亚当·斯密的名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善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帮到我们的并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

配偶也就是背叛国家，恰如其分。所以，这种过错应该公开忏悔，而且还要摆出集体赎罪的架势——所有人，通过当事人的荒唐行为，驱除掉自身的弱点，通过鞭笞违背规范的行为来重建规范。

美国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与欧洲（尤其是法国）有显著不同？在欧洲，国家首脑或者个人的亲密关系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无疑，这里面有文化差异：美国人相信婚约的神圣性，法国人将婚姻的圣事契约化。美国人按照字面解释婚约，法国人按照精神。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禁忌不同：在法国，天主教传统规定，金钱是污秽的，而在清教传统的美国，性才是。“贪婪是好的”，美国人如是说，“法国人是有弹性的：我们甚至能在长靠背椅上翻身”，法国人如是回应（拉马丁）。美国人用对利润的无尽渴求平衡了虔诚的清教主义。一头是对财务成功的大加赞赏，另一头是对人类弱点的极大宽容。但正所谓所有道德家终会有一天跌入自己所谴责的罪恶之中，所以法国人对金钱的厌恶并不能阻止其精英的腐败，一如美国人的德性誓言未能阻止通奸行为在美国各地的盛行。当代社会难以接受自身非道德的方面，唯有诉诸纪律、宗教或者精神治疗。不过，在风俗层面，我们没法劝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向旧世界学习节制。而在这个全球经济危机的时代，我更不确定法国人是不是应该吸取美国人的利益动机。毕竟，贪婪引发了全球的动荡，轻佻却没有那么危险：卡萨诺瓦比麦道夫要可爱。一个强大的民主制能够宽容个

人纽带的变动和个人的缺陷。要求男人或者女人毫无过失、忠贞于婚姻，超过了人之所能及。“腰带下面，既无信仰也无法律”，这句意大利谚语精彩极了。说到底，真正的忠贞比身体上严守戒律要求更高，而如果有强大的爱情，这些插曲都能越过。罗素 1929 年在他讨论《婚姻与道德》的散文里开出了一剂法式的良方：不论妻子还是丈夫，面对一时的出轨要有极大的宽容心，只要出轨没有侵入夫妻生活，也没有影响到孩子的教育。婚姻的平静取决于夫妻间的种种小安排，它们是雅致夫妻生活的真正体现。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至少有一次欺骗或者被欺骗的经历，但不论被骗是多么痛苦的考验，人们总能熬过配偶一时的飘忽不定。

从某些方面讲，通奸也许可以看成是夫妻生活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它是一种休战，一种通过走点弯路来重建婚姻联系的方式。18 世纪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法国北方以前有一种情人制度（valentinage，情人节，圣瓦伦廷节即来源于此），它允许一年当中妻子有若干天可以在丈夫知情或者监视的条件下与一位“瓦伦廷”（即这位夫人所选择的殷勤男子）做爱。“友善分享”（傅立叶语）成了夫妻生活中有益的插曲：它是一段探险的时光，使一方快乐，而同时没有让婚约失效；它通常能强化本已经摇摇欲坠的婚约。这种交换主义，如果不是通过接受在对方监视下出轨，从而抵御婚姻所受侵蚀的技术，又是什么呢？我把妻子、丈夫借给你一晚，然后看得紧紧的，为的是一会儿更好地把他

(她)找回来。监控下的偷情,总比不可控的放纵好。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去激情俱乐部一定要做到这一条:不与激情伴侣接吻。各种各样的怪念头都是允许的,唯独嘴唇和嘴唇不能贴到一起。如果两人中有人忘了这条规则,他就会遭到责骂,这对情人于是在一片纠缠着的肉体中一丝不挂地相互谩骂起来。占有欲去哪里给自己筑巢呢?

(4) 调查的谵妄。

毫无疑问,嫉妒是一种很卑劣的情感,集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和占有欲于一身;它常常会以食人行为而告终,与其让伴侣逃掉,嫉妒的一方更希望象征性地将其吞食掉。即使能把伴侣关入囚室,嫉妒心还是会侵扰入梦,使人难以入眠。对于某些人来说,嫉妒已经成了某种集怀疑和调查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是发动起爱情马达的唯一办法。强迫性的嫉妒在事情没有浮出水面以前便假想出一些出轨行为,而如果事情是真的,倒反而能减轻而不是加重嫉妒者的痛苦:他自称痛恨出轨,但其实几乎是在希望它会发生。所有嫉妒者到头来都驱使自己的担忧成真,这一点令人们感到高兴。

剥去外壳,嫉妒只剩下那卑鄙的内核。但不论如何,这种情感不是一笔就可以勾销的。想要将激情上的污点清除干净,就好比是要用深思熟虑或者投票来筛选议会中每个人的欲求。比

如我们会要求偶尔走入迷途的权利,并依靠相互性要求另一半由衷地予以承认。我们会怀疑这幅婚姻的肖像画是不是天堂社会主义色彩的公然翻版。为了消除折磨,就需要有同时的欲望,伴侣的每一方都获得了满足,需要有对等的时间向他们提供从陌生人处满足强烈欲望的机会。如果有一方晚上在和情人缠绵悱恻,而他的伴侣却独守空床,又会怎样?改革者所寻求的,更多是纠正情感的暧昧性,而很少为情人的愉悦感考虑,这个印象很是奇怪。人们不信任摇摆不定的态度,一心想要矫正它:我们对此十分坦诚,毫无隐瞒①。但这里起作用的依然是一种浪漫的幻象,也就是夫妻交融在一起的幻象:夫妻的灵魂相通,推心置腹。两人无话不谈,没有秘密,光明磊落。劳动世界里的"开放空间"政策,用的也是相同的原理:办公室没了遮拦,所有举动都成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政策的主要效果,是不再有人交头接耳。

然而,嫉妒也与民主制下的平等相伴相随:无所不在欲与嫉

① 参照 Serge Chaumier:"开放婚姻为两性提供了平等地位,废除了规范的两面性,实现了必要的家庭任务和子女养育责任这两者的平等分配。它摆脱了通奸,摆脱了对于配偶而言十分危险的双重道德标准。夫妻间的约定确定了诸多界限,对此双方都愿意遵守。这样也就可以与双重话语进行斗争,甚至将其推翻……开放夫妻更多地将不忠看作是与虚伪如胶似漆的双重话语带来的错觉,而不是一种第三方公然插入的关系。不过我们要重复的一点是,并非所有开放夫妻都能接受与第三者的任何形式的关系。他们之间也许会有十分复杂的规定,但开放的原则依然是双方所认可的……随着他们婚姻历程的不断推移,契约也在不断重新定义。"(《爱的开裂》[*La Déliaison amoureuse*],Payot,2004,第 272 页)

妒是近亲。所谓无所不在欲，说的是希望即使在自己不在场的同时也能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不仅仅是对受骗的担忧，也是面对他人的不透明性时感到的晕眩；这种不透明性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我都无从知晓。而事实上，我不可能住到他人的脑子里，不可能像进入到驾驶舱里那样去操控他，去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得知他的打算。他还有上千种可能的生活，我是永远不可能了解的，关注它们也会剥夺我自己的生活。

我们离摆脱荒谬的占有欲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两种嫉妒将我们瓜分了：嫉妒我们的独立性和嫉妒他人。我们在这两个姿态之间搭建起临时的妥协，我们以较低级别的排他性为生活方式，这种排他性专横而又随和。双重生活，三人行，群爱，各过各的假期，找应召女郎或者牛郎，当代的夫妻展现出了相当的柔韧性，在两人世界里认可有益的第三方，后者可能置婚姻于险境，但也能让婚姻脱胎换骨。付费的性服务让两人得以享受多样的情欲，而不必担忧私生子的问题。金钱是消毒剂，消除了感官小插曲中一切的情感暧昧性。和过去一样，夫妻的地下生活（色情产品，卖淫，换妻，通奸）支撑着合法的夫妻生活，美好的爱情在向地下的、非法的储备汲取力量。而这些都是秘密，是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的。（我们常常会反对说，年轻人会大规模地回归到一夫一妻和忠贞不渝的举止上来。但这个圣洁的心愿没有根据：年轻人虽然欲求打破68年的糟粕，但他们心中的浪漫并不比他们的长辈弱。新一代的存在方式是否会发生剧变，是一个有待

证明的命题：新一代人最初都是复制他们继承下来的行为方式，即便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也难以不让人想到他们的父母一辈。）

以前，人们讥讽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结合。人们批判他们最初的约定，批判他们对偶然的爱情和必要的爱情的区分（这是受到傅立叶的直接启发），批判他们想要同时与多人交往而又奢望能够保持两人的关系。人们指责他们偷偷将男孩女孩带入圈子里，供他们交换。这些男孩女孩就好比是他们两人不固定的妻妾，成了他们这一不良行径的受骗者。波伏娃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有一个问题被我们草率地回避了，即第三者如何适应我们的安排？有可能这对他并无大碍：我们的结合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拥有爱情的友情或者同志之情，去寻求短暂的浪漫。但如果主角们想要得到更多，矛盾就升级了。这时候，一种必要的辨别力抵消了《年龄之力》(*La force de l'âge*)所画图景的赞扬。人们不怀好意地指出，虽然他们胆子很大，但也不过是平常的爱人，他们也感受到了吃醋和欺骗的折磨。但令人意外的其实是我们的大惊小怪：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不论是他们的脆弱还是坦诚，都令我们感动。经历了多少折磨，走了多少岔路，他们最终才一起变老，没有忠于最初的约定而是忠于对方①！在我所知的众多夫

① 让我们回想一下《告别式》(*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结尾处令人赞叹的几句话。这本书记录了萨特晚年身体和思想上的衰老，是用笔最终再度将爱人据为己有："他的死让我们阴阳相隔。我死了我们也不会再相聚。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时间能协调一致，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式》，Folio Gallimard，1981，第176页）

妇当中，他们也许能最为典型地展现我们都在争论不休的那些矛盾。

爱情的前卫人士已成传奇。解决婚姻之恶的所有药方充其量只能让那些恶悄然再生。见异思迁并不比从一而终好受：我们必须忠实于这种不忠，而这会是难上加难。如果有夫妻有条件地废除了性爱排他性条款，将此作为强制的要求却也同样荒谬：每个人在做好妥协的同时也要知道，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终究是安全需要和冒险需要之间的权衡。交叉背叛和忠诚并不能成为一种典范。更糟糕的不忠是对自己不忠，当他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当腐化后的黯淡战胜开始时的微醺。

家庭生活中的争吵，清洗的范畴

爱情生活中存在不少敌意，但有一种尤为残酷：用命运来解释爱情关系的松弛。这就是命，谁也无能为力。瓦尔蒙在向都尔维尔夫人告知自己将要离去的时候，就对此给出了令人炫目的证明：

"我的天使，我们对一切都厌倦了，这是自然的法则：这不是我的错。所以，如果我今天对这难以忍受的四个月来全身心投入的冒险厌倦了，这也不是我的错。如果，比如说，我曾经的爱就如你之于美德——当然是非常之多，一方同时想要和另一方分手并不足为奇。这不是我的错。所以，我几度曾欺骗过你，但这也是你无情的温柔带来的某种胁迫。这不是我的错。今天，一位我爱的女士狂热地要求我抛弃你。这不是我的错。我知道，这是个叱责背誓的好机会，但自然只赋予男人不专一的心，而给了女人以执着。这不是我的错。相信我，像我一样，另外去找位爱人吧。这建议好，非常好：如果你觉得它不好，也不是我的错。再见，我的天使：我带着愉悦拥有了你，我离开你亦无遗憾。我也许还会回到你身边。世界就是这样。这不是我的错。"①

与这种宿命论相反，争吵一直都是缓解夫妻关系的最流行疗法。有些家庭只有让日常生活中的愤怒爆发出来，他们的共同生活才能继续。他们品尝到没完没了的争吵所带来的慰藉。就像他们手中其他的药物一样，需要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双方才能和好如初。在一天的开始或者结束时大吵一顿是让生活继续维持下去的最好手段。爱情缓慢的消逝意味着在宁静的港口设置一块暴风雨的区域。夫妇对外人会保护他们的一切，包括爱情，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却要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激烈的争吵杜绝了真正的死亡。年老的夫妻因为吵不动了而悲伤，就如水槽里堆不下更多的脏盘子，彼此已无话可说。爱人间的和

① Choderlos de Laclos，《危险的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第 141 封信。

平是论战不休的和平，这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冲突，化干戈为玉帛。

一场争吵里，委屈或者不满使人做出了显然并不由衷的举动，但这一切都有利于复苏正在松弛的关系：鸡毛蒜皮的小事，摔碎了的物件，忘了放哪儿了的文件，鼻子吸气太大声等等，都被提升到了反人类罪的高度。我们让怒火大行其道，有千万条理由将对方生吞。争吵的效果很好：可以一下子说出心头的念想，只要不越界，就能够起到泻药的作用。你在狠命伤害对方的时候，伤人的语言通常会将你与伴侣隔开，使其在出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争吵蜕变为反思，爱人会永远受到厌恶感的折磨。不论对方做什么，都是错的。于是有了一个二元体制：日常的仇恨，攻击，谩骂，口水，超日常的仇恨，骂声的交响，肢体的冲突，羞辱的交织，这是地狱般的歌剧。如此这般的怒火的铺陈，谁碰上都会脏了手，更让外人不堪。夫妻就好比是精疲力竭的两支部队，在重新上阵之前得先修整一番。他们因此将两个我们不知道哪个更坏的缺陷合二为一：卑劣和重复。他们既厌恶又厌倦，成了那喋喋不休的恐惧的化身。

第六章

共同生活的乐趣与奴役

最难说出口的不是罪行，而是那些可笑和耻辱之事。

——卢梭，《忏悔录》

于是，他们两人就一起在那儿，幸福，无所事事……相濡以沫，情投意合……现在，该怎样享受他们的胜利呢？除了在洗澡(还有进入梦乡特立独行)的时候，两人都不再感到孤独。两人之间，已不再有偶然，不再有阴云，不再有魔法。他们身处最为残酷的光线之下：幸福之光。

——保罗·莫朗，《列维与依莱娜》(*Lewis et Irène*)

我没有无时不刻想念我爱的人，但我宣称即便我不想他们，我也爱着他们；而且，我也能够以某种抽象的情感的

名义，放弃我自己的宁静；要我这样做，是无需任何真实或者瞬时的情绪的。

——萨特，《情境种种》第一卷

好几年了，每到收获葡萄的季节，在巴黎的阿贝斯广场、在蒙马特高地上，都会上演一种奇怪的仪式：年轻的情侣们过来找一位官员登记他们的“不结婚证书”，然后彼此说道（就如乔治·布拉桑的歌里唱的那样）：“我很荣幸不会执起你的手。”这个习俗对于我们来说太新奇不过了，这些未婚夫妇们似乎道出了新型的爱情关系，但为了拒绝正式婚约，他们依然要选择一个人来批准他们。他们想要的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不是强制力：这是一个奇怪的游戏，我们召唤来体制，为的却是回避它。如果说婚姻是一种规则，那我们可以说已经从中走出来了，但婚姻作为一种想象还萦绕不散。

(1) 回归轻婚姻

很多人怀念经典的、穿着白婚纱的婚礼。我们对此有很大的误解。这其实是种形式上的怀念，以传统为借口传达对神圣的敬畏。我们玩弄符号，我们召集象征，敞篷马车，豪华轿车，在城堡举行婚典，但这些都像是歌剧院的装饰。婚姻是一种身份，和其他的社会等级类似，比如教士，比如骑士：它是身份开始的仪式，标志着生活的分水岭。婚姻可以变更，可以撤销，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一生中总要结一次婚，即便是同居了10多年，也要用婚姻将关系神圣化。即使是虔信基督教的未婚夫妇，对于婚礼也会采取消费主义的逻辑：他们希望选择一个时髦的神父，要有一座漂亮的罗马式教堂，落伍的神父就无人问津了。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44年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辩词。他为离婚辩护，认为离婚是婚约中基本的一条，而不是对婚约的否定。弥尔顿用人民与国王的关系对婚姻关系做了类比：如果君主滥用权力，人民就可以打破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当夫妻严重不和的时候，婚姻也应该可以解除。如果我们很看重处女膜，那尼采会说，夫妻也许就永远不能结合——在今天这个人均寿命直指八九十岁的时代，这话比以往更具时效性。赞成离婚是将婚姻文明化，不再让婚姻变为牢笼：这也就是为什么，至少在欧洲，醉心于这种新的可能性的是女性，提出离婚的人当中，70%是女性。结合？可以，但要有退路，有退出许可，有逃离点，以免夫妇在婚姻中窒息。（不妨引用一下这位美国妇女的事迹，她在2008年要求离婚，因为其丈夫持有的房产跌价了一半。经济危机竟然也成了道德秩序的催化剂！）为了批判我们败坏的风俗，人们就讲起一对对夫妇的故事，他们不离不弃15年、20年或者30年；但是，爱情不是一路忍受，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某种品质的。如果这种品质能经久不衰，那很好，但我们结合并不是为了

一起走得越久越好。

两人要生活在一起已经不必寻求父母的批准了。我们会问他们赞成与否。不赞成,我们就忽视他们。我们已经不会回到父母之命的时代,而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或者传统主义国家发生的一些令人遗憾的闹剧,也足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望而却步。① 我们能够在传统婚姻、同居、自由结合之中自由选择,能够在人生中交错经历多种形式的结合,终究该算作是艰难的进步。我们没有摧毁婚姻制度,我们如同寄居蟹,根据我们的便利来安排婚姻,使之服从于我们的意志,以至于婚姻制度都变得难以辨认。这座古老的城堡没有坍塌,对很多人而言仍然是值得希冀的。婚姻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吸纳了一切反对它的东西:狂热,易变,成员的行动自由。它消化了质疑它的现象,愈挫弥坚。它多样化到无尽:在婚姻中,谴责一对夫妇,就和谴责我们只以夫妇形式生活同样荒谬。既然婚姻的形式能维持至今,

① 在印度一些中产阶级较为发达的地方,他们采用某种挑选机制来调和包办婚姻。适龄女孩会见到一些求婚者,在一位年长妇女的监护下与他们交往几晚。之后她就能找到自己的心上人了。虽然有差别,但这难免令我们想到18世纪芬兰和瑞典的夜间宫廷(也就是 bundling)。所谓夜间宫廷,即一群青年,大多略带醉意,在周六晚上去各个姑娘的家中巡游,向她们朗诵几段诗篇。每个姑娘都会邀请一位求爱者上床,但求爱者虽然可以亲吻姑娘,但绝不能脱衣服。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强行的调情会走到哪一步,也不知道女主人会允许怎样的亲密行为。通过这种办法,每个姑娘都能知道自己有哪几位婚姻候选人,并最终选择一位成婚。在姑娘决定以前,有可能有四五十个男孩在她床上躺过。(Edward Shorter,《现代家庭的诞生》,前揭,第 129—130 页)

肯定是因为有很多人从中发觉了好处;它成了西班牙旅馆,抱负与期待的集成曲,向所有人开放,包括男女同性恋。但这种所有人都结婚的原则绝对是有限度的。一提到孩子,个人意志的统治便不再奏效。生孩子是无法撤回的,永远将为人父母者约束起来,是心灵的波动所无法改变的事实。在这个领域,立法者的使命是确保血缘关系的安全,保护弱者,矫正婚姻的不稳固性:入乡随俗,可以,但不能因此而牺牲责任。这正是我们被迫进入的一大歧途。

(2) 有关一曲约定俗成的哀歌(lamento)

披头士有一曲令人心碎的歌谣《她要离开家了》,讲的是一位年轻姑娘于拂晓离家出走,走前在桌上留了句话。我们能感受到姑娘在青春期对父母的厌倦,还有父母因为孩子离家出走所受的打击。

过去,家庭像胸衣一般束缚着我们;现在它让我们联想到千疮百孔的帐篷,空气和雨水从洞里钻了进去。这便是个人主义革命造成家庭崩溃给我们带来的最为常见的观感。但奇怪的是,这个现象在法国与特别高的出生率并存。后者得益于一项明智的政策(托儿所,产假),该政策使得妇女从事工作不仅不会影响生育,反而是对其有利的。尽管女性生育的时间推迟了,但法国成功解决了如何兼顾职场成功和生育的难题,做得比邻居

德国更好。[1] 婚姻纽带瓦解的同时，人们却越发迫切地想要“组建家庭”(包括传统上被禁止的少数人群成员)，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从这个层面来看，保守人士的哀歌犯了无视现实的错误：我们民主国家从上游摧毁的纽带，在下游又以不同的基础重新组建起来。这是在试验和审慎之间自我调节的明证，值得我们的注意；这样也同时规避了无政府和固步自封的双重陷阱。家庭的世系解开又重新结合，恍如编织中的大幅织锦。

家庭回来了，但境遇不同：家庭只因感情而组建，为它的成员服务，也或多或少与每个人的发展相协调。以下事实颇耐人寻味：同居的男女朋友住在父母家中——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无法想象的。关心怎样一直在一起，胜过了以往的常情。家庭使我们成为一条长长的链条中的一环，它走在我们前面，也不会在我们的时代消亡。在我们的时代，每代人都觉得和另外几代人有天壤之别，青少年和老年人各自为政，但家庭让我们对青年和老年的某种形式的共同经历司空见惯。家庭是开放的、好客的，势将调和曾经无法约分的两种价值观：独立与安全。同时，家庭要求我们重新通过自由选择，重新铸造出生和命运所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在尊重共同信条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做自己

① 妇女出门工作的结果是：1977年，女性分娩的平均年龄是26.5岁，今天，新生儿的母亲年龄超过35岁的有五分之一。在法国，十分之一的儿童(即160万)生活在重组过的家庭中，四分之一生活在单亲家庭(即270万，大多数跟随母亲生活)，还有3万名儿童生活在由两名同性成年人组成的家庭。

喜欢的事，而且每个人都能得到救助。

(3) 巴洛克式生育

从今往后，人们不必忍受生育，而是主动选择生育：生育孩子的欲望充满了谜，它也是我们最后的圣事。小孩不再是意外，而是意志的果实。夫妇俩决定他们什么时候要孩子，避孕手段悬置了本能所具有的匿名的力量：做爱是自然的，生孩子是人为的。完全由人决定的生育也意味着责任重大：对于那个即将降临世界的小生命，我们是要终身负责的！对于为什么要生孩子，我们有各种各样糟糕的理由——让自己老有所养，延长自己的生命，让孩子来实现自己未尽的抱负。但我们爱孩子又是出于最好的理由：仅仅因为他们的存在，他们打破了我们的顾影自怜，不断地挫败我们的期望。新生儿的奇迹一下子就载入了记录惊喜的册子：他不会去巩固任何东西，他搞破坏，完全是个另类。相信正在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每个人，事实上都在为人类的更新做贡献。在这种个人意图与普遍目的的辩证中，自私的顶点也就是无私的顶点。我们乐于为孩子牺牲而不求回报。孩子们着实构成了最后一个肉体上的祖国，为了它我们愿意付出生命代价。

同样，重组家庭也让义务成倍增多，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我们还得照顾新来同居者的孩子——这些孩子，用个新奇的词语

来说，就是“半儿”(quasi)，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女孩。闹不和的危险总是悬挂在这样的家庭头上。今天，科学和大众心态允许名副其实的时间大逆转：代孕，母亲怀着女儿和女婿的孩子，未来几十年里有可能出现人造子宫，年轻的贞洁女性可以要求人工受孕来避免性关系，老父亲的小儿子也许比孙子还小，富裕的男性决定不要妻子自己生，卵子或者子宫商业化，这似乎正是我们面前正在打开的漩涡，让我们迷失方向。但正是因为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家庭形式，我们更多的是在经受转型的焦虑，而没有害怕一切会终结。昨天，性与生殖联系在一起，今天，两者已经失去联系，明天，生殖就会脱离性，无需生殖者的介入：超现代性不过是回归到福音书的文本，因为玛丽是第一个无“罪”产子的女性。每每我们以为看到了剧变的地方，总是奇怪地忠实于我们的原点。[①] 家庭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它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源于18世纪，家系这曲曲折折的迷宫里头那些新的兄弟姐妹正从边缘将其慢慢吞噬。

① 从这方面来看，基督教是一部足以令人惊奇的家庭小说：玛丽是耶稣的母亲，但也是他的女儿，因为她是上帝的女儿，但同时又是他的妻子——这是双重的乱伦象征。玛丽没有交合便怀了孕，拥有了永恒的贞洁，为单性生殖提供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例子。所以说，儿子创造了他的母亲，而母亲随后得到圣灵的授精，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人工受孕者。Pierre-Emmanuel Dauzat 对于这个主题有令人信服的讨论，参见他的《基督的性》(*Les Sexes du Christ*)，Denoël 出版社，2008。

(4) 害怕空虚

“家，我恨你！封闭的房子；大门紧闭；渴望占有幸福”，安德烈·纪德曾这样说。“家，我爱你”，吕克·费希(Luc Ferry)针锋相对，他庆祝的是私人生活的崛起。[①] 也许，他的措辞还需要略加调整：家，我爱你，但不是每一天都爱你。家庭，这些小小的人类聚居点，尚未丧失其矛盾的特点：家既是港湾，也是牢笼。一方面，它带给我们愉悦：感到自己受保护、总有一扇大门向自己打开，有人会照顾你，养育你。儿时的家庭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浓缩了许许多多甜美的回忆。还有什么比过大节的时候那自愿选择的团体生活更惬意的呢？就仿佛一日一夜之间，这些树状大家族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能量和热情为其他每个人服务：情感任务在众多人当中分配，人们相互效忠，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单独一个婚约的分量。巴拉克·奥巴马可不是说过，圣诞节家人团聚，有来自四个大洲的亲属，真像是联合国在开大会。在这些小圈子里我们能感到舒适，这真可以说是奇迹。同时，我们大可以去选择我们喜欢的人，找到一位早已遗忘的叔叔或者表姐妹，从他们那儿重拾我们与父母之前不再有的和谐。

① Luc Ferry，《家，我爱你》(Familles, je vous aime)，XO 出版社，2007。

而在另一方面，家庭依旧是封闭的象征。它仍然是因为人的存在而继承下来的东西，而不是人能够创造的。有时它径直把我们赶到对立面，又向我们施上紧箍咒；我们越否定它，我们就会越多地复制它。探访某些原始部落深处，就像是掀开了一块底下爬满鼠妇的石头：厌恶，怨恨，报复。有些家庭表面上可爱，其实也只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那些家庭里总是上演着最令人憎恶的事：强奸，乱伦，谋杀。[①]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的后代，用着与他们相同的姓氏。想到这一点，有时候会令人觉得恶心。还有另外一些部族相对更温和些，他们是若干相互赞美的群体，召见外国人只是想拿他们当镜子，来衬托他们自己的伟大。过来夸我们，跟我们说我们在你们眼中多伟大！家族之爱是毋庸置疑的：常常，在公证所门口，在宣读遗嘱的时刻，兄弟姐妹们泪痕未干，但为了知道谁能分到最大的蛋糕而不惜拳脚相向。（所以在子女年轻时就分配好财产很重要，这可以消除任何财产问题对情感关系的污染。）

---

① 就法国而言，2009年6月15日内政部发布了一批统计数据（来源：《星期日报》[Journal du Dimanche]，2009年6月14日）：夫妇之间每两天就会发生一起杀人案。2008年，至少有280人在家中死亡，其中包括儿童、间接受害者以及行凶者本人自杀。同期也统计出180000起家庭暴力案件。弱势的性别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每60小时就有一位女性成为其前任或者伴侣的受害者（2008年为156起），每14天就有一名男子被杀（2008年为27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酗酒、残疾、失业、拒绝离婚等等。受影响最大的省是北方省、吉伦特省和塞纳-圣-德尼省。

（5）残忍的幸福

就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我们已经从一种病理转移到另一种：过去，封闭的家长制带来被囚禁感，今天流行的则是被抛弃感。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认为，幽闭恐惧症的胜利，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囚禁与卑微。而他预料我们这个时代会经历相反的困厄：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e）。人们恐惧这样一片汪洋，没有尽头也没有方向。过大的自主权将我们丢在了一片情感大沙漠当中，没有任何防线；仅仅是做监护人，就足以把我们压垮。说实在的，我们想占尽两者的好处，却不怎么待见它们各自所带来的不便：我们想要多些联系，但也想避免依赖，我们想要纽带，但不想让它成为缰绳。我们希望家庭能随时为自己服务，同时自己也免受其累；在需要时，我们希望从家庭得到爱抚，而其他时候就将它忘却。

是什么让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维系在一起？亲近心，共同的利益，当然更多的还有权威。但夫妇离婚，孩子青春期后离开家庭，兄妹不再来往这样的事是难以避免的。生物学仍然起着作用，但只让它来承担责任是不够的了。现代家庭关注成员的幸福，它要做儿童的庇护所和跳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让他们为进入社会做准备，解放他们。不过，遇上了第一个难题，夫妻之间就炸开了锅：留在家里的是小男孩或者小女孩，他们沉重地证明着某种已经不复存在的欲望；而在另一个极端是被赶出

家门、关到敬老院里的老人。这就是无情的幸福，它要求某些人作出牺牲。人们希望契约可以随意撕毁，手指轻轻一按就能点选自己的后代或者祖父母。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话精彩极了："无人有权阻挡其他人的视线。"我们从中可以听到那令人无法抗拒的诉求，要将人们从父权或婚姻的秩序中解放出来。但是，如果孩子是夫妇的障碍，如果孩子成了一种拘束，成了妨碍他们追求更广阔生活的小狱卒，情况又会怎样呢？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无法奇迹般地综合到一块儿：选择令人心碎，我们在若干个死胡同之间徘徊。当我们需要自由的时候，家庭永远是太过具有强制性的；当我们需要慰藉的时候，家庭的帮助又总是不够。

话题还没完：18世纪末诞生而最近瓦解殆尽的金字塔形家庭里，一位至高无上的父亲发号施令，他的反复无常（这里用萨特的话来说）即是法律。今天的家庭只说情感的语言：它禁止任何的冲突，谴责一切冷淡的态度。唯一留存下来的，是那种让个性化为乌有的融合。我们在成年以前，都一直被看作是蜷缩在巢里的雏鸟。这套亲密性的修辞泛滥到了社会，所以我们在媒体中避免"父亲"、"母亲"之类较为严肃的称呼，而倾向于使用"爸爸"和"妈妈"。这是一种做作的修辞，它侵入了公共领域，强行要求根据近亲原则来进行统治。[①] 人们公认，爱即是禁止冲

① 参见 Laurent Greisalmer 的专栏，"以母亲的名义"（Au nom des mères），《世界报》，2006年5月29日。

突，让孩子对父母产生依恋，不会叛逆；家长则不能有任何责备，以免让关系破裂。贪得无厌的家庭，用温柔来勒索它的成员，让他们透不过气来。面对雪崩般的爱抚和亲吻，又如何反叛得了呢？爸爸是好伙伴，妈妈则是闺蜜，和女儿们穿得一样，否认任何的代际差异，而只向他们的下一代传达最最宽容的信条：做你想做的。"孩子之生即父母之死"，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今天，父母找到的办法是做他们的老顽童。他们忘了，对抗也具有建设性，依恋不等于没有反对的意见，每个年龄层的矗立，都建立在前一代人象征性的死亡之上。[①] 这是教育过度自由、没有禁忌也没有约束所带来的悲剧，而不是教育本身之过。由此就有了婴儿潮那代人的子女中常能听到的诉求：秩序。他们要求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这些不知疲倦的彼得·潘——最终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爱曾被视作万能药；如今它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6) 激情的平凡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有句极其风趣的格言："爱情是盲目的，婚姻让它看见光明。"这句话已不再完全正确了：在我们当今的美好想象力中，情感的魔法旁常常站着一位认真仔细的公

① 在这个方面不妨读一读 Caroline Thompson 颇具启发性的分析，《爱的暴力》（*La Violence de l'amour*），Hachette Littératures，2006。

证员，他们划疆而治，虽说共用抽屉和柜橱，彼此的东西却分得一清二楚。年轻的恋人同时也是两个几乎平等的经济行为人，他们同居，但划定了非常精确的界限。比如，因为不想听到对方的呼噜声，为了避免失眠（睡眠比性重要得多），为了躲避不合时宜的情欲要求，他们选择异室而居。我们不一定要住在同一套公寓（手头比较宽松才做得到），我们可以避开同居带来的种种限制，我们可以用上聪明的办法，隔着距离将乌托邦付诸实践。仅仅把这些过程看作是人们落入了粗野的物质主义，可能是有失偏颇的。今天，一段感情开始时的谨慎态度，和害怕离婚的情感旗鼓相当。照看好自己的生活空间，也就是防止自己被窒息，也就是不让家庭琐事侵占情感世界。据说在鱼群中，身体接触得越紧密，它们繁殖得也就越少。拥挤打消了它们产卵的念头。同样，好的相处必然要避免紧密的共生：如果说距离归根结底来源于许许多多瞬间的迷恋，过度的接触则扼杀了最强烈的激情。恋人会因为彼此靠得太近而分手，因为他们缺乏合适的间隙来进行交流。当代情侣典型的形象：两人在街头、在餐馆缠绵，手机上却还在和第三者聊天。既在一起又分开才是快乐的。但如果某一段对话持续得太久，平衡就被打破。远离让爱刻骨铭心，距离让恋人亲近，恋人们走在这条狭窄的、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下去的山脊上。

与其说是战胜了孤独，共同生活更是一种不连贯的陪伴。即使是最形影不离的夫妻，都会有双重或者三重的存在，尤其是如果两人都有工作的话，就不是出轨所能简单概括的了。两人的结合不应该太疏远，也不应该太亲近：离开他是为了能重新更好地找到他，我们靠电话、电邮联系，所有这些工具都维持着双方的联系。家务问题总能把家庭折腾得奄奄一息：凌乱的袜子，没人清扫的桌子，邋遢不堪的房间。如果与一对夫妇熟识，我们通常会大跌眼镜，发现他们之间不可思议的小心眼，发现他们在人前的形象与他们在现实之中竟然有这么大的落差。夫妇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国，他们制订自己的法律，但也永远受到陷入专制或者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恋人既是君主、外交官、议会，也是只有他们两人的人民。确定永久的规则，避免摩擦，分配家务活（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当代的夫妻搭档是热情和柴米油盐的独特结合。即使是性，也成了讨论的话题，借此得以相互倾诉苦衷和建议。我们要求另一半给我们安全感，把惊喜带给我们，让家变成一个远离世事纷扰、温暖而舒适的窝。由此就有必要颁布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要随时可以修订，要能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节奏。缺了点修饰？没错，但为什么我们的爱情一定要有英雄呢？爱情存在便足够了：让我们停止用激情、宿命或者欲火来为爱情寻找理由吧。荣光和久长不可兼得。

(7) 夫妇是一场幸福的对话

并非所有结合都会像雪遇到太阳那样融化，婚姻也能经

久不衰，而且还不算特例。起起伏伏的冲突中，恋人选择了持久的道路。他们有时受伤，历经了黑色的时期，受到各种麻烦的冲击，分居，最终又克服了这些创伤。在这样一种由白热和持续性共同锻造的合金中，他们选择了后者。持续性粉碎了热情，但强化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他们选择一场长跑，而不是以欲望的短暂喷发作为关系的支架。他们也会惊叹，长久的习惯竟然没有完全杀灭一时的激情；他们相互感谢对方没有离自己而去。即使并非所有人都会像他们那样生活，老夫妇们的这种崇高的毅力仍然值得我们关注。由爱情主导的婚姻，我们该怎样遏制住它不可避免要受到侵蚀的势头呢？可以把两人结合的基础建立在狂热激情以外的纽带之上：尊重、默契、交流和组建家庭的喜悦，像古人说的那样通过子孙来找到某种永生之感等等。两人需要让感情降降温，用温柔的爱情去取代疯狂的爱情。温柔的爱情努力改善世界，它与岁月同盟，将其看作盟友，而不是敌人。

德·塞维涅夫人曾说过，幸福就是在我们所爱之人身边。一段婚姻或者结合，最幸福的结局，就是其成员之间的友情：友情，也就是慢速的激情，它让共同生活免于浮夸，抵挡了离心的力量，承认恋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就是接受其他形式的共同生活，而不再仅仅要求其热度和强度；同时它也没有禁止重回激情、情欲交融的可能性。“一场好的婚姻，是一场协调而幸福的对话”，17 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曾这样说。他的定义令人

赞赏，不过我希望再增加一点：这是一场有时候可以中断的对话，而短暂的停歇并不会造成丝毫的损害。恋人应当懂得彼此厌倦而不去谴责它，一起品味这种状态，将它视为人情世故和人格素养的终极考验。

如果不存在什么爱情智慧的话①，也许存在着一种爱情之中的智慧，即爱情允许自己逐渐褪色，退居二线，被更伟大的东西取代。真正的爱情并不在乎爱情。我们的先祖努力从包办婚姻出发去品味爱情。我们要实现的是相反的事：从原本的激情出发，寻找通向友情的道路。悖论就在于，能够长久的夫妇，正是接受了他们必然会死这一事实，将自己看作是一场超越于他们的冒险的中继点。爱情二重唱的力量，在于夫妇的不稳固性和延展性，这虽然让他们变得脆弱，但也在保护着他们。他们并不完美，但永远可以改进。它本质上是向恐惧深渊投下的一个承诺，是对关系长久下的赌注，是对一时的生育力量的信任。两人一起穿越这一漫长的道路，这中间有着一种崇高的韧性。道路上满是圈套、诱惑和打击，而在这道路上，两人通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选择了自己的奴役和美丽。

① 这里我推荐 Alain Finkielkraut 写的一本好书，《爱的智慧》（*La Sagesse de l'amour*），Gallimard 出版社，1985。在书中作者分析了这一从列维纳斯哲学中提取出来的概念，同时也纠正了其中的一些误区。

婚姻之床政治化？

致力于用意识形态来骗取亲密关系的，不仅仅有60年代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说实在话，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哲学家都在一个健全而和平的家庭中看到了一个牢固的国家的先决条件。现如今，有些保守人士认为，个人在情感上不专一，有可能导致民主制解体：如果夫妻关系在动摇，被离婚、通奸或者放纵搅得一头雾水，受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秩序。“我发现，离婚家庭的孩子相比其他某些孩子而言，在对哲学和文学进行严肃的研究时没有后者那么顺手。”比如阿兰·布鲁姆曾这样说道。[①] 至于曾出色地分析了当代人的自恋心理的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他则发问：宪法中禁止离婚的条款，对于有孩子的夫妇以及选择流产的夫妇而言象征着什么。反过来，还有英国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他从亲密关系的转型中看到了大民主的某种小宇宙：自我的发明，尊重他人，自治，这些美德在公共领域大放异彩，并且见证了一种新的动态。[②] 一派人鼓吹

① Allan Bloom，《温柔的心灵》（*L'Ame désarmée*），1994，法语版，Julliard，第132页。

② Anthony Giddens，《内心的转变》（*Les Transformation de l'intimité*），Le Rouergue-Chambon，2004。

要重新建立稳定的关系，如果必要的话还要进行强制；而另一派则惊叹个人的欲望竟然与历史的意义恰巧吻合。

“不是好儿子，好父亲，好兄弟，好朋友，好丈夫，就不会是好公民”，这是法国大革命后第三年（1791）果月5日宣言的第四条。它将家庭上升到社会契约之基础性地位。这个表述影响深远，但也很可怕，因为它让家庭服从于政治，以集体利益的名义控制人的激情。还有圣茹斯特：“离婚是下流无耻的行为，玷污了社会契约的尊严……私人风俗越败坏，就越需要有好的和人性的法律来收紧人心。美德不应该向个人让步。”[①]一个政权的性质和它所保护的风俗之间从来没有直接的联系。民主可以是清教式的，比如印度，也有鼓励放纵行为的极权政体，比如古巴和前苏联。领导人（比方说霍梅尼）的德性并不能等同于说民众也同样温和。而像贝卢斯科尼那种老年人的胡闹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摧毁掉意大利共和国。这是社会学的幻象：我们从爱情关系中读到的，就好比是咖啡的残渣，可不能将它就当作咖啡本身。我们不是要把它们当作事实，而是当作积极或者消极的价值。在这个领域，追随预言不幸的先知，预告光彩四射的黎明是不可能的：爱情是无法决定的，也没有理智可言。我们需要否定的，是机械地用一个方面推出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并不像

① Saint-Just，《革命精神》（*L'Esprit de la révolution*），10/18，1988，第58—59页。

人们所说的那样病入膏肓，当然也不是那么的健康：社会无时不刻地在试验，也就是说，它是个瘸子，不得不在夫妇的波动性和子孙后代必需的稳定性之间进行调和。这是一个庞大但激动人心的挑战：自由的危险比拘禁中的安慰更有价值。

第三部分

肉体的奇迹

第七章

性革命是否发生过?

我四下张望了一番,两周前,和我一起参加放荡聚会的家伙就距我两米之遥,在两栋破房子之间驻足。他转过身。我们面对面。嗨,你好吗?我们吻了吻面颊。我呢,倒更希望是亲在嘴上,我们毕竟做过爱,但这已经过去了,因为这是在聚会上,所以这种事情应该是不算数的。

——纪尧姆·杜斯当,《今晚我出门》

真正的文明并不在于煤气、蒸汽或者旋转桌,真正的文明在于原罪的痕迹不断消失。

——波德莱尔

1993年8月,Elle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则夏日测试题:您是坏女人吗?令人惊奇的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有多么简单粗暴,还有

读者看到以后的热心回复:这份著名周刊的编辑和记者无不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为自己是个淫荡的女人、一条无可比拟的风景线而洋洋得意。简言之,"坏女人"成了一个光荣的头衔,成了爱情游戏的等级制中贵族头衔的代名词。① 这个词本来是骂人话,如今竟成了令人自豪的头衔。说实话,这足以向我们证明,我们已经改变了世界。过去,人们隐藏自己的性生活,如今,它是要拿出来炫耀的。这是一种新的、充满肉欲的时髦:人人都想让这一面为他人所知道。如果翻阅一下近 30 年来的某份报纸,就仿佛是在查阅一部教导如何淫荡的奇怪的教理书,其强制性并不亚于以往:试试搞基,3P,双性恋,皮鞭,您床上功夫好吗,礼拜一做爱吗?② 虽然死亡仍然是报纸上忌讳的话题,性爱这个肮脏的小秘密却登上了大雅之堂,每个人都想上电视台、广播还有互联网去讲讲。

风俗的解放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男性而言,是一次怪异的拐弯。它非但没有解放本能的悦动,反而满足于用一种教条替

① 其中有一位名叫让-皮埃尔·爱尔卡巴赫(Elkabbach)的记者,在 Elle 第 200 期纪念上,向一位女读者问道:"您呢,夫人,您是坏女人吗?"——"哎呀,不是",她回答道。

② 这些杂志同时还为女版拉斯蒂涅克和告密者就提升社会地位提供了建议("是否应该为了事业成功而去跟人睡觉","有胸即成功")。从前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从今往后有的是应该做和做得巧妙的事。月刊《嘉人》于 2008 年夏天为解放了的妇女发表了一部情色指导手册,里面收录了各种可能性:三人性行为、交换、卖淫、虐恋等等。但官方发布的好性爱也同样可能会触及到恶意犯罪:"我恨那些有病的男的","不要有高危性行为"——这是 1994 年 2 月《20 岁》杂志里的标题。性成了对男性进行游击战的教科书。

代另一种。淫荡,在昨天还是受到控制、受到禁止的,在今天却成了义务。禁忌的消亡,女性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之上,又叠加了一种所有人都要享受肉欲的命令。消除了缄默以后,要用增加要求来补偿:要是不想被社会抛弃的话,就应该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去"获取"。

(1) 淫荡之焦虑

在 20 世纪,性被吹捧成改造世界的工具,它可以把人类带到几近完美的境界。人们依照经济学模型生造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性贫困"。这个词预设情欲的繁荣程度是可以计量的:有性的富人,也有性的穷人,有寻欢作乐的,也有苟延残喘的,有人沉溺于华丽的肉体狂欢,有人则只能勉强糊口。没人想被看作是性"贫困",即便是在一场漫长的婚姻中,每个人也都会夸耀自己得到过的光荣服务。性有了和职业、薪酬、外貌平起平坐的地位,成了财富的外在体现,被人们补充到他们的社交装备中。① 一种新型人类出现了,

① 性羞辱在欧洲不算什么新鲜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如果丈夫被怀疑性无能,他便要接受"代表大会"的检验:在大夫检查完身体以后,他得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妻子交合,一旁是人群里传来的风凉话,还有妇人们嘲笑的目光。如果他没有通过考验,就得向妻子偿还嫁妆,并允许她离开。在禁止离婚的年代,这是摆脱自己不喜欢的丈夫的手段。大会是一种带有阉割情结的仪式,1677 年 2 月 18 日遭到教会的禁止。(Phillipe de Tonnac, *La révolution a-sexuelle*, Albin Michel, 2006, 第 92—94 页)这里我们仍然不要犯时代错误:一个性无能或不举的丈夫,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有违集体秩序,威胁到了共同体的生育力和婚姻制度。

这是一种苦行的享乐者，用尽全力调动自己的感官，从而抵达幸福。他勤劳地追求快感，但这快感同时掺杂着巨大的折磨：他的追求在另一面也就意味着他永远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就好比2006年加拿大电影《性爱巴士》(*Shortbus*)里那位年轻的治疗师，从未有过性爱享乐，却疯狂地手淫度日。大家寻找的，是"大写的O"，真正的高潮不能算作淫荡，而是神的恩典，是圣杯，是获得救赎的通行证。[①] 人的充分发展需要并且也来自于真正的自我耕耘：情色工程与道德崇高的自我改进事业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个社会所讲述的自己，与它实际的生活还有着令人眩晕的差距：半个世纪以来，所有有关性生活的调查无不表明，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都被相同的执着和相同的问题所捕获：男性勃起困难，女性难以或者无法得到快感。[②] 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金赛发布了他的研究报告，揭开了美国人当中与当时道德规范相去甚远的亲密活动。[③] 难以相信的

① 我们不会重拾福柯那个太过简约的假设(他认为西方人是"效忠动物"[bête d'aveu])。透过对性的执迷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探求的不是真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即时的救赎。

② 这位可敬的教授披露，50%的已婚男性有私情，至少37%有过一次同性性行为，90%手淫。就女性而言，50%有婚前性行为，28%有婚外恋，62%自慰。金赛的报告是一大丑闻，使他成了美国宗教右翼的麦卡锡主义的攻击目标，最终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③ Herbert Marcuse是第一个从"压抑的去升华"中看出商品符号下的性解放，以及种种减少和削弱性欲活力的事务的人。(《爱欲与文明》[*Eros et civilization*]，1955，法语版，Minuits出版社，"论点"[Arguments]丛书，1965)

是，我们今天的调查反而把我们描述得更为理智。过去人们说我们下流，今天人们认为我们是在吹牛。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道德问题上撒了谎；我们则就我们的不道德性撒了谎。不论是哪一方，言论和道德都存在脱节。文化的病症，不再像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是道德秩序压迫本能的结果，而是本能的解放所产生的。当性自由的理想在所有地方获胜，每个人都会将自己与规范相对照，然后努力地往上爬。谴责是停息了，但焦虑又开始了。不过，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告人的。

(2) 性欲的内战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新的享乐主义在西方世界铺开，促进了身体的流通；这样一种运动，我们不得不把它与市场的变动联系起来。市场以利益为名，对抗既有的道德秩序。境遇论者著名的口号"一刻不死地生活，毫无羁绊地享乐"便是一个消费主义理想，鼓吹道德上的自由放任。正是在商业长廊、在画布上，还有在荧屏里，生活才没有死气沉沉地进行着，24小时满打满算，染指各种各样的商品，看了一个频道换另一个，全球购物的同时也与全球做着交流。我们冲动的爱情生活意味着要有延迟、小插曲、中断和爆发，而完全不是这样一块连绵不断的、囊括了全球超市的台布。我们与其说在谴责，不如说是在观察，这种享乐主义，这种"生命的暴动"(Raoul Vaneigem语)，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

新的陈规旧俗,挥动着离经叛道的大旗,却在为现状呐喊——不论它的酱汁是伊壁鸠鲁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颠覆性的。性能够调和狂喜与争论:今天它是商业社会最为安全的产品。

碰巧,欲望的解放在一种好斗的自夸象征下实现:新的酒神穿着闹事者的服装出现,仿佛世道未变,维多利亚式的道德依然在肆虐。他们假想出可怕的敌人,用论战搭起了小堡垒,以不同的尺寸贩卖不服从的观念。即使在最能干的人当中,战鼓也敲得是那么地响亮,炮声是那么地轰隆!社会,大资本,犹太-基督教:听着这些响声,我们不是在与它们玩耍,而是在玩耍中反对它们。欢愉是一把指向世界的武器,而不是与某个人分享的幸福时刻。他们的放荡是染上了涩味的蜂蜜:有那么多讨论享乐艺术的文章,本身却都是淡而无味的,里面藏着的是怒火,是怨恨!然而,快感,就其定义而言,是不能说明什么的:它既不能提升,也不能教育人类,它让人类快活,仅此足矣。但对于我们的政治委员来说,快感不是一种机会,而是一种秩序。肉体信仰戴着可憎的教条面具向我们走来,这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新鲜事。未来某一天,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前卫、超现实主义、境遇主义会堕落成为极权主义的修道院,充满着怨恨,摆出一副教宗的架势,执迷于去开除别人的教籍,去诅咒他们。这就是第三帝国所许诺的那个消毒、打磨过的世界,而它在当代的门生将会拥有所有粗鲁的快乐!

话还没完:半个世纪以来,爱欲的领域都是被当作一个宗派性的领域而组织起来的。是萨德让性光着脚走上了颠覆的道

路,因为他将性当成是反对封建制和宗教的战争机器。重要的唯有遵循放纵的天性,触碰那些欲望的对象(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借此更好地亵渎上帝,亵渎贵族,亵渎体制。在所有大的改革家中,肉体幸福的供应者还算不上最荒谬的一批:这些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宗教裁判官,它们掌控着拯救我们的钥匙,如果我们不遵从,他们便希望我们死掉。同性恋福音传播者,异见女权主义者,多元爱情者,乳汁和皮鞭的痴迷者,性表演者,复仇心切的男性主义者,攻击性的一夫一妻论者,恐同者和恐异性恋者,快感神父:有那么多新兴的人群,他们在相互攻击中将他们的性取向神圣化。[1]

欲望的疯子[2](Christophe Bourseiller 语)首先是一群喜欢归类的疯子,他们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以此来批判其他的

---

① 可以举一些例子:哲学家比阿特丽斯·普雷西亚多(Beatriz Preciado)在《睾丸酮上瘾者》(*Testo Junkie*)一书中宣称性别差异是一种"微型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应当将其摧毁,并把每个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变成"异性恋小婊子"。(作者本人服用睾丸激素来规避性别认同。)她激烈地抨击了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合法化运动,认为它们需要为与药品-色情业的同谋负责(Beatriz Preciado, Testo Junkie, Grasset, 2008)。还有后情色(post-porn)表演家安妮·斯普林克尔(Annie Sprinkle),她邀请普通妇女改变自己的身体,将她们展现在"抵制现代色情知识之意志的网站上"。(引自菲利普·迪·法尔科主编《色情词典》,PUF,2005第379—380页 Marie-Hélène Bourcier 的文章:"斯普林克尔在表演开始时在阴道中放入一面窥镜,然后邀请男女观众前来用手电筒观看她的子宫颈。通过这种做法,斯普林克尔重新占据了色情妇科学的立场,使得其身体不可能受到任何的对象化。")

② Christophe Bourseiller,《欲望的疯子》(*Les Forcenés du désir*),Denoël 出版社,2000。

人。所有那些诅咒自然、大男子主义、教会还有资产阶级所推行的错误的性别划分的人，其本人也难免对自己的细小划分感到陶醉不已，还不停地责骂和他们观点相左的人。拒绝任何范畴演变成了一种新的范畴划分——比如跨性别者——因此也就是复制了他们所回避的指称体系。社会斗争的毒性，通过大西洋彼岸的舶来品，转移到了性别身份的斗争上：比如有人自称是"女"（fem）而不是女人（femme），以免自己被既存秩序约简为她这种性别！[①] 这场革命采用了一种不同的书写方法。整一代人都把精力投给了这可悲的媚态。各个压力集团的人们，都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私生活，将他们的"骄傲"张贴出来；他们自称是各自欲望（相比世界的海洋不过两滴水）的斗士，以此来更好地贬低他人的欲望。他们相互越相似，相互之间也就越厌恶，就只能在对立中存在了。即便是指出他人性取向的做法，当它是以真理的名义强加到人头上的时候，也与某种警察执法过程相差无几。无法抗拒的传票让当事人不能有任何犹豫。人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性取向，而那些不知道的人则是活该，自己明明被关在柜子里竟毫不在意。

一场解放运动竟奇怪地以侵略行为结束：各种专横的命令倾

① 例如可参见新女性主义作家 Wendy Delorme 鼓吹超越规范和跨性别的著作《在性领域造反!》（*Insurrections! En territoire sexuel*），Le Diable Vauvert，2009。

泻下来，电闪雷鸣！做爱，不要作战，60 年代的人们这样说。而在今天，做爱也就是向所有人开战。刺激表皮就能让快感涌现的想法已经消逝了。性不再是一种活动，它成了击打别人的狼牙棒。

(3) 淫秽是漫长的耐心

《上帝之城》中，圣奥古斯丁有段话将男性无法克制的勃起描述为器官的一种反叛，类似于亚当夏娃之堕落。"有时这种热情未加唤起便来纠缠；有时它胜过了欲望；灵魂是火，肉体是冰；咄咄怪事！肉欲拒绝服从的，不仅仅是合法的意志，而且还有肉欲所带来的那些寡廉鲜耻的情绪。"[①]奥古斯丁想象亚当和夏娃在原罪降临之前于人间的天堂交合，由此发明出了没有性欲的性行为。最早的那对夫妇在完全纯真的状态下生育，而他们肉体的果实将繁衍不息："男人播种，女人在需要时适量接收。"我们的祖先摇动性器官就好比我们摇动手脚一般，是受他们的自由支配。亚当可以自如地控制"柔软而敏感的部分……能屈能伸，收放自如"。换言之，他能够极其从容地控制自己的器官（这就与布拉桑的歌里唱的很不同了[②]），以一种贞洁的爱与他的另

① Saint Augustin，《上帝之城》（*La Cité de Dieu*），2，Livre XIV，Seuil 出版社，Sagesses，1994，Louis Moreau 译，Jean-Claude Eslin 校，第 176 页。

② "当我想到费尔南德，我硬了，我硬了，但当我想到露露，我就不硬了……"

一半结合。这是一种机械式的行为，丝毫不扰乱心智：奥古斯丁也许预示了当代的色情产品，这种去除了导火线的性爱。①

在从前那个充满禁令的世界，色情图像自然是非法的。如今，它让人们观看运动中的裸体，允许他们注视这令人恐惧的秘密。经历过70年代色情合法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女性性器官的直接展现对当时的男性观众而言还是某种令人窒息的东西。从此之后，我们的目光变得麻木，身体上的禁区至少在荧屏上丧失了其一部分的秘密。色情电影是一种乌托邦，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纪实报导，乃至是一种教学项目。许多人认为它是面对躁动的初等学校，回答着这样一个问题：做什么？但它不反映现实；它将现实风格化，满足于让机器人活动在各个场景当中。正因为如此，它有时也会吓到年轻人，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难以与这些男性或者女性运动员的表现相匹敌。

就如惊悚电影，人们谴责色情产品哗众取宠：必须要不惜以苦行主义来惊艳观众（比如1976年弗朗索瓦·赖兴巴赫的电影《性感时钟》(*Sex O'Clock*)中，就有个男人从屁眼中抽出了一条链子！）。镜头深入到人体内部，用内窥镜进行妇科检查，一切都展现在观众眼前，没有什么看不到的了。我们太想擦亮眼睛，却发现失去了视力。性直接沦为了肢体运动，没有精致可言，混杂

① 关于这个话题，参见2005年2月《文学杂志》第439期Laurent Gerbier讨论圣奥古斯丁的文章，第60页。

着各种有机物质、血、精液、尿，并最终以粗劣地模仿自己，以自身的瓦解而结束。也许应该说，眼中只有利润的制片商与此一拍即合。色情电影敢于拒绝平庸，就如同在恐怖片里，让人不敢直视的场景有一种引起焦虑的效应。唯有省略可以增进恐惧。专业人士唯一应该问的问题是，想让不当的举止带来良好的效果，应该怎么做。但也许色情电影之受到谴责，是出于其性质；是不是因为，它只是一种场景音乐(genre d'ambiance)，类似于电梯音乐或者停车场音乐？

色情电影真正的罪孽在于它的平庸。它到头来总是沦为生殖器或者肛门的杂技，包括其女性主义的版本（即便它们额外装点了一种既学究又空洞的政治斗争话语）。当亚裔的钟爱宝(Annabel Chong)为了将"居统治地位的男性"改造成"可以替换的尾巴"，而于1999年参与拍摄《性女传奇》（12小时内与251名成员做爱）时，她并没有颠覆任何主流信条，却为世界纪录添了一笔！① 在这个不论是谁，只要躲过了父母的警觉，就能在网

① 就如同拉丁语中有介绍杰出人物生平的证道故事(exempla)，我们在性的方面有着一整部有关勇气的编年史，虽然多少有些不好的意思在里面：女演员西尔维娅·布尔东(Sylvia Bourdon)就为自己曾在一日之内与非洲某村落全体男性做爱而引以为豪，而不少X影星还自称自己打破了这个记录。2006年，在伦敦曾组织了一场抗击艾滋病的集体手淫活动：参与者要当众手淫，而赞助方根据手淫的长度和高潮的次数发钱。冠军是一位美国人，他持续勃起了8个多小时，不断交替着左右手。我们也得提一提色情界的偶像演员约翰·霍尔姆斯(John Holmes)，他的阳具足有36厘米，拍摄过220部电影，曾与14000（转下页注）

络上观看好几十种淫秽网站的时刻，如何对人产生刺激，成了竞争激烈的领域，而浏览淫秽信息的地下性一旦终结，对于人的性欲而言，也会意味着某种吸引力的终结。性就不再会是一件引发喧闹的事，不再能激动人的精神，性就成了一种古老的勇气，新近的风俗自由化判决我们以此为常地生活。

如果说这样的表现并不明显，那应该说是因为性拥有某种辐射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见证了一切，但却什么都没有经历；我们甚至可以说，青少年渴望色情图像这一各个时代都存在的现象，与对爱情事务的完全无知有关联：在性的方面，他们了解甚多，但在爱情方面他们又显得无知透顶。少年说下流话来宣泄是很典型的现象。这是言语上的早熟，也是性欲的黄昏。在某些地方，传统在鼓励大男子主义倒退，而这又与色情产品并存(至少在这种语言中是如此体现的)；由此看来，郊区的小流氓和他们攻击性的厌女主义已经污染了好的街区——十二三岁的调皮鬼出了学校，嘴里谈论着婊子和妓女。色情语言表达了对女性的蔑视。禁忌的消失因此也促使欲望的对象被贬低。因为色情倾向于将淫秽转变为陈词：降低

(接上页注)名男女演员合作。人称色情之王的霍尔姆斯身陷毒品不能自拔，以至于一天要吃40片安定剂，同时还要向静脉注射大量可卡因。1988年5月13日他因艾滋病去世。如此令人头晕目眩的数字，还有如此广泛的性行为，是人们大肆谈论的。性行为也要看数量，而且时常可能沦落为我们做给别人看的虚构演出。在这些怪诞而滑稽的虚构之上，流行的色情幻梦正大行其道。

兴奋度，增加饱和度。以最为出格的姿态作出的露骨表达无法维持长久，会像开瓶已久的红酒那样变质。某些与性有关的词语虽然粗俗，但进入到通用语言之后，就会失去活力，落入俗套。平淡的俗套一连串地生产出来，虽然能延伸到很远，却丧失了锐度。

于是就有了这种挑逗式的营销，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别致色情(porno chic)；它们可谓是伟大符号的堕落，将奢侈与淫荡结合，与禁忌调情，从而刺激已经颇为饱和的市场。麦当娜为了最大程度地刺激那些为她鼓掌的傻瓜，不惜将下流的象征运用到极致，到舞台上扭动屁股，将耶稣和人造阴茎扯到一块儿，煽动起一切有关狂欢和性虐待的想象。色情电影是它所传播图像的最好解毒剂；它将破坏转为寻常，让我们哈欠连连。我们也许都可以用色情电影来治疗失眠：它的催眠效果可不一般！归根结底，它的错误在于成了一种委托性交：我并不在场。所以也就有那么多勇敢的公民，拍起了业余色情电影。这些先生们炫耀着自己的擎天柱，不断地喷射；他们的配偶身上满是精液的白斑，用着太阳能的振动按摩棒自慰(这是环保！)。就如出售成套智慧的哲人，他们在家制作他们的小电影，好比是出售精液的宜家商场！

说到底，真正的淫秽在于我们对他人死亡或者受苦的觊觎，在于我们对电视上那些灾难的渴望。就好比在高速路上，所有人都下车围观一场事故之后残破的尸体。从前那赶着去围观公共处决的人群，并没有受到正义的感染：在为一个陌生人的末日

喝彩时，他们试着祈求死亡的恐惧离自己远些。他们带着处在厌恶与平静之间的情感，凝视那些受刑者。

(4) 出于怜悯的一点保留

自禁令终结已经有 30 多年了。人们对此毫无顾忌地大书特书，所有的姿态，所有的描述，都已有人尝试；以至于若是某位作家或者某位导演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掺入色情的沙粒，人们甚至还会感激他们。感谢他们将我们从永恒的跟头、狂喜和呻吟中解救出来。

有的人无法在这个爱情等同于冒险的时代找到慰藉：审查可以让它禁止我们做的事情变得珍贵。审查的阻力不论作为障碍还是辅助手段，均有其价值：越过雷池的人祈求上天的批准。这是清教徒和色情大亨的巨大同盟。前者向后者授予丑闻的证书：艺术家需要道德的大多数伪善，才能说自己受到了迫害；他们需要这样一尊指挥官的雕像，才能将一些宣扬不道德的拙劣的艺术品或者小册子上升到文化层面。如果这种同盟被打破，恐慌就要降临。同样的问题，17、18 世纪就已提出过。在旧制度下，亵渎上帝其实有着暧昧的地位：它处于一个拥有强烈信仰的社会，但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却需要有亵渎神明的存在。圣西蒙便是如此描述了奥尔良公爵的狂欢（奥尔良公爵是摄政时期出了名的风流人物）："人们开怀畅饮，热将起来，嘴上说起下

流的还有亵渎神明的话，越厉害越好……"[①]即使是萨德那样疯狂的无神论，也像是在对教会间接地唱着颂歌：对教会人物的无数次亵渎，这些"让头脑发热"的小制裁，对圣餐饼和十字架的玷污，都是通过攻击的形式来使上帝复苏。所有羞辱性的话语都认为自己应当打破某种禁忌。对于一本出格的书，最坏的帮忙就是批准它流通。有多少作家梦想着自己的书被禁，从而得享被诅咒者的光环？

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两处不成熟的地方：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它的赎罪或者告解手册在惩戒欲望的色调下唤醒了欲望；另一方面是现代的，它希望真实地描写欲望，以至于让欲望干涸。为了谴责非法的行为，宗教权威需要冒着让它们更吸引人的风险去点名：后入式性交，手淫，与贞女、女仆及动物私通。[②] 相反，当代文学中色情成分的流行（布莱特·伊斯顿·埃里斯 [Bret Easton Ellis] 还有他的欧洲支持者们），其实起到了削减性爱价值的效果，因为它们展示了性爱重复而又丑陋的面相。这是色情抑郁剂的胜利，是极端的勇气和极端的哀伤的混合。性生活，做爱，鸡奸，射精，所有这些基本词汇都没有了煽动性，它们成了习惯，排着相同的序列。这是一种新式的垃圾学院派，幸

---

① 引自《十八世纪的黄色小说》（*Romans Libertins du XVIIIᵉ siècle*），七星文库，Gallimard 出版社，Patrick Wald Lasowski 主编，第 XV 页，2000。

② 这些都是 6—11 世纪的赎罪书里罗列出来的罪行。就这个主题可以参考 Jean-Pierre Flandrin，《亲吻的时代》，Seuil 出版社，1975。

运的时候会有幽默来救它一救。[①] 厄洛斯往往是爱说话的，也会让人健谈：让他略略改变一下修辞、别再向我们啰嗦是不是太难了？在几十年间，我们从饥饿变成了腻烦。

伟大的色情文本，它们的淫秽无不是符合礼节的，它们用的是间接肯定，来暗示过分的行为。它们是闪电般的短路，令人麻木，而省略通常是通往禁地的冠冕堂皇的道路。为什么要在亲密的领域省掉优雅，为什么想着将亲密公之于众？野蛮并不排斥教养。就这个方面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浪漫领域从颠覆性的现实主义（比如让·热内、田纳西·威廉斯、小休伯特·塞尔比、托尼·迪韦尔、亨利·米勒、乔治·巴塔耶）向性正确（即有为数众多的当代小说家，“直白地”写作，不添加任何情感与优雅）的转变。语言的力量在于它的模棱两可，在于意义的滑动，在于言下之意，在于攻守自如。让语言激动人心的并不是几个粗俗的词语，而是在恰好的时刻进行刺激。在行动的烈火中，它将我们浸入一种相同的兽性当中，作为不可缺少的佐料与行动相伴随。出离了语境，它就变得不恰当，变得可笑。当代著作极为缺乏的，是庆祝的维度（即便它可能是下流的）；现实是，性欲

① 比如德国女作家 Charlotte Roche 的情色情节剧《湿地》（*Zones humides*，Anabet 出版社，2009）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她上医院治疗痔疮，也希望借此机会让离婚的父母和好。这是部“惊人的”、巴洛克式的、嗜粪的小说，女主人公与她的女性朋友交换用过的月经棉塞，往对方身上泼洒最为强烈的亲密气息；《湿地》不断地在虚伪的天真和令人反感的事物之间拨弄。

仍然是个具有颠倒作用的领域，让我们覆水难收。让·波扬不是曾评价《O 的故事》为“无情的体面”吗？表达的幸福：通过表达，人得以逃避压迫，但也逃避了啰嗦，逃避了标准版淫荡行为的陈词滥调。言语越是简化，它就越贫瘠，产生的就只有冷漠和冰霜。

(5) 性是不是一种休闲活动？

仿佛，我们解放了性，但付出了熄灭欲望的代价，仿佛性从我们这儿解放了出来。这是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闭路周期，在性的问题上，将我们从压抑带到了抑郁。性解放让性像一杯水一样无害。[①] “被解放”的现代男女不愿上当，对于他们来说，“性爱是好玩的”，是一种自然机能，他们两人或多人地享受性爱的自助服务，想要尝试一切。他们懂音乐，组织“性玩具派对”（也就是振动棒版本的厨艺派对）；他们没有性玩具就不做，而这些小道具就如小狗熊或者熏香蜡烛一样无害。去戏剧化，这就是他们的口令。亏得有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绯闻，我们才有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堪比拜占庭帝国的辉煌：我们想要知道，口交能否进入朋友行为

① 我曾参与了这场运动。1981 年 3 月我给《争鸣》撰稿，讨论新的性爱实践，范围涵盖了最温和的到最极端的形式。文章的标题是：“请将我们从性爱中解放出来”（Délivrez-nous du sexe）。请不要忘记，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Alexandra Kollontaï 最先将性爱比作是与喝水一样简单的行为。列宁在这个方面反对她，同样也曾反对她的其他很多观点。

的范畴，能否成为学校或者办公室里好朋友的证明。从哪里开始才算是性行为呢？从接吻、插入、爱抚、相互手淫开始算？对于某些人来说，性爱从未发生过：即使两人嵌在一起，他们依然处于完全超脱的状态。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手指的摩擦就是性爱的开始。我敢打赌，大多数人都清楚自己是何时进入生理风暴、为肉欲所困这一状态的。西方社会那种直率地言说一切、展现一切的做法，难免有虚伪的天真之嫌。从肉欲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有很多：将之恶魔化为罪孽，用禁欲主义将其熄灭，或者通过解放风俗将它变为一种娱乐活动，从而消灭之。

不过，我们在性的问题上从未采取过完全放任的态度：那些吹嘘自己毫无禁忌地活着的人，仍不得不召唤这些幽灵。我们的性事仍然需要与禁忌有令人兴奋的近似，否则性就变得无趣而陷于单调。禁忌没有消失；有的暂时冷冻了起来，为的是在其他地方转型，变得越发坚硬，越发不给妥协余地。我们同时怀揣着两种不可兼容的希冀，总想着要放得更开，又总想着要对那些威胁到我们幸福的坏事多些控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已经性解放的时代，监狱里竟也塞满了性罪犯。在法国，他们在囚犯的比例中占到了三分之一。[①] 仿佛，社会是在报

① 关押性罪犯也是导致监狱扩张的一个因素。1999 年，他们占法国本土在押犯人的 20%，今天这个数字达到 30%。有时，刑事法庭处理强奸犯比处理杀手要更为严酷：强奸是一种精神谋杀，比物理的谋杀受到更严酷的惩罚，它代表了绝对的恶。（Xavier Lameyre，《性犯罪》[*la Criminalité sexuellle*]，Dominos，Flammarion，Paris，2000，第 41、43、99 页）

复风俗问题上的放荡，而手段，正是毫不留情地惩处不按照规则享受性的人。性，在昨天还带着罪孽的封印，性行为的偏差既需要药物治疗，也要受到惩罚；精神病学医生、法官和警察组成了纠察队，对性进行管控。[①] 这个时代尊奉两个对立的原则，显得很不一致：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性，而同时又要尊重个人的意愿。[②]

也许，从这种对刑罚的恐惧中可以看到我们的难处，古人用传统来推行禁令，而我们却难以在共识的基础上予以重建。为了唤起禁忌，我们制造了罪犯，甚至不惜冒着冤枉好人的风险（例如乌特罗[Outreau]事件）。我们没有去发明新的准则，我们不断填充监狱，我们服从于禁忌已死之后那飘忽不定的禁忌体制，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苛态度。新体系那无法界定的特征让我们为其安全性感到晕眩：与其为疯狂地囚禁性罪犯的行为寻找理性依据，更简单的还是将他们恶魔化。[③] 我们要求法典定好合法和不合法的行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同情受害者的共同

① 诉诸刑法来维护社会道德方面，可参见 Antoine Garapon 和 Denis Salas 的重要著作《受罚的共和国》（*La République pénalisée*），Hachette，1996，以及《愉悦的暴政》（*La Tyrannie du plaisir*），Jean-Claude Guillebaud，Seuil 出版社，1998，第 12 章。

② 社会希望整体地保护个人，而不是像传统的不平等秩序里只保护女性。也正因为如此，性犯罪行为大规模爆发了。打压性犯罪以两性可能的平等权利为前提。（Xavier Lameyre，前揭书，第 97—98 页）

③ Michel Schneider 在《性的混乱》（*La Confusion des sexes*，Flammarion，2007）第 77 页上说得很精彩："象征越少，法规就越多。"

体(这个共同体尤其执着于与儿童有关的犯罪),而且这种集体厌恶本身据说就构成了立法的基础。我们指责这些"病人"破坏了田园诗,践踏了良好性行为的承诺,而正是后者能够让人与自己和解:他们得为人们所丧失的幻象付出代价。

我们绕了个弯,仿佛又回到了那些伟大宗教和心理分析带给我们的教导,即性既非中性也非"喜悦",而是充满着二重性,快感与死亡,阴暗与光明并存。"性是一个力量整体中的一部分,它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相比人自称能玩转它,它的手段却是最厉害的"(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语[①])。侵犯与欢愉共享同一套词汇:baiser 和 enculer 这类词同时可以指骗人发生性行为,所有与性行为有关的词语都有着一层暴力的意涵。性爱是人类野蛮而令人不快的部分,几乎难以让它变得文明或者将它制服。它也正因此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登不上大雅之堂,与任何有关救赎或者原罪的历险无缘。死亡当中有生命的冲动,爱与死亡相生相伴,两者在毁灭人类的同时建构人类。我们且注意,艾滋病并没有重新确立起禁忌,而是劝人谨慎小心,如使用避孕套或者更仔细地挑选性伴侣。它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教导,它是一种残酷的、荒诞的疾病,是不仁的自然的创造。性超越于我们之上:它将个人浸没到代际更新的大潮之中(事实

① René Girard,《暴力与神圣》(*La Violence et le Sacré*),Grasset,1983,第 56 页。

上也可以说是链条上的一环,"携带着不死的实质的必死之辈"[①])。这浪潮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强大,它燃烧我们,蹂躏我们,摧残我们,我们也从不能达到它所要求的非人境界。因此,想着哪一天来一场革命终结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按照其字面意思——天体定期总会回到轨道上的某一点上。在这个领域,我们总是会回到原点,我们从来都是无知的。

娼妓的帝国

从前,良家妇女和妓女的角色泾渭分明:前者代表着得体,而后者代表着粗俗和艳丽。但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经历了一场道德规范的混淆,社会机理从基础慢慢腐烂:轻佻的女工可以打扮得像一个正派的良家妇女,一想到这,人们的内心就开始恐惧。这种区分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时代:老鸨常常优雅而端庄,而家庭主妇喜欢穿条纹服饰。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年来,中年女士还有年轻女孩衣着暴露,毫无顾忌地向人展现自己的大胸和翘臀,还故意露出丁字内裤——简而言之,展示出一副来者不拒的妓女姿态。象征发生了转移:低贱职业的制服成了

① Sigmund Freud,《性生活》(*La Vie sexuelle*)PUF,1997,Denise Berger 与 Jean Laplanche 译,第 86 页。

普通妇女的标配。这些女性隐藏在诱人犯罪的外表之下，为妓女以及她们的紧身装扮确立了世界性的霸权，将其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词本身就带有贬义的尾音，它对厚重的夸张(petasse 有一个近义词 poufiasse，来源于奥斯曼帝国后宫里曾使用的高发髻造型)，证明了我们对此现象的暧昧态度：有一小部分对妓女的谴责转移到了她们俗气的效仿上。这个词并不表示性感，而是性感的夸张状态。

奇怪的是，女性在争得自己的独立以后，竟如此这般成了令人觊觎的对象。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爱欲公之于众？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匿名性，但更主要是为了说：我欲火中烧，在肉体的承诺上，你们永远别想骗我。妓女集妙龄少女和挑逗者于一身，融合了芳龄与经验。妓女意味着善于房中之事，意味着发光的淫欲。妓女圈子甚至有自己的偶像：布兰妮·斯皮尔斯，帕丽斯·希尔顿，嘎嘎小姐(Lady Gaga)，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这些都是袒胸露乳的轻浮泼妇，代表着一种攻击性女子气的亚文化。这种奇怪的标榜应当理解成人们在这类举止上的犹豫不决。男性这边的情况也意味深长：兰博(Rambo)，终结者，以及所有通过打类固醇变强壮的帮派头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状——一个不再相信男性气概的时代，因而不得不不断追求二头肌的大小和胸肌的宽度。同样，在某些男同圈子里，他们会赞扬原始的大男子主义，热衷于坚硬而巨大的阴茎，警察或者新纳粹主义者的装备，再加上链条，脑袋上戴顶平顶军帽，这些都给人以拙劣模

仿的印象。肌肉发达的野蛮人，穿着前后开裆的超紧身裤，算不上什么伪装起来的党卫队(SS)，而更像是喜剧演员，从符号本身来捕捉男性气概。妓女、新大男子主义者、异装癖者、伪娘、同性恋女汉子都随着角色的错乱而盛行起来。

认为妓女落入了梅萨林的愤怒之中也许是错误的。就好比从前的妇女不见得就比以后的更诚实，今天的妇女受着约束，所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知廉耻。“让我们想象”，乔治·巴塔耶说道，“某人(通过诡计)偷偷发现了某位身份高贵的女士竟也爱欲强烈，是会有多么惊讶。他会认为这是病态。这就类似于发狂的狗。仿佛，原本颇有威仪的人物，变成了发狂的母狗。”对于妓女，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在公然的卑鄙背后，也许藏着一种感人的谦逊、一种对假正经的不擅。举止放荡不一定意味着是个轻易就会跟人上床的女孩。那样做主要是为了吸引眼球，体现的是她的表演感，一种迫使人尊重的卖弄才华。巨乳，肥厚的阴唇，圆润的丰臀，花样的文身，诱人的姿态，这些东西在宣告的莫过于此：看我。从前，可敬的家庭主妇被禁止穿着淫荡的服饰。她们是一个时代的殉道者，而正是这个时代，将性树立为人类行为的关键所在。我们的困惑由是到了极点：戴上头巾，表面上惟父兄的法令是从，而同时在私底下，又成为可欲而魅惑的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及我们法国的郊区，有多少夫妻、学生以这种方式在欺骗法律？不过，妓女太过真实，真实到难以置信。妓女的挑逗仿佛是在嘲

讽女性玩物的原型，而且与此同时将之撵走、解除。妓女将身体化为剧院，任陈词滥调起起伏伏，再叠上层层面具，不让自己成为任何人的囚犯。不体面的谜团并不逊于体面。新兴的女性也许是历史上所有曾出现过的形象的总和：有毒的美人和冷酷的贞女，邪恶的荡妇和慈爱的母亲，轻佻的城市少女和男人的女头领，堕落与温柔混合在一起，就如同新的男性气质更多的是综合了男性气概的所有面相，而不是让以前的面相过时了。

在妓女的诱惑之下，总有着一颗跳动的心。

第八章

厄洛斯[1]行将破产？

提议将人类从性的强大支配下解放出来的人，不论他们说的话多么愚蠢，也都会被当作是英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

女青年，35岁，貌美，名教授，寻找男性共度美好时光，聊天，做朋友。要求：聪明且无性能力。

——加比·奥普特曼，《寻找性无能男性朋友长期相伴》

我也喜欢在流血的时候让人来舔我。这无疑是考验伴侣勇气的一种手段；当他舔完了，抬起眼睛，我会拥抱他，因为这时候的我们就仿佛是两只狼，刚将一头山羊撕咬得

①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译注

粉碎。

——夏洛特·罗奇,《湿地》

几年前,我在路上碰见了以前曾一起出去玩的女性朋友。她是位什么都能嘲讽的人物,见了我就说道:“我想你也一样,对性大概没啥兴趣了吧? 80年代性还是个好东西,到今天一点意思都没了。”我一时语塞,只能傻呵呵地反驳了她几句。她的这番话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对于很多人而言,性欲非但不是什么奇妙的冲动,反而是十分糟糕的困扰,它与现代那种孤立的个人幻梦背道而驰。欲求即折磨,因为这是在希求我们并没有的东西——佛教的教导正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风俗的解放以两种极端而对立的形式出现:暴力或者禁欲[①],一方面是令人炫目的实验,另一方面是将性冲动完全抛弃。

(1) 颤抖的级数增长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数甚少,喜欢跟随自己的怪念头生

① 就好比 Virginie Despentes 的小说《强我》(*Baise-moi*)中,女主人公在玩弄了男性后,会对他们发出怒吼,然后将他们杀掉。Despentes 的小说里有一种浸没在肮脏下流里的理想主义。持枪抢劫,强奸,免费谋杀,暴打,淫乱聚会,这些渴望的强烈程度,都不亚于疯狂爱情或者浪漫激情。Despentes 也可以说是倒置崇高的代言人:野蛮在她的小说里就如同对童话故事的怀念。

活;他们确信,这些怪念头本身就是好的,都应该尝试尝试。偏离常规最先会通过各种新名词带来愉悦:手交(fist-fucking),英式惩戒(punition anglaise),金色之雨(pluie d'or),观淫癖——新词带我们进入了一片新地盘。出格,即便只是软性的,最主要说来还是一个语言上的事实。我们可以嘲笑那些夫妇,他们化装成老人,穿上各种装备,喜欢玩捆绑,像他们父母参加弥撒那样频繁地出入淫荡派对,还沉迷于交换性伴侣(这是让欲火重燃的很天主教的一步)。[①] 自然的性行为花样翻新,让人眼花缭乱。再小的癖好也成了通往某种特别快感的途径,而疼痛或者羞辱之类的代价是可以抛诸脑后的:这是一种倒置的斯多葛主义,将每一种感觉都变成了意志的冒险。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萨德,他曾写道:“最为利己的人,懂得将所有恶心的东西变成趣味,将所有的厌恶变成诱惑。”

不论有着什么样的“变态爱好”,人的肉体有着一种任何学习训练都无法完全抹去的自然倾向。此外,就算在厄洛斯的家族中,差异也仍然是巨大的:习惯于在网上购买乳胶玩具的蒙面夫妇时不时的互诉衷肠,和在没有保护而发生关系的房间里上演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关联;妻子周末休息,化装成女主人鞭打丈夫屁股作为消遣,和比如另外一个极端,即表演者将自己撕

① 交换伴侣涉及到1.7%的女性和3.6%的男性,主要集中在25—49岁。(《性调查报告》,2007,前揭,第278页)

裂，用钓鱼钩把自己吊到天花板上，甚至于公开自宫也都没有什么联系。[1] 不论是用外科和化学手段整形，还是让自己受虐，这些行为都旨在改变现有的身体，将其打造成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身体。肉体开始讲述与永恒的色情小说不同的故事，我们将表皮和黏膜当作是一片处女海滩，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用愤怒的姿态拒斥这种怪异的文化，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体现出了某种狂妄自大，体现出了自我对本能具有至上权力的道德：个人与自己的娱乐，不论是通过半自杀还是自残的手段。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白热化阶段，爱欲的疯狂和恶心的事物已经不再那么清晰可辨，痛苦和快感形影相随。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坦率的实践者有多么看重仪式，因为是仪式制服了痛苦：我们赶走了法律，为的是推行规范，契约从此开始支配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我们需要有一套准则（其本身是可以撤销的），从而让色欲更强烈，并通过严酷的演出，从中提取出最大的能量。[2]

颤抖呈级数增长，而我们并不会为之理想地设定上升的边界。它的极限是死亡，此时爱情成了受控制的纵欲历险。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性罗曼史，因为人们会为了感官而制造出新的快感（有时甚至借助于毒品）。人们以如下的原则在超越极限：

① 对此 Christophe Bourseiller 给出了一些令人惊悚的案例，参见他的《欲望的疯子》，前揭。

② 可参照 Sacher-Masoch 制订的性虐待契约，以及 Gilles Deleuze 对它的分析，《穿裘皮的维纳斯》（*La Vénus à la fourrure*），Minuit 出版社，2004。

我是我的身体，我有一个身体，我给自己重新造了一个身体。尤其是在一个艾滋病泛滥的时代，无需插入的性爱兼具高潮和卫生的优点，允许人们沉醉于性而少些传染的担忧。这种拒绝天然性爱过程、喜好被剥夺的做法，在历史上是否曾有过？以彼岸世界的名义，忍受着虐待和饥饿的是谁？当然就是基督教的苦行僧。从沙漠教父到备受屈辱的天主教女圣徒（比如舔舐鼠疫病人的伤口），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通过羞辱肉体来加速光荣之身的降临[1]，将自己纳入到上帝那不可见的秩序之下。出离物质世界，也就是在逃避腐烂，因为在圣安布罗斯看来，性是将我们与基督的完美隔绝开来的那道致命的伤痕。[2] 而如果说我们在情色世界最为激进的体验中找到了宗教体验，这一西方文化的源流呢？这里，切斯特顿（Chesterton）天才的直觉再度得到验证："现代世界充满着发了疯的基督教思想。"性解放的最高成果，是为了高强度的痛苦和被驾驭的厌恶而抛弃性。

（2）快感的新衣

反抗生物学的宿命还有一种体现，即我们正在回归某个曾

① 在天主教神学中，光荣之身是一种精神之身，受到精神的完全支配，并拥有如下四个属性：无痛、灵活、敏锐以及透彻。这些属性只有在基督降临后才会应验。

② 引自 Peter Brown，《抛弃肉体》（*Le Renoncement à la chair*），Gallimard 出版社，1995，法语版，第 422 页。

被我们抛弃的概念——今天有新的少数派在呼吁禁欲。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乌托邦思想家夏尔·傅里叶高兴不已,因为他曾在自己的体系里为这些逃避者安排了尤为光荣的地位。我们不得不即刻做一个辨析:古代的禁欲是一种义务,而新的禁欲是自由(我们且忽略因为餍足而守贞的老夫老妻)。前一种能起到多个功能:压制身体的动物需要,将食物和肉体的斋戒合二为一,同时将口腹之欲禁绝从而净化灵魂。[①] 再细致地来说,古人期望的是用智慧管理身体,而基督徒改变了这个理想,为的是让肉体不受动物世界的支配,而只将其限于繁衍后代。用公元 2 世纪末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Clément d'Alexandrie)的话来说,基督徒不是要节制欲望,而是要杜绝欲望。[②] 贞洁不仅仅是个靠忍受而得来的状态,它还是人所选择的一种征服行为。我们并非生来贞洁,我们守贞是为了拒绝此世的腐败,并用灵魂的纯洁替代肉体的纯洁(即小姑娘的属性)。灵魂的纯洁永恒不变,同时向两性开放。

而当今的守贞之出现,则有着相反的缘由。它是对性高潮义务(它日夜锤炼着人们)的一种反动。享乐在昨天还是反派,但在今天已经成为规范,同时也成了昨天的规范,让自我控制成

① 参见 Jean-Louis Flandrin,《亲吻的时代》,前揭,第 103—104 页。

② 参见 Peter Brown,《抛弃肉体》,前揭,第 55—56 页。就基督教世界而言,这意味着出离此世界的统治,而幻想两性之间的界限可能在"某个精神躯体的金色液体"中溶解。

了反派。而既然人人都要向这些新的神祇(即幸福和喜乐)上贡,看到有许多年轻人决定不再服从于性的奴役又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呢?[①] 更何况,认为每个人都有性事并不妥;有些人就没有性欲,也从不为此受到折磨。[②] (有多少青少年"出于礼貌而做爱",来应付主流的习惯?)为了摆脱盲从,有人选择自愿冬眠,打开被生殖冲动所掩藏的其他财富。拒绝感官的操纵是在表示自己的异议,并让人能接近更宝贵的东西。(对于男性,我们也注意到有担心活力丧失,因而想要节约精力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拒绝性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个节俭的阶级。)

我们也别搞错了;这种无性欲的状态依旧是依据既存秩序而决定的。3 世纪的僧侣俄利根坚信禁欲是条更快通往天堂的捷径。而我们离他的境界还相去甚远。今天的禁欲,与历史上大多数伟大哲学家(比如康德、克尔凯郭尔、尼采等等)的禁欲也没有共通之处。他们是伟大的思想贞男,是悲观的单身者,是强烈的厌女论者,在肉体中过着禁欲的理想生活;即便当他们想要批判这一理想的时候,他们也会让自己的肉体噤声,从而更好

① 有关这个现象以及它的规模,可以参考的书有 Jean-Philippe de Tonnac,前揭。

② 约有 10%到 15%的全年龄层男性和女性称自己没有性欲(如见《性调查报告》,前揭,第 489—490 页)。年龄越大就越能适应没有亲密关系的生活;即使绝经已不再意味着性活动的终结,婚姻和性爱市场显然对 50 岁以后的妇女更为不利(第 334 页之后)。相反,男性的性欲低落通常晚 10 年才出现,尤其是出现了能刺激性欲的伟哥以来。有半数性不活跃者或是太胖或是太矮小(第 342 页)。

地服务于思想。[1] 一些北美基督徒看重"童贞",要求未来的夫妇为新婚之夜守身,甚至避免与异性握手。他们的观念,未尝不是欲望的一种策略,它延迟了欲望的实现,以免它立即死掉。"真爱可以等",90年代中期纳什维尔一位牧师所创建的运动就这样说道:"因为女孩是朵玫瑰,每发生一次婚前性行为,就会有一片美丽的花瓣凋落。"[2]还是在美国,我们还可以想到童贞舞会(它有很强的乱伦意味)。舞会上小女孩们(有时候只有9岁)在他们父亲的面前许愿,在结婚之前保持贞洁,而后者则向女儿许诺,他们不会出轨、保持纯洁的灵魂![3] 甚至还有已婚妇女去

① 参照尼采:"哲人害怕婚姻以及一切会导向婚姻的东西——婚姻是通往至善的道路上致命的障碍。伟大的哲人里面,哪几个是结过婚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都没结过婚。而且,我们甚至不能想象他们结婚的样子。结过婚的哲人就好比身处喜剧当中——这就是我的论点。而苏格拉底呢,他是唯一的例外,调皮的苏格拉底在我看来是出于讽刺而结婚,他结婚正是为了要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道德的谱系》,第三论,第七章,Gallimard出版社,Idées NRF,1966,第159页)

② 他在这里区分了传统主义者的神经质(比如北非女孩为了新婚之夜的面子会在婚前做处女膜修复手术)和与之不同的另一面:北美人民一直以来对风俗解放的反动(它可以看作是对60年代继承下来的性混乱的过敏症)。前者的讽刺之处在于,最为精妙的外科微型手术能够让青年女子在表面上服从于家长制秩序最新的要求,这是对宗教蒙昧主义的精彩讽刺!什么时候人们会在新婚之夜要求男性出示处男证明呢?

③ 根据基督教保守组织Abstinence ClearingHouse统计,仅在2007年,美国境内就举办了1400次童贞舞会。舞会的仪式拥有大多数婚礼的元素,有长长的婚纱,有珠宝首饰,有豪华轿车,甚至还有伴娘。大约有80%的女孩在婚前未能守住诺言。许多女孩为了避免失贞,选择肛交和口交,并因为信息闭塞而染上传染病。

修复处女膜,来让自己更年轻,找回"第二个第一次"的激情。我们也能发现一种叫做"第二次处女"(Secondary Virgins)的仪式:因为意志薄弱而丧失童贞的女孩,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前提是她在朋友面前发誓,不再重蹈覆辙。性是不能乱来的:它应该是两人结合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即便说调情还是允许的,那也是因为它能够考验人对自己的掌控,能够让人明白进展到哪一步就该停下。这是一种道德和卫生上的预防法,用完整的身体来保证感情的真挚性。莽撞的性交吞噬了婚姻的体验,并剥夺了它的神圣性。

我们在欧洲的一些穆斯林移民中也找到了对贞洁的相同执着,他们将消费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两种模式结合了起来:"去经销商那儿买车的时候,我当然不会想用新车的价钱买辆二手车",比如一位巴黎郊区的中学生就如此巧妙地说道。他同时还解释道,他与自己街区的姑娘们做爱,但为了结婚,为了取悦父母,他会去北非乡下找个处女。妻子具有使用价值,她应当是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物件;她的象征性价值,也就是她的"贞洁"展现了他们对原住地习惯的忠诚。[1] 这种双重的倒退让我们回想起——至少就其经济方面而言——旧时欧洲的习俗:田里的奶牛可能比妻子的价

① Caroline Fourest和Fiametta Venner的报道,法国二套,特别放送,2008年2月28日。

值更高，更换妻子轻而易举，更何况妻子还能带来点金钱或者动产。[1]

(3) 疏远令人恐惧

在婚前掌控自我的理想，是一个悖论式的色情化过程，让人联想到游吟诗人的开篇仪式，也就是阿萨伊(assaï)。它包括了好几个级别：协助夫人起居，逐步想象她的裸体，将她的身体看成是自然的微观形式，有峡谷和山脉，最后上她的床，进行各种不同的爱抚，而不直击目标。[2] 这段漫长的游历能够让欲火燃烧得更旺，直至将其带到极致。延迟满足，增加障碍，从而使欲望升华；也许新的贞操论正在让这个传统重新复活而不自知。禁欲潮流低声的复活不过是性欲重新发动的策略。两个对头奇怪地掺杂在一起，前者重新发明了珍贵的禁令，为的却是产生同样珍贵的快乐。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痛苦，并不在于堕落，而在于厄洛斯纯粹而简单的破产。有多少男人在伴侣的要求面前打退堂鼓，又有多少女人借口说自己头疼，假装高潮好让性爱更快结束，因为厌倦而拒绝做爱？在欧洲，欲望有英雄式的表征，它

① Edward Shorter 讨论 18 世纪的夏朗德省，前揭，第 74—75 页。

② René Nelli，《游吟诗人的爱情》(*L'Érotique des troubadours*)，Octavio Paz 评注，载《双重火焰》(*La Flamme double*)，Gallimard 出版社，1994，第 84—85 页。亦可见 Denis de Rougemont 的分析，《爱与西方》，前揭，第 78 页以后。

席卷所到之处的一切，而要抵制欲望就得修筑起大坝。古代日本人更为精明，他们将欲望比作"无常世界"，飘忽不定，其代表是那些在河边、在船上等待旅人的游女。[1] 水是欲望的隐喻：晃动而不定。没有什么能固定它，但什么都不动的时候它也会停息。即使是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变动不定的，它并非欲壑难填，而是轻浮无常。为了避免破产的风险，拿古老的矜持来下赌注是再好不过的。

什么是清教主义？马克思·韦伯称它是资产阶级最后的英雄主义，而同时也是通过回避"性"而让它剧烈燃烧的机器(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它解释了黑格尔理论中的苦修者的悖论：为了更好地从肉体解放，弃绝欲望的基督徒应当无时不刻想着肉体。感官最微不足道的震颤便会使苦修者疯狂，使苦修者动摇，不顾他的意志，成为其存在的最为核心的冒险。[2] 制止住肉体的放纵是在人类心中留下一片燃烧的区域，让人能够更好地消费欲望。这种手法有点粗暴但却有效。压抑之下有其目的：防范"性欲熵"(Sloterdjik)，避免人类的幻想破

① 参见 Jacqueline Pigeot 非常棒的著作《古代日本的妓女和女艺术家》(*Femmes galantes, femmes artistes dans le Japon ancient, XIe-XVIIIe siècle*)，Gallimard 出版社，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2003。

② 福柯受这个悖论的启发，发展出了他对西方的"性"的"压抑性假设"，参见《求知的意愿》(*La Volonté de savoir*)，Gallimard 出版社，1976。他拷问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只是为了更好地讨论冲动，让它能成为永无止境的话题，才会去抹除冲动。

灭！维护禁令也就是在将贪欲恒久化，当然其前提是按照固定剂量，通过一种良性的集体违反行为来释放压抑。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虐囚的美军士兵正是在用行为拒绝美国的清教主义。一个在性问题上有病态的民族，只会将他们的神经质撒到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身上。琳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中士也热衷于虐待同样还证明，女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也会和男人一样的野蛮。放纵与守戒重新找到了它们自古以来的约定，欲望韬光养晦，却得以汲取新的青春之泉。无论如何，这就是爱情的万神殿，装点它的是两大从未有过的雕像：自愿的贞女和好斗的阉人。

(4) 阴茎的形而上学

朱利安·卡雷特(Julien Carette)是位上了年纪的法国演员。有一天他呼喊待在别墅一楼的妻子：

——洛朗斯，快来，我勃起了！

——你下来，我在花园里呢。

——不，你上来，动一动它要萎的。

这则轶事说明了一种症状，它一反通常的偏见，证明男性才是那个弱小的性别。事实上，它还有两个现象作为补充：意外和稀少。青少年涉足爱情之后学到了什么？尽可能地控制自己，也就是说，不要放纵天性。如果他放任自流，性行为大概只能持

续几秒钟，精液和血液一样，是很容易流失的。射精可以很迅速，无需等待时机成熟。而它也带走了男性的一切活力；射精之后，根据年龄的不同，会因快感而造成一段时间内阴茎无法勃起。如果性器迟迟不硬，他就只能抱怨自己射得太早。这就是男人的性：如同贪婪的动物，无缘无故地兴起，又如时隐时现的凤凰，难以调教的仆人，或是过于庞大，或是悄无声息。

有一则古希腊神话大概是每个学校都会教的，它讲的是赫拉和宙斯的一次争吵。争吵中宙斯不顾妻子反对，主张让女人在爱情中感受到比男人更多的快感。这让赫拉愤怒不已，为了平息这场争吵，她唤来了忒瑞西阿斯。忒瑞西阿斯曾勇斗大蛇，之后就有了随心所欲变男变女的能力。忒瑞西阿斯这样回答赫拉："如果在爱情之中，用10来衡量快感的话，女人所有的是三三得九，男人呢，只有一。"懊恼的赫拉把忒瑞西阿斯打瞎了，宙斯则赋予后者预言能力，并让他有七七四十九条命。这个传说已经道出了关于男性身体障碍的一切(还要加上男性无法生育的问题。)

至上的快感对于男性来说，几乎可以要了他的性命。这是因为自然让男性做播种者，他的性能力是生育所需的一种功能，而繁衍一旦实现，它就会死去。男性的好色只不过是一系列迂回作战、实现最终目标的诡计：在古代中国以及印度教里，他们建议明智之人绝不要泄出精液，并依靠处女吸取女性的能量。男人要持久就需要工具化，将性器变成义肢：男人的第一个人造

阴茎，即是他的阴茎。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以一种掺杂着嫉妒的痴迷来看待女性的阴蒂。它被称为是“点燃高潮大火的小小木头”(G. Zwang)，藏在女性身体的褶皱之下，并与我们的高潮竞争：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因为女性似乎能够无休止地获得快感，给女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愉悦。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男孩子的阴茎会使用过度，为什么许多男人是用数量来描述自己的床上功夫。他们这样做都只是在回避自身肉体的不稳定性；这些厚颜无耻却自命不凡的大力士们就好比出于天真而悲叹的孩子。每个男人在一生中总会出次故障，也就是司汤达所说的“菲亚斯科”(fiasco，即惨败)。如果说男人对自己的性能力充满担忧，那是因为对于男人还有解剖学来说，这是一种宿命。不举是不幸的事，男人因为无法逃避这一宿命而感到困扰。由于自身的缺陷，他选择离群索居，而且我们知道，不举的痛苦甚至可能让男人自杀。(我们正是以此为由解释罗曼·加里和海明威之死。)他不是在欲求某个存在，而是欲求欲望，性器官成了偶像，到头来他只是担忧自己，导致了他一心想要避免的失败。封闭在自我之中，他再也不能够和被爱的存在重逢。所有能够让这不听话的器官重振雄风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伟哥的发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让男性能够挣脱这宿命的疾病。我们不愿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妥协，这也是让我们自由的因素。

什么是勃起？这是一种可以与女性接通的状态，是在呼唤

身体接触，是向他者伸出的栈桥。它如同太阳的光芒令人晕眩，有着一种侵略他人、与之合二为一的渴望。唯有它传达给我们这种大洋般的炽烈渴望，从内部向我们打开其快感的魔幻世界。它带来的那种步入神秘殿堂的陶醉感永远令我们惊讶。

我们不应该鄙视性行为机械化的一面(比如费里尼把卡萨诺瓦表现为人肉活塞，不知疲倦地在女性身体上劳作)。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曾说，“爱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可以无限次重复它。”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重复才是性行为具有美感的基础。火花正是在机械运动中迸发。只有在这些重复不断的姿势中才会有新鲜事物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爱也是一种舞蹈术，就好比是艺术家、画家和音乐家的手，应当与自身融为一体才能一气呵成而对自己的工作浑然不觉。男人和女人得把自己变成机器，才能更好地丧失理智；有时候，身体变得像机器人，重复着一些没有灵魂的姿势，于是就变成了如同柏拉图所说的，他人快感的观众。在交配中，有一种匿名的力量承载着我们，我们依靠它，不断摇动，在重复相同的动作中直抵催眠状态。它就好比是不会将你松开的盟友，体会到它的力量，感受到它的机理给人以喜悦。

(5) 绝灭的眩晕

爱情分为两种类型：最常见的是排他性的爱情，是两个人的

结合；更罕见些的是多人爱情，有一群人为着相同的冲动聚集到一起。这个原理甚至可见于慈善，“不受决定”（西蒙娜·韦伊语）、拒绝偏好，从而将受苦受难的人类整体地包括进去。有一小部分人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穷人，却还在慨叹人们对善心太过保留——这本身就是件怪事。他们的行动方针是“神圣的冷漠”（弗朗索瓦·德·萨勒），对所有受折磨者一视同仁。用来指心肠冷酷、懒惰或者无动于衷的词语在他们口中甚至也成了对慷慨的表述：无视酬劳，无视艰辛，纯粹的自我克制，对回报嗤之以鼻，“别希求什么，别等待什么，别欲望什么”（盖恩夫人[①]）。同样的纽带连接（而没有对立）了利他主义、唯利是图[②]和爱情上的殷勤好客，这一切都使得多人爱情拥有自身的价值。人道主义者为穷人无私奉献，“绝灭自我”从而通往上帝，与在集体色情的颤动中忘我的欢愉在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但其实三者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区分的共同品味，一种将自己奉献给所有人的共同意志。“我可以变成任何人”，美国小说家约翰·里希（John Richy）在讲述他在夜晚的公园里

① 引自 Jean Lebrun，《从柏拉图到拉康的纯粹之爱》（*Le Pur Amour de Platon à Lacan*），Seuil 出版社，2002，第 159 页。

② “你们可以将身体集体化”，2005 年去世的瑞士妓女 Grisélidis 曾精彩地说道，“同时属于他人与自己，让自己变成多人，就好比藻类与其他藻类融为一体……不要去数数。上过我的是一支大部队了。上过我们的是男人的浪潮，男人的海洋，插过我们的是阴茎的森林。但这是多么的壮观。”（Jean-Luc Hennig，*Grisélidis，courtisane*，Albin Michel，1981，第 140 页）

是如何被交错的阴影所吸引、不发一言地纠缠自己时曾这样写道。[①] 在色欲中有一种被分解的希望。拿我做任何能让你快活的事。愉悦在于消失在他者之中，在于迷失在没有名字没有面庞的人群之中，在于突然被许多手和嘴逮住，在于再小不过的接触也会让人感到天旋地转。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发明的寻欢洞（glory hole），放在同志夜总会还有一些异性恋窥视秀里：在隔墙上钻一个洞，供人将性器塞入，另一边是一只无形的手或者其他器官来予以满足。这个主意很妙，一来确保了匿名性，二来因为你不知道谁在抚弄你、满足你，这样做的甜头也就更强烈。手掌、嘴巴和阴茎是等效的。

伴侣交换俱乐部的吸引力，正是在于它在若隐若现中提供了开放式的享乐（就如同在密室当中发展出了一种黑暗中的色情一样）。这些场所总是免不了受到嘲弄，免不了变得堕落，免不了有某些下作的参与者贪得无厌。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些神秘团体有时展现出来的美感，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意志，那就是打破个体的障碍：

“我最开始认识的那批男性立即就成了将我介绍给某个网络的特使，而对于这个网络我们是不能认识所有成员的。这就好比是一个无意识中结成的反对圣经的家庭链……每次我都要换一种外观，换一种装束，换一种毛发，换一种肌肉。而在任何

① John Richy，《夜之城》（*Cités de la nuit*），Actes Sud，babel，第 561 页。

情况下，我都没有犹豫，没有顾虑，我的肉体向所有人开放，我的意识伸展到最广，我让自己供他人享用"，卡特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这样说道。她幻想自己是"为一群神经质的参会者服务的性爱皮囊"。这表述是何等令人印象深刻！[①] 所以说，每个人的身体都属于所有人，而这种交融也许能达到十分宏大的高峰，当好几十个人相互抚摸、相互拥抱、找回那原始的幸福交融时。他们感到相互融合成单独一个寻欢者，这为他们带来快乐。他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动物，用相互的好意包裹住了肉体的共有。

进而言之，为什么不在自愿基础上设立一项有爱而免费的公民服务，让天赋最好的男男女女用他们的身体回报他们的仰慕者？这与昔日的圣徒无关，他们沉浸于绝食和对俗世的厌恶当中，因为他们想要净化最基本的欲望。上天赐予了你们有趣的脸蛋、壮观的身体、大胸，还是翘起的臀部？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偿还这笔债务吧！将你们的肉体和灵魂奉献给需要的人。用你们的慷慨打碎这种让大多数同胞受罪的宿命，尤其是那些贫困或者残疾的同胞，他们比常人更加无缘享受爱抚和快感。[②] 请成为公共人物，造福社会吧。

① Catherine Millet,《卡特琳的性生活》(La Vie sexuelle de Catherine M.), Seuil出版社, 2001,第14、43页。

② 残疾人的问题从此往后会越发重要。2008年9月的《信赖》(*Reliance*)杂志探究了残疾人性陪伴以及性协助如何训练等问题的政治和伦理挑战。

(6) 让他们爽

如果柏拉图不是在说诳语，索福克勒斯到了80岁的时候，庆祝自己因为年老而摆脱了欲望的残酷桎梏，这种感觉就好比人民推翻了暴君，或者奴隶从农奴主那里重获自由。相反，乌托邦思想家夏尔·傅立叶于1820年曾写道：

> 人类过了爱情的季节，就过上了单调无味的生活，对灵魂的誓愿也置若罔闻；女人呢，得不到什么消遣，觉察到了这个苦涩的真相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虔信中从这个带着她们挚爱的激情远去的上帝那里获取依靠。男人能忘了爱情，但他们不会为之寻找替代。抱负的烟云和做父亲的甜蜜无法与爱情在青春年华带来的那些真正神圣的幻梦相比。所有六七十岁的人都赞颂和悼念年轻时尝过的快活，没有年轻人会想用他的爱情与老年的休闲交换。[①]

今天我们有许多禁欲的少年索福克勒斯，还有许多放纵的

① Charles Fourier,《爱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amoureux*), Simone Debout-Oleszkiewicz序, Slatkine, Genève, 1984,第16页。

成年傅立叶。在我们与时间的关系里头，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动：我们多了20多年的余生，我们延长了欲望之于每个人的魅力。也就是说，爱情游戏从不会完结，岁月的判决不会消除爱情的跃动。对于那些错过马车的更年轻的人来说，在另一个年龄段总是可以重新赶上。对于每个年龄段来说，真正的智慧不正是在于重新坠入爱河（不论是不是自己永久的配偶），重新开始生活吗？这样的喜悦之上，如果不是对既相同又不同的他者的希冀，那又是什么呢？有谁不愿意拿出一切来交换，好让自己重新体会那自然倾向带来的美好时光呢？

不论是短暂还是持久，我们的爱情没有教会我们任何东西：没有任何情感教育会为爱情那混乱的连续加冕。我们希求的只有一件东西：继续让爱情燃烧，直至永远。到了50岁的时候，我们对待爱情并不是那么认真，却也会像20岁初恋那般炽热燃烧：是同样一种任性，同样一种麻醉。如果说成年就是固定下来，那我们就是在持续地忍受着青春期。我们因此处在轻佻的、爱的激情之中，处在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之中。最关键的是不要暗中重新引入狂热的精神——我们不要一个让柔情的灵魂能够快乐，热烈的人得到幸福，而柏拉图式爱情（也就是那些高洁的情感联系）与最为严酷的束缚为邻的世界。想要逃离性这门生意的人大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做，而其他那些人最好也能找到自己的意中人。让他们享乐吧：不论是守贞者还是狂热者，腼腆者还是放荡者。请不要忘记肉欲能够

带来的奇迹般的感受：厄洛斯是生命的活力，将分开的人接到一起，是唯一一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它是闪着火花的短路，将人们的身体丢到一块儿。

人们能够有欲望而没有爱，或者有爱而没有欲望——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据：我们大多数的友情或亲情关系都与性无关。而那些善于搞混性和情感的人，事实上希望让前者服从于后者，从而为后者找到借口、作出改进。真正的戏剧发生在某一天，我们突然既不爱也没有欲望了，也就是说耗竭了将我们与存在连接在一起的双重源泉。性欲的反义词不是禁欲，而是对生命的厌倦。

不要评判

逃离你所爱的人，爱逃离你的人。诅咒睡在你身旁的人，每晚都恨不得将其撕碎，然后平静地醒来，仿佛白日已经用大水洗净了仇恨。为某个如你仰慕他那般蔑视你的人丧失理智。对未来毫无顾虑，即使预知了历史也要登上必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幻想着有段美妙的骑马旅行，有凌乱的爱情，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极尽缠绵。只知道给予而从不收取，又震惊于我们的礼物竟然那么不受待见。为了安全感而不是为了冒险而结婚，觉察到婚姻不能保护任何东西，不结婚也不一定会遇到什么不测。

靠谎言和欺骗度日，因为细小的过节而一去不回。像蝴蝶一般渴望热烈的婚姻，希望平静的家庭里有炽热的冒险。不顾及对方地去爱，吸收他的能量，偷走他的青春，靠他的衰落而发达。每天早上都赌咒要抛弃对方，却在这种分手的想法中坚持走过了 20 多年。做滑稽戏里的丑角，受众人耻笑的笨蛋，枉顾证据，得过且过。将婚姻看作是费力的劳动，强迫自己爱自己的伴侣，百般忍受，直到某天为了一时的爱好而前功尽弃。同时与很多人上床但不告诉他们，让每个人都不要爱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对什么都不敢确信，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自己喜欢什么，居住在“可能”的国度，居住在情感的迟疑之中，自己不过是一个说着“我爱你”的问号。为一个我们觉得不爱的人的离去而哭泣，那人就好比插入心中的一根刺。敬仰的人死去了，而我们曾粗暴对待的人却还健在。为了某些未知的完美而打开情感的宝库，向它们献上奢华的礼物，而对自己的亲人却冷漠而吝啬。

以上是爱的一些矛盾。为什么我们希望爱与众不同呢？谈到爱，往往就是从它内在的无序出发，挖掘它满是泥泞的灵魂深处，这里头既充满了卑微，也充满了高尚。让我们展现人类心灵的种种疯狂，但不要去评判它们吧。

第四部分

爱的意识形态

第九章

以温柔进行迫害

邪恶之人正是借爱情之火点燃了复仇之火。

——萨德,《爱之罪》

且看那些伟大基督徒的面庞:都是些苦大仇深的面庞。

——尼采

16 世纪,西班牙萨拉戈萨。一位关押在地牢的犹太教拉比,被教廷施以酷刑,为的是让他改变信仰。在他面前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也是西班牙第三大宗教判官,后面跟着一位刑讯官,还有两位泪眼婆娑、过来向他宣布"修士对他的矫正已经结束"的熟人:翌日,他就要同其他 40 名异端一道登上柴堆,将自己的灵魂献给上帝。在他们到访之后不久,这位囚徒注意到监狱的门关得并不严实。这让他难以置信,但还是犹犹豫豫地打

开了门。他看到了一条宽阔的走廊，由微弱的火把照明。他在这走廊上爬行前进，生怕被发现。在漫长的数分钟爬行后，他感受到手上有风拂过，眼前出现了一道小门。他站起身来推门。门应声而开，外面是一个散发着柠檬树香味的花园。夜色美极了，夜空里满是繁星。这位拉比此时已经极为疲弱，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希望，相信他要获救了。他向近处的山脉跑去，愉快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突然间，阴暗中伸出了两只胳膊将他抱住，他发现拥抱他的正是那位大裁判官。裁判官流着泪，带着放羊人找回误入歧途的绵羊的那种神情，口中喷着臭气说道："好啊，我的孩子，您想在获救前一晚离开我们吗？"①

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Adam）笔下这段别致的故事道出了某种本质：早在莫斯科进行的审判之前，基督教（至少是其罗马版本）就已经发明以爱的名义进行压迫。

（1）受折磨的教会，折磨人的教会

基督教的天才不仅仅在于像其他宗教那样为生命赋予意义，而更在于它向所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主与你同在，他注视你，保护你。"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福音书里基督

① Villiers de l'Isle-Adam，《被希望折磨》（*La Torture par l'espérance*），1883。（引自 *Contes cruels*，Les oeuvres représentatives，1933，第21—29页）

如是说。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彼得·布朗）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基督教并没有发明清教主义，后者是它吸取了古典时代思想的结果，就如同它还吸收了古典时代对激情的那种不信任态度。在这一严格作风之上它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心灵可以感知的"（帕斯卡尔）爱的上帝，他与每个造物讲不同的话。不过，基督教立即区分了两种爱：人类的爱，它其实是一个圈套，因为它给必死之人以永恒性的幻觉；另一种，也是唯一真实的一种爱是神圣之爱。被造物摊上的虚假之爱是贪欲（cupiditas），而神圣之爱的根源是"爱德"（caritas）。前者追求的是某个短暂的东西，因而成了它的奴隶，后者追求永恒，让人从恐惧与死亡中解脱出来。将人看成永恒而去爱人是疯狂的，圣奥古斯丁说道。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不动声色地重复了这个观点："别依赖于我，因为我会死；还是去追寻上帝吧。"

这个区分一旦建立起来，就出现了一个谜题：教会要传达的信息是爱，为什么它却误入歧途，去发动圣战，进行大规模屠杀和宗教审判？通常，我们用历史来解释教会走过的这些歧路：罗马本身也是与既有权力相关联的世俗机构，因此它一直在背叛福音的教条，直到晚近的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1962—1965）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想象耶稣降临大地，被大裁判官逮住，要他交代真理。我们在这里提出另一个假设：教会并没有背叛福音，而是实现了福音。问题在新约里就已经埋下，其中有一首欠考虑的爱情颂歌，它将爱

情赞颂为绝对的奇观。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事实：4世纪，君士坦丁正式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此前有过大批殉道者的教派刚刚脱离了被迫害的状态，现在轮到他们去迫害了。首先是异教徒，然后是犹太人（奥古斯丁后来称他们为假兄弟），还有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一切与他们对立的人，尤其是基督教异端。这些以战争和屠杀为形式进行的勒索，只有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真正停息，因为此后罗马和其他教派都丧失了他们的世俗特权。简单粗暴地来说，当公元380年狄奥多西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后，爱掌控了权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掌权的不是爱的面具或者影子，而是既崇高又令人憎恶的爱本身。

受害者反过来成了刽子手。这堪称历史上的经典桥段，不论任何革命，都必然要屈服于这条铁律：反抗压迫，不要相信被压迫者。我们会想到早期教会的地下墓穴，其卑微与君士坦丁所说的那种富丽和宏伟简直天差地别。但前者携带着种子，到后者的时候开花结果：在博爱情谊之中藏着专制主义的种子。圣保罗用一句名言下令基督教世界中"不再有希腊人野蛮人，不再有犹太人外邦人，不再有男人女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暗暗已将爱的大衣套到了所有人身上：没人能够逃过这种无可替代的放牧。特图里安①于212年便写道："宗教与宗教相冲突是

① 特图里安(Tertullien)，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译作德尔图良、特土良。——译注

怪事"，而根据传记作家欧瑟比(Eusèbe)所述，君士坦丁大帝也坚称："任何基督徒都不能以私人信仰为理由折磨其邻人。"——他们两人的话都被置若罔闻。① 在罗马的统率下，基督徒中树立起了近似于不妥协的精神。为爱而杀，这便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罪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持久的罪行是在温柔的道德氛围下进行的，刽子手那热忱的口吻，就类似于20世纪苏联的那些政治委员，他们不仅希望惩罚，还希望改造和矫正不信者。如果所有人都是我的教友，我就应该让他们也进入这个大家庭；他们的背离是错误的，我应该为了他们好而去惩戒他们。这就是路加福音中(XIV：16—24)著名的"强迫他们进来"的一节，将上帝的王国比作是盛大的婚宴，而有些宾客似乎拒绝出席。

(2) 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

这着实是双向运动：一方面，基督教塑造了西方的爱情风貌，塑造了信徒与上帝之间的激情关系。它留下了令人钦佩的遗产：源于圣经犹太教的情感话语(《雅歌》)，风雅的词汇无不模仿自虔诚的用语，伟大的女圣徒——这些上帝的未婚妻——的热情宣布了我们的文学当中最炽热的诗篇。这是一

① 引自Paul Veyne，《我们的世界何时变为基督教的》(*Quand notre monde est devenu chrétien*)，Albin Michel，2007，第169—170页。

个有关狂喜与迷醉的庞大传统,我们在游吟诗人、在寂静主义、在浪漫主义、在超现实主义中都能找到其身影。它将爱情上升到神圣的境界,将一种短暂的情感转变为永恒的虔诚。“所有与我主无关的丰饶对我来说都是贫困”,圣奥古斯丁曾这样规劝我们去崇拜在我们出生前便已爱着我们的,并且让自己的独子降临人世为我们赎罪的上帝。上帝之存在本身即兼具恩惠与热忱。它是一位仁慈的父亲,一位多变的情人,他的意志需要我们去破解,同时他也是嫉妒的暴君,要求我们抛下一切去追随他。“如果你能理解,那就不是上帝了”,奥古斯丁说道①。这句话非同一般,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肯定是学了这句话之后,在某天的发布会上就经济危机发言:“如果你们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表达有问题。”简而言之,这个有着不可捉摸意志的隐藏着的上帝(帕斯卡尔语),非常能让人想到风骚女性的策略,拎着追求者的鼻子走,诱惑他们从而更好地打发他们。破解上帝的意图(即使在他沉默的时候)成了其仆人从事的一门艰辛的科学;上帝沉默,也是在说话,上帝说话,也是用一种晦涩的语言,无法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西蒙娜·韦伊)。

但是,这个上帝以弥赛亚的形象出现,为我们的错误而死

① 引自本笃十六世,《上帝就是爱》(*Dieu est amour*), Cerf, 2006,第70页,他让我们不顾上帝的沉默而去相信它。

去。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正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自己的忧伤中思念着你,我曾为你流过如许的血滴……①”帕斯卡尔笔下的耶稣这样说道。我们让刚开始学习教理的孩童亲吻这些神圣的图案,而在这些图案上,我们发现了基督那淡红色的心。②我们的手上都沾着救世主的鲜血,我们对他负有无法偿还的债——尼采便看到了这一点。如何承受这样一种自我们出生即落下的、如无尽的勒索一般的债务?“没有人能偿还上帝为我们偿还的债务”,奥古斯丁还写道。这是一个找不到对等品的礼物:出生,即作为亚当原罪谱系的后代而在造物主面前出庭。人类处在奴隶的地位,对为他赎身的人再怎么感谢也不为过,他也因此从一种被动依附变成了自愿选择的感激。我们因此永远都是主的人质:他为了拯救我们而让自己悲惨受辱,我们不能不向他倾注我们的爱。

(3) 加入或者死亡

基督的牺牲因此使得不信者的冷漠或者异教徒的错误变得

① Pascal,《思想录》(*Pensées*), Éditions Brunschwig,第717节。

② 米什莱在他的《法国史》中提到17世纪圣母往见会(Visitandine)一位年轻女信徒 Marie Alacoque 与耶稣结婚,并得到耶稣会士正式批准。这位多血症的女青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放血。她声称每月自己的丈夫都会来到她的地方,两人心灵相交,为她带来了天国的极乐。(引自 Roland Barthes,《米什莱》[*Michelet*], Seuil 出版社,1974,第116—117页)

无法宽容:启示完毕之后,人们怎么可能不想得救,乃至在必要时违背他们的意志?这就是神的礼物带来的暴力,它具有很强的摧毁力。基督教热衷于向全世界带去这个好消息,它沐浴着殉道者的鲜血而诞生,随后以其他人的鲜血而壮大,这其他人包括了与他们看法不同的基督徒,即东正教徒、纯洁派和清教徒,也由此开启了西方文化中的攻击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正确信仰的所在地,也就是罗马,它的拉丁文为 Roma,变移字母位置之后就成了 amor,也就是爱。帕斯卡尔本人不也把爱德的秩序比作是前来颠覆人类社会的耶稣破坏之剑吗?必须强迫异教徒信教,圣奥古斯丁会说:通过反复的传教,他们会变成真正的信徒。[①] 而在《反福斯图斯》(*Contre Faustus*)中,他论证了采用暴力对付这些追随摩尼教的异端的合法性,称应当违背他们的意愿而为他们谋求幸福,让他们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处罚不信教者是容不得丝毫怜悯的。公元 417 年,在给负责镇压多纳图派(另一个异端派别)的军事首领博尼法斯所写的信中,他写下了之后好几个世纪里都会是教会官方学说的话:"有一种非正义的迫害,也就是异教徒对基督教会的迫害;还有一种是正义的迫害,即基督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教会以爱进行迫害,异教徒是以残酷……教会迫害它的敌人,追捕他们,直到逮住他们,消

① 参见《论信仰的好处》(De Utilitate Credendi),引自 Paul Veyne,前揭书,第 214 页。

灭他们的高傲和虚荣,从而让他们享受到真理的恩德……教会以其爱德而致力于让他们从迷失中走出,防止他们死去。[①]"

既然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救赎,让他们游离在外便是个错误;必须将人类的灵魂统一到一个大家族里来。与其让自己的邻人一直犯致命的罪孽,不如去强迫他们,甚至于将他们杀害。"教会之外无拯救",1000 多年以后的 1545 年,特伦特会议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之际将会这样宣告。奥古斯丁还有另外一条可怕但富有揭示性的表述:"切莫迷恋此生,才不会丢失永恒之生……如果你爱得不对,那便是恨了;如果你是好意地恨,那便是爱了。"好意地恨:即便这并非他写作时的意图,我们怎能不从这个表述中感受到一种号召,号召将不信教的人除去?不要重蹈覆辙、改变整个人类关系,这即是自保罗以来基督教传达的信息,也能够解释这个宗教的残暴性。[②] 正是这个宗教为我们的性欲抹上了战斗的调调(即使后者是与之对立的):其好斗性直接受到这套学说的启发,而萨德从来不仅仅是封建时代,以及变质了的天主教思想生出来的捣蛋鬼。

即使是上帝对其造物的爱也是暧昧不清的。"受上帝爱着的人类,"安德斯·尼格仑(Anders Nygren)神父说道,"其自身

① 引自 Frédéric Lenoir,《哲学家的基督》(*Le Christ philosophe*),Plon,2008,第 151—153 页。

② 就这个主题可参见 Jean-Michel Rey 的精彩分析,《保罗或模棱两可》(*Paul ou les ambiguïtés*),L'Olivier,2008。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赋予人以价值的，是因为上帝爱人。"①这是一种奇怪的迷恋，它从宣布宗教所感兴趣的对象本无意义开始。上帝是爱，而人不是，人不过是堕落的造物，是可以被爱的。17世纪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勒解释道，上帝"将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他对我们无所求，因为一切对他都是没用的。他只是为了在你们身上行使他的意志，给你们他的仁慈和荣光"。② 因此，如果有人对神的信息置之不顾，我们就应该去纠正他，让他走上正道。以上帝的名义杀人不是罪，因为上帝是爱：不论是谁，只要脱离上帝的支配，就是可憎的、应当受到惩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官们，出于对受指控者的"慈悲之心"，坚定不移地要通过审讯来为他们谋求拯救。③那些让基督教如此流行的理由——虔诚，集体热情，对超自然彼岸的渴望——也同样让它成了一个危险的宗教。仇恨可以在这片无尽的爱的海洋上飘荡，吞吃后者带给它的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主教将惩戒的事情交给了世俗权力，他的甜言蜜语服务于一个鲜有仁慈的权力意志。基督教自称是伟大的精神升华，在

① Anders Nygren，《性爱与友爱》(*Eros et Agapé*)，Aubier，1962(绝版)，第64页。引自 André Comte-Sponville，《小论伟大的德性》(*Petit Traité des grandes vertus*)，PUF，1995，第368页。

② Saint François de Sales，《论上帝之爱》(*Traité de l'amour de Dieu*)，载《纯爱主义》(*Doctrines du Pur Amour*)，Agora，Poket，2008，第33—34页。

③ 引自 Frédéric Lenoir，前揭书，第158—159页。

此氛围中鼓吹利他主义，并以此为由犯它的罪行。至少，伊斯兰教在对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信条这一点上更为坦率，也不假装自己爱护异教徒。① 由此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句令人敬仰但同时很荒谬的福音教条："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44—45)爱仇敌可以是让拷问自己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②；但同时也可以是剥夺他们的生命来净化他们的精神，为了他们的得救而用爱去消灭他们。要么重返大公会时代以前的基督教，不然就等着温柔的镇压吧：情感暴力，甜蜜的残酷，斗争的爱。对于教会我们不妨用上意大利人对他们的中左政治家罗马诺·普罗迪的评价：他用上全部的爪牙来做

① 对于伊斯兰教，用爱去爱上帝是一种异端邪说，因为有限的造物只能爱有限的事物。人应该崇敬和敬畏主。因此就有了对神秘诗人的迫害，如 al-Hallaj，ruzbehan de Shiraz，Sohrawardi d'Alep 这些游吟诗人，他们用诗歌表达了至上之爱。(参见 Denis de Rougemont，《爱与西方》，前揭，第112—113页)有关在巴格达被处死的苏菲派神秘诗人 Mansur al-Hallaj，参见 Louis Massignon 翻译的诗集 Diwan，Seuil 出版社，1955，以及《神秘主义诗歌》(*Poèmes mystiques*)，Sami Ali 译，Albin Michel，1998。

② 1996年阿尔及利亚的台伯派僧侣就是这种态度，尤其还有苦修会士 Christian de Cherge，在他被伊斯兰教徒暗杀的三年之前，他曾拒绝离开阿尔及利亚，并称未来暗杀他的人会是他最后的朋友："你也是，我最后时刻的朋友，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的，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我期望向你道声谢谢和再见。上帝是我们两人共同的父亲，如果他喜欢，也许我们会在天堂重逢，你这幸运的强盗。阿门！ inch allah(如主之愿)！"把谋杀自己的人看作朋友，在他犯罪前宽恕他，只有极为罕见的崇高灵魂才能做到，所以在这里值得特别叙述。(有关此事可参见以马内利修女，《爱之疯狂》[*La Folie d'Amour*，*entretiens avec Sofia Stril-Rever*]，Flammarion，2005，第125—126页)

善事。[①]

(4) 同志的共同体

人人都是上帝造的兄弟,这是一神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形式上的平等。在相同的旗帜下义务入伍是这种兄弟情谊的形式,同时也表明了这种普世主义的局限性。共同信仰成了奴役的代名词。在许多情形下,人与人的分离比整合更好,他们看似有根本性的相似,却不足以打消他们分开生活的渴望。[②] 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与什么有所接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从这个宗教那里吸收了最重要的一些概念:他们让无产阶级做现世的基督,完美的救赎阶级,什么也不是,却将成为一切。他们想象未来世界是福音的承诺在人间最终实现。罗莎·卢森堡就吸取了教父们的思想,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不幸者

① 基督教利用乃至滥用了一个十分成功的悖论:最后在地球上的人,将会是最先上天堂的,这个世界的疯子在另一个世界就是智者,希望拯救自己生命的人会失去生命,精神贫困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在天上会得到赞美,为了与上帝同在就需先让自己死去等等。这种使用反义词的思想(比如祸福相生,贫困是隐藏的财富,耻辱本就是伟大)尤有利于为事物现状提供合法性,也从不会错。真相总是藏在表象的反面。所以,谋杀可以看作是爱慕的一种证据,酷刑可以是对他人的关怀。这种修辞后来在各个热衷于异见分子再教育的极权政体下十分流行。

② 这是 Amoz Oz 就巴以冲突发出的著名号召的意义:《帮我们分离》(*Aidez-nous à divorcer*), Gallimard 出版社, 2004。

的世俗宗教。让我们再补充一点:这两个体系都要求所有人的信服,不给良心留任何批判的余地;他们一直不断地引用圣经,参考那些伟大的先行者,不信任那些游离于正统之外的人,并进行精神与文字的斗争。不论是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我们都以人们并不知晓的彼世界的名义评判此世界:一个是永生,另一个是无阶级社会。

人类前不久才从血腥的政权中走出来。它们想要让博爱完全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为此将数百万人投入恐怖之中。为了让所有人都一样,就得先从所有人中隔离出一批人——那些怀疑者,分裂者,剥削者。到处都有宗教裁判官的那种以杀戮为手段的善心,十字军,政治特派员,真理的保管者。博爱,或者死亡:我们还能记得这种表述在法国大革命时有多么成功。人们首先是援引福音,"救世主最初的弟子都是兄弟,平等而自由",1791年拉莫莱特神父这样说道(看这名字似乎就是命中注定!),随后人们开始仓促地以背叛为名将各自送上断头台。[①] 信仰耶稣或者列宁,就要消灭阻碍天堂实现的腐败成分——对此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哦,你们是我的兄弟,因为我有一个敌人",大诗人艾吕雅(Eluard)曾说。请挖掘一下博爱的赞颂者们的话语,分析他们

① Mona Ozouf 在其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书中为这种现象做了两种解释:让我们做兄弟,不然我去死,你来做我的兄弟,不然我让你死(这是 Chamfort 的版本)。心理分析家雅克·安德烈为此给出了第三种解释:做我的兄弟,那样我就可以在祖国的祭坛上杀了你。(Mona Ozouf,《新生的人》,前揭,第 176—177 页)

的颤音:这里头夹满了厌恶,仇恨,他们不会珍爱,他们只是辱骂。欧洲的最后几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阿兰·巴迪欧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等等都要依靠圣保罗,依靠基督教,依靠爱情的那种具有改造能力的权力,因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一种有着良好意图的修辞在肆虐:某些人的不幸在天国降临或者革命成功面前算不得什么。只要我们想做好事,我们就无可指责。帕斯卡尔早在写《致外省人书》的时候,就用方案的美来为其错误作辩解:"如果我们无法克制自己的行动,那我们至少可以净化自己的意图;由此我们即用目的的纯洁性纠正了手段的恶。"①人因为爱全人类而激发出来的犯罪(尤其是当这种爱没有对人的爱来抵消),我们是说不完也道不尽的。致力于拯救灵魂或者解放被压迫者的人心中很自然地生起某种仇恨,它将被它所萦绕的人拧成一把热烈而无情的花束。这个基督教的上帝"爱温柔、仁慈之人",但它的开始却是在身后播撒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忠诚,值得为之用上欺骗和酷刑。而对于共产主义,它则毫不犹豫地要消灭人民的敌人。现代性中,有着两大体系:以仇恨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以爱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者的理想更为崇高,因此也就更难反驳。整个纳粹主义体系都倚靠着对犹太人("劣等种族")的歧视,并承诺要将其消灭。共产主义的体系则建立在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基础

① 见《纯爱主义》,前揭,第88页。

上。前者说的是刽子手的语言,后者说的是受害者、被羞辱者的语言。但是,为了在人间实现正义,它们首先都要消除那些妨碍最终目的实现的范畴:资产阶级、富农、社会的叛徒、帝国主义者等等。以受苦受难的人类之名实现的事业,无疑是极为伟大的,因此使用残暴的方法也就完全符合正义。

(5) 放弃改变信仰

当然了,对比到此就告一段落。宗教与世俗学说有所不同,它无需接受验证:它希冀的是天国,而不是俗世。基督教在欧洲已经实现了人性化,但这并不是出于其内在的善意,而是因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在减弱了其世俗权力的同时,拯救了它的精神权力。罗马颇有勇气地审视了自己的过错,通过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大范围重订了自己的学说,删除了其中攻击性的方面,承认了其最可怕的错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需要近两千年,方才不得已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宽容。西方宗教信仰狂热的时代,虽然也有许多成就和无可否认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仇恨和野蛮的时代。宗教对这些时代却丝毫不表示遗憾!我们之所以能重新和基督教交往,只是因为我们拔去了它的牙齿。它之所以能出离其罗马的、改革的、正统的形式所带有的暴力,仅仅只是因为它出离了那种不可妥协的爱。没有了暴力之后,罗马教会变成了一个议会,它的责任是仲裁它的各个派系。

即使教廷仍然自认为是真正信仰的唯一保管者，它到底还是同意自我批判，与无神论、不可知论及其他教派对话。过去，它用激情践行不宽容政策；而今天它因为衰弱而不得不宽容。除了仍然十分倔强的伊斯兰，世俗的原则在欧洲各地得到认可，眼下也不可能受到质疑。各大宗教在民主国家中已经不再可能关押或者处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我们可以认为，罗马对于教士单身、女性担任圣职、避孕、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的态度是可悲的；它禁止避孕药丸是不负责任的，而在这个艾滋病泛滥的时代以禁欲的名义反对避孕套堪称是明摆着的罪过。[①]

尽管如此，教会从今往后还是同意将爱与宗教分离开来，这算是巨大的进步。

> 爱是无偿的。它不可用来谋求其他目的。以教会名义行慈爱者，决不可将教会的信仰强加给他人。他应该明白，纯洁而不求回报的爱是上帝最好的见证，我们笃信上帝，也是上帝推动我们去爱。[①]

① 在危地马拉，该国的主教让人拍摄了一组照片，一边是子弹，另一边是避孕药丸，来表示两者的等同。在智力，支持离婚和堕胎的游行中出现了针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标语牌："你们的念珠离我们的卵巢远点！"我们还能想到 2009 年 3 月本笃十六世在喀麦隆指责避孕套促进了艾滋病的传播！而让这种疯狂到达顶点的是，在 2009 年 1 月 3 日梵蒂冈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的一篇文章中，某位 Pedro José Maria Simon Castellvi（国际天主教医药联盟主席）声称避孕药丸在这几年来"对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因为它经由服用药丸的女性尿液，向自然排放了"成吨的荷尔蒙"。避孕药同时还是造成男性丧失生育能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蒙昧的最后稻草，就是运用科学来为它服务。

这些措辞十分重要：抛弃暴力传教是真正的进步，也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在今天成了温和的代名词。一个巨大的信仰越是分化，它就越是客气，越能够怀疑和自省。期望看到某一天基督教世界重新统一是天真的，因为不同的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东正教，天主教——是由于他们的多元性而繁荣，而不是在某种虚假的统一之下繁荣。一切一神教终究会演变成多神教，随着人类的不断多样化，接近上帝的方法也不断增多。伊斯兰教，这先知的宗教，已经分为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不过我们还得指望它分化成更多派别，不同分支、学派和宗派的分歧不断深化。我们不妨用上二战后莫里亚克对德国的评论："我对她爱之深，所以想让她变成好几个。"一旦一个教派有分裂之虞，我们就应该鼓掌，比如今天的英国国教，明天也许轮到天主教：他们丧失了势力，但可能会获得智慧和节制。多元分化是几大宗教的未来。"只有一种宗教的地方便有暴政；两种的时候是宗教战争，而如果有了许多种，自由就来了。"（伏尔泰）

从这个插曲我们能学到什么？希望我们再也不用成为基督教这盘大棋的棋子（基督教本身就继承了柏拉图主义），让我们做激烈的无神论者或者反教权者。反思基督教，更是让

① 本笃十六世，《上帝就是爱》，前揭，第 64 页。

自己置身于一个由基督教开启的前所未闻的时代。18 世纪以来,现代人恰如其分地谴责了压制本能的做法和教会所散布的厌女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等,都保留了基督教教导中相同的因爱得救观念,投身于全球救赎的使命。他们以同样的心灵博爱和良心互惠为名义为肉体平反:"当所有人的思想对每个人都没有秘密时。"(圣奥古斯丁)19 世纪,作为贫瘠的理性的敌人,托尔斯泰呼吁用情感让人类重生。60 年代末,美国垮掉的一代[①]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则宣告:"自由的爱将拯救世界。"承认世界需要救赎,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探明,情感和慈善是否足以将其实现。

作为本章收尾……

阴茎:1998 年,加布里埃尔·科恩-本迪特(Gabriel Cohn-Bendit)出版了一部批判阴茎至上论的小册子,极具攻击性,呼吁同胞们不再插入,代之以爱抚和吸吮。伟哥的横空出世让这位疲软斗士愤怒不已。[②]

① 垮掉的一代,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出现的一种颓废文学流派。——译注

② 《解放报》,1998 年 10 月 15 日。

男性的站立排尿:有些德国女权主义者在厕所里张贴布告,要求男性坐着排尿,抛去阴茎傲慢。

"我爱你"的表述:"Je t'aime = Je t'ai"——我爱你等于我有你,你属于我,你是我的。这种陈述代表了"爱情监视的泛化",重现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①] 仍然是"我爱你"的表述:吕斯·伊里加雷(Luce Irrigaray)称应该用"J'aime à toi"来代替,拒绝传统的宣言中将对方兼并的含义。"J'aime à toi"因此意味着:我围着你转,既不把你当作直接的对象,也不把你当作间接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我应该围绕我转,从而靠回归到自我而维持"向你"(à toi)的状态。我不是把你当成猎物——你成了我的— 我的意图是尊重我的天性,我的过去,我的意向性,并同时尊重你的。[②]

两件式泳衣:2007 年,瑞典女权主义者要求能够在公共泳池不穿胸罩,呼吁人们将女性身体上的这个部位去性别化。从他们的视角看,男性的胸部为什么不戴胸罩,或者,在穆斯林国家,为什么不强迫男孩戴面纱,以保证公平?

同性恋:基督教联盟是美国右翼宗教人士的团体,他们出资在报纸上做了一次公共宣传,想要"治疗同性恋"。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成功率,也不知道那些"重蹈覆辙"的人要面对怎样的命运。

PACS(即民事互助契约,于 1999 年由若斯潘政府投票通

① Vincent Cespédes,《解放报》,2007 年 11 月 8 日。

② 《我爱你》(*J'aime à toi*), Grasset, 1992,第 172—173 页。

过。它引起了右派的游行示威，游行者举出了这样的牌子："脏基佬，下地狱"，"烧死基佬"）；PACS 的反对者认为它会瓦解家庭秩序："原本建立在家族秩序基础上的法律，让位于一种继承自纳粹主义的享乐主义逻辑。"①

一见钟情：我们要责怪的，完全是现代的爱情观，因为它的表述十分粗俗，但却用的是一种非常透明的方式，比如"一见钟情"②、"蜜月"之类拙劣的气象用语……还沾染了革命之最肮脏的讽刺。③

浪漫主义：不要再相信"爱情是自然的，是浪漫的，不要再相信固定的性伴侣、占有、排他、嫉妒、性忠诚等等是爱情的证明"；必须超越"性别和性取向的划分，让新的身份产生"并"看到其他的能量"。④

婚姻，一夫一妻……忠诚，繁衍，孩子，家庭性神经症，卖淫，同居，"吵架，歇斯底里，威胁，要求，暴力，仇恨，厌恶，嫉妒，愤怒，疯狂，狂暴，在爱情关系中的激烈行为都悲剧性地源于一种特别的消极内核，一种打扮成多种形式的死亡冲动，所到之处无不被它沾染"。⑤

① Pierre Legendre，《世界报》，2001 年 10 月 23 日。

② 法语直译有触电之意。——译注

③ André Breton，《疯狂的爱》，前揭，第 76 页。

④ "新的爱情准则"，Serge Chaumier，《解放报》，2001 年 2 月 14 日。

⑤ Michel Onfray，《爱情身体理论》（*Théorie du corps amoureux. Pour une érotique solaire*），Biblio-essai，2000，第 26—27 页。

避孕套："基督徒谴责我们通常称为'爱情'的谎言……我们拒绝将爱情降格为彩纸或者荧幕上的猴戏，降格为乱交。我们拒绝浪费生命的虚假爱情。我们不要塑料的爱情，也不要塑料里头的爱情。"①

色情："即使是希特勒也没想到将性变成一种谋杀工具，就像今天色情产业所做的那样。"②色情可以说是一种"种族屠杀的工具"，"闯入卧室与人睡觉还受到庆祝的达豪集中营"。③

嫉妒，占有，排他性：在一对夫妇之间，"任何一人与第三者的性关系，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愉悦而舒适的体验，是伴侣能够在心理乃至肉体上分享的。"④

而我们是否能够一次性地撇开自己想要与其脱离关系的人呢？

---

① Jacques de Guillebon 和 Falk Van Gaver，《爱的新秩序》（*Le Nouvel Ordre amoureux*），L'oeuvre sociale，2008，第 139—140 页。

② Catharine Mc Kinnon，引自 Katie Roilphe，《早晨之后》（*The Morning After*），Little Brown，New York，第 141 页。

③ Andrea Dworkin，1981，引自 Lynn Segal，《好色的眼神，女人，色情文学，权力》（*Dirty Looks，Women，Pornography，Power*），BFI Publishing，Londres，1993，第 12 页。

④ S. Heck 和 P. Heck，《开放婚姻的乐趣》（*Les Joies de l'open marriage*），Montréal，Select，1976，第 160 页，引自 Serge Chaumier，《爱的断裂》（*La Déliaison amoureuse*），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巴黎，2004，第 294—295 页。

第十章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拖鞋

不论坏人做了什么坏事，最为有害的坏事是好人做的坏事。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被爱，真正的被爱是多么累啊！成为他人情感的包袱是多么累啊！是让一个想要自由，永远自由的人去跑完责任的漫漫长途……被迫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去考验某些事物，即使没有真正的相互性，必须同样去爱一点，这又是多么累啊！

——夏多布里昂

这是一个特别的场景，发生在1917年，而且还引来了众多人评论：年轻的埃马纽埃尔·贝尔(Emmanuel Berl)前去拜访他

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要向他汇报一件妙事。他所爱的年轻姑娘西尔维娅，虽与他在四年前就没了来往，近来却积极地回应了他的求婚信。年轻的贝尔激动地要向普鲁斯特证明，他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是错误的，“调谐的心”是存在的。[①] 但这位认为爱情不过是“幻觉中的手淫”、是玩弄男性的诡计的作家，对他年轻朋友的看法嗤之以鼻。他首先向贝尔宣称，对你而言，西尔维娅如果已经死了才更好；那样你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悲伤，但相比之下情感不可避免的沦落其实更为残酷。写着写着，他发怒了，几乎要开始践踏他们的友谊。他向贝尔投以刻薄的语言，向他描绘了如下生活：“那些堕落的男人，与伴侣同床共枕20多年，却不知道她一直在骗他，恨他，失信于他，不论是对孩子的缺点还是妻子的恶习都视而不见。”他的愤怒加剧了，向贝尔投以“责骂和拖鞋”，并命令他滚出去，仿佛在驱逐一个肮脏汉。

(1) 看破真相的天真

我们可以把这段故事看成是经验与单纯的交锋：普鲁斯特，这位警觉的道德家，揭穿了所谓灵魂结合的幻象，而贝尔则因为

① Emmanuel Berl，《西尔维娅》(*Sylvia*)，Imaginaire，Gallimard出版社，1994，第127页及以后。

无知还对此执迷不悟。但如果将这事反过来呢？如果普鲁斯特式的恶言恶语只不过是一种倒置的理想主义？如果清醒的外表事实上隐藏了极大的盲目？看破真相也是幻想的一部分，因为它出现在了普鲁斯特的所有作品之中：每个页面上他都固执地谴责情感是骗人的把戏，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他也许从来没想过其中缘由，而看破红尘的智者本身也生活在一个圈套当中。他的那种近乎吹毛求疵的敏锐感觉，重新唤起了他意图击垮的幻兽：既然我们是在黑夜中行走，我们唯一的伟大，就是揭露出我们缺乏伟大。以一种不属于此世界的完美来贬低我们的行为，正是怀疑哲学(philosophie du soupçon)的暧昧之处。《追忆》作者的大型拆除工事无意间描绘出了一种无可指责的人类的图景，这与他鼓吹的理想相符。我们需要回到最后一个幻觉上来，即揭穿爱情是幻觉的幻觉。

爱情的赞颂者走的也是相同的路子。且读读那些伟大的论著，从柏拉图的《会饮》到圣弗朗索瓦·德·萨勒、费内隆、西蒙娜·韦伊直至当今作家们的说教：它们确实很令人佩服，但却都被真理的教条主义所萦绕。他们划分、劈砍出三六九等，确定了好坏的等级，从而贬低我们当前的生活。他们赞颂特别的爱情，为的就是更好地贬低寻常的爱情。当道德家想要我们懂事的时候，那些阿谀奉承者却一个劲要我们越界。一边是祛魅的专家，另一边是满口绝对真理的教授，他们将我们推向了或全有或全无的选择。相信他们也就是相信，“真爱”是一片浩瀚的奇迹海

洋，在海洋的边上，有的只是笨拙的尝试，有的只是人类的悲惨。将梦想中的情感理想化意味着贬低切身经历的情感。也正是在理想化之中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基督教划分方式，一方是神圣的爱筵，即免费的礼物，它无边无际；另一方是人的情欲，被私欲所玷污，应该从人身上消去；消去的方式则是某种升华的运动，让人得以配得上上帝。① 以一种不可触及的终极归宿为名义，他们引诱我们去诽谤我们笨拙的结合，而不是去承认爱情不过是我们在卑微的当下所体验到的，不稳固但却壮丽。

在这个领域，我们被崇高的神话腐化了：长期以来我们的做法就仿佛认为，阻碍爱情光彩绽放的只是某种道德、政治或者宗教性质的障碍。障碍已经倒塌，爱情显露了它的本质：矛盾性，令人钦佩，也令人可怜。它同时也是自身走入歧途的历史，不论在它漂泊还是巅峰时都是如此。巴尔扎克、福楼拜还有左拉都做过浪漫主义的傻事，在诗歌的气息下揭示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里头贪婪与野心的力量在兴风作浪。不过，带着十足的资产阶级犬儒主义，巴尔扎克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位高老头，他能够为讨厌他的女儿们牺牲乃至死亡。福楼拜笔下的夏尔·包法利在妻子死后，偶然碰到了妻子的情人鲁道夫，从他的脸上追忆起

① 例如：“爱情比任何时候都有待我们重新发明。有那么多丧失了的能量，被践踏的希望，被欺骗的灵魂……我们如何能相信，爱情不过如此，也就是这个时代所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如何接受这样一种重新粉刷？”(Jacques de Guillebon et Falk Van Gaver，《爱的新秩序》，前揭，第148页)

了妻子的光影和热情。左拉小说中的缪法伯爵，躺在旅馆门口的石椅上，心绪难以平静。她的情人，让他倾家荡产、让他出丑的臭名昭著的妓女娜娜，此时正因为一种恐怖疾病的侵袭而处在垂死边缘。文学当中的一大教训：人类的未完成状态是无尽动荡的起源，它是让人类灵魂降落到低谷，同时也让它走向伟大的抬升动力，因为它让每个人都有了改善的可能。

（2）情感凌乱

现在的人与人之间，用"你"称呼已经普遍化。在企业和媒体中人们习惯于直呼别人的名字[①]；在地中海国家，男人普遍会相互拥抱，随后像黑手党似的再紧紧拥抱一下；商业广告不断向我们表达幸福的祝福，电视上、电台里泪水充盈，所有人都相互亲吻、抚摸、牵手，开始冗长而凌乱的告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情感歇斯底里的时代，打碎了古老的礼貌法则。我们大可以相信，一股史无前例的情感浪潮侵入了我们的社会，即便它之于真正的礼节就如同人造香味之于天然芬芳。不过，将多愁善感看作是一出喜剧，看作是遮挡更残酷的社会关系的屏风，或者粗野之人的神经

① 这让人想到时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以马内利修女。她品德高尚，为开罗的拾荒者奉献一生，今天正要被封圣。她会在各种节目里向所有在场的人喊："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过敏也许都不确切。首要而言，它起源于现代城市塑造出来的人为性质的关系，那时是 18 世纪末，欧洲正在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中失去平衡。它要模仿出一种缺失的凝聚力，而同时，宗族、家系、团体的纽带，已经被由利益和矜持所支配的礼节所取代。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情感性便确立了下来，打破了旧制度时候上至国王下至农民的那种同盟和相互性的巨大链条。血缘、宗教身份、种族不再是共同体和民族的唯一基础，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契约。原本是自由的东西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关系冒着崩溃的风险而被不断重新加热。集团、村庄、家庭内部享受的团结原本是要以自由缺失为代价，而从今往后，我们需要重申且近乎玩弄这种团结性，时不时都有落入放纵的危险：这种约束已经不再见得到了，除了在美国，一些完全陌生的人会向你展示泛滥的温情，而很快又会将你忘记。这种做法的精髓就在于展现自己的热情友好，像武术一般运用好感和信任。微笑的作用是与他人保持距离，或者是在和蔼的外表下将他们杀死。当代人的赌注：同时拥有个人自治和集体凝聚力，而不放弃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由此人们无时不刻地想要逃出利己主义，向他人伸出援手，从而改善我们堕落的状态。我们因此表现出了一种形状多变的"仁慈"，玩转于自愿主义和间歇性的两个音区之间：我们很快就会为某个事业燃起热心，但也很快就疲倦。而之所以鼓励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今日的理想是共享，而在古典时代，在一个等级社

会，所有的规则中最主要的便是等级分明的理想，以及反对无耻融合的维持自身身份的原则。我们生活在一种情感和情欲双重下流的时代，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和洛可·希佛帝（Rocco Siffredi）的婚礼，粗俗和可笑、少女文学（chick lit）和垃圾文学的同时胜利。公共舞台上情感与性双重喷发，做作与粗放共掀狂风。矫揉造作的文字与色情产品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一边流淌着的是泪水，另一边是各种体液。但 X 的永恒狂欢在理想主义上并不逊色于言情文学的那堆废话，它们都将人类的冒险化为单独一个维度：一颗悸动的心，或是整套生殖器官。它们都是从柔情或者动物性来追求崇高。一方面是蜀葵那般愚不可及的天堂，另一方面是疯狂的交尾。它们都传递着一种相同的对贞洁的追求，因为这种贞洁我们不再去爱，而因为超凡入圣和淫乱、阴茎勃起和恋人絮语的混合而神智错乱。

（3）距离的伟大

今天，爱情与幸福一道，成了西方通行的意识形态，成了我们的世界语，一切都打它下面过，好意恶意都披着同一件外衣。[①] 它

① 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仅举一个，比如 Edgar Morin 所定义的"文明的政治"。这位社会学家呼吁"改变数量的霸权，从而提升质量和不可计量物（如爱情和幸福）的地位。"（《星期日报》，2008 年 12 月 28 日）

越是空洞，便越是令人生畏，足以停止任何我们想要进行的讨论。在文学、歌曲和电影里，谁不借用这个概念，谁不认为它是消除我们烦恼的奇方？我们以爱的名义去惩罚，去实行暴政，家庭中我们为了孩子"好"，一切用的都是亲密的语言，是面对面的，是热烈的贴近。爱情在演说中越是普遍，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争端，它就越需要靠它唯一的武器来仲裁：教育，劳动关系，政治，城市生活。

然而，联结人类、确保代际延续、巩固一个社会的，并不仅仅是爱：它不能消除那些社会或者文化层面的决定因素，也无法取代那些负责为短暂的情感烙上时间印记的制度。能够战胜仇恨、愤怒、杀人疯狂的，并不是爱，而需要靠的是理智和民主，给它们以舒缓的渠道，并防范它们的毁灭性的统治。能够激发起慷慨或者同情的，更不是爱了，帮助不幸的人不一定要去爱他们，对于饥饿的人，受折磨的人也是如此，我并不需要出于爱而施舍他们钱财或者物质支持。[①] 为了让情感之类的

① 还有一种爱德是爱贫困，这个概念比帮助穷人脱离困境的意志更为模糊不清。我们因为穷人要我们帮助而高兴，因而成了某种靠悲惨为食的蟑螂。且看特蕾莎修女这段非常模糊的话："您要知道我是多么全身心地沉浸在这绝对的贫困当中。我等待残疾人，瘫痪的人，身患绝症之人。我想要成为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的妻子。不是那个荣耀或者降生的耶稣，而是那个孤独、裸身、满是血污的耶稣。"这里，基督教的痛苦主义与对贫困的渴望合二为一，而后者的作用是赋予贫困对抗者以价值。不幸的人不过是伟大的灵魂展示自己的高贵、获得拯救的一次机会。

东西在人与人之中显现，风俗、政府和国家应当提出另一套逻辑，不能仅仅服从于出于一时狂热或者永恒不变的原理而制订出来的法则；他们应该成为永恒性、公正性和灵魂平静的化身。这是因为社会并不完全会因为柔情而使它的公民优雅地抛开矛盾，沉溺于相互关心之中。用爱这小小的尖头来维持社会秩序，希望从此消灭下流和不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应当在一定的自治之下维持情感秩序，而不是将后者与一切混为一谈。

是爱情创造了近邻，瑞典哲学-神学家史威登保（18 世纪）曾这样说道。这句话看似响亮，但却是错误的：因为不论我爱他们与否，近邻总是存在的，我们生活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之中，他们嘲笑我们的孤独，而且一心只想着能不受干扰地忙自己的事儿。我们并不认识所有的人，大多是街头偶遇，他们的所有这些面庞，都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让我去爱他们（列维纳斯），去为他们服务。我与他们之间保持着符合礼貌的距离，我也丝毫不想去害他们。保持好意的中立性应该是一切集体存在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在家庭，首要的命令是协助，同时也有安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对所有人都有益。集体生活的一大美德，首先即回避，也就是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不伤害原则”（no harm principle）：不干涉，不伤害，不侵犯他人生活。我通过冷漠乃至过敏拒绝与同胞们建立从礼貌到激情的任何一种关系。最关键的是保持良好的间隔，在侵入和抛弃之间寻找

中庸之道，在个人相互扩张时建立起保护个人的屏障。司汤达将社会定义为最初彼此冷漠的人相互给予对方的愉悦。政治生活的一大乐趣：让陌生世界交错到一起，漫步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对过渡和转变感到愉悦，而不做任何群体的奴隶，避开社会的同系交配和血缘宿命。当人组成的集团相互侵犯、相互发泄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窒息的呢？这已不再是亲友的社会，而是一个白蚁巢。

（4）等待的智慧

有那么多政要或元首使用爱或者幸福的说辞而丝毫没有受到嘲讽的顾虑——这如何不让我们惊讶呢？从呼喊“社会主义是爱”的雨果·查维斯到 2007 年 3 月在卸任致辞中向我们解释他有多么爱我们的雅克·希拉克，[①]再到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塞格林·罗雅尔 2007 年在巴黎夏莱蒂体育馆的一次集会结束时提出这样一条福音般的倡议：“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已经更接近于 68 年的精神了）。我们自然也不会忘记现任法国总统

---

① 你们无时不刻都占据着我的心灵和精神。为了这个伟大的法国服务，我从未敢有丝毫怠惰。我爱这法国就如我爱你们（雅克·希拉克告别演讲，2007 年 3 月 11 日）。如果回顾一下 1995 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告别致辞：“我不会离开你们，我相信精神的力量”，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措辞有着一种克制，来源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矜持的时代。

的情感政治，他跑到负伤者的床头探望；还有托派领袖奥利维·贝赞司诺(Olivier Besancenot)的演说，他引用了切·格瓦拉的格言："坚强起来才不会丧失温柔"(这句话是矛盾表现的极好例子：革命者没有怜悯的爱，为人类的至上幸福而消灭敌人)。我们不再是领导人民，我们哄骗他们，抚慰他们，我们用亲密关系、用亲子式的吸引和他们连在一起。这样做本身并不坏；它没有展现出自己真实的面目，即一台谋取利润的机器，而是自称喜悦之城、"建构意义的场所"，声称要征服灵魂的非物质领域，取代正当，取代学校，取代大的宗教。某些大元首的教导可以被看作是无节制的饕餮——不是在财务层面，而是在象征层面。他们以新的立法者自居，解释公众良心，创造各类格言。每当一个政府、一个体制、一个大领袖沉溺于情感的酒精，那么离他们做出坏事也就不远了。

20 世纪是布尔什维克版本的利他主义武装起来的世纪，它急于为人类谋求幸福，但却落入了大规模谋杀的漩涡。但是，西方民主国家也并不逊色，它们同样以干涉权的名义向这一世界性的改宗让步。我们假设我们的价值观是全球性的，但却枉顾许多国家仍然丝毫不为所动的事实(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等)。对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我们摆出了那么明显的漠视态度，而 1993 年的索马里和 2003 年伊拉克却是过度干预，我们声称要解救遭受饥饿或者独裁统治的人民，而不顾他们的意愿。我们满足于打击攻击我们的人，不愿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支援宣称支

持我们原则的人(比如今天的伊朗反对派)，在其他地方又支持某些权利的延伸。但是，想要用产钳在世界各地催生民主制度，用枪炮强行推广只会让民众毛骨悚然。某些非政府组织也正是受到这种对至善的迷醉的推动。这些组织摆出以爱心帮助受苦受难者的姿态，有时候他们的感情甚至可能是煽动性的，足可以杀死他们声称要帮助的人：且看 2007 年佐伊方舟在达尔富尔做的荒诞之事，他们试图将 103 名儿童从乍得偷渡入法国，好让他们逃离悲惨的苏丹，而这些儿童其实既不是孤儿，也没有受到威胁。

那些想要看到在喀布尔或者利雅得建立起当地版本的西方议会制度的人，应当以耐心为武装，也要懂得审时度势。许多国家仍然生活在专制和暴力的桎梏之下，这确实会让我们感到遗憾；但我们应该承认，人类的各个不同部分总是存在不同。自由并非一场圣战，它是一个建议。如果有千百万人拒绝了自由的邀请，是因为自由不符合他们的胃口，应该对之作重新的表述。更好的是去言传身教，而不是武力灌输。在冲突与和平之间，有一块灰色地带叫做政治智慧，它既回避碰撞，也不是断然隔绝。唯一算数的战争，根本上讲，也就是启蒙运动以来我们所知的观念的战争。观念的战争日夜不断，以和平的方式消除不平等，打破等级制。唯有观念的战争，而不是拷打或者轰炸，才能够深刻地改变人的心态，改善妇女和儿童的条件，让信徒们宽容地践行自己的信仰，修正他们圣书里最具攻击性的那些表述。但这场

战争有个缺陷：它是漫长的，非一个立法所能及，它代代进行，甚至要经历几个世纪。观念的战争通过教育、书籍和辩论，需要运用理性和雄辩为武器。把对自由的追切渴望与等待的智慧结合起来。

(5) 想要做好人是可怕的(贝尔托·布莱希特)

因此，我们需要约束住爱本身具有的贪欲，克制住它征服新的选民的倾向。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限度，承认自己在公共领域无法解决一切的时刻到了。也许，爱创造了不少奇迹，但它从未实现过让人类相互和解的奇迹。它甚至有可能造成比它声称要治疗的罪恶更坏的结果。各个宗教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们总是将他们在现世承诺的慰藉推到彼世，比如"爱比死亡更强大"：那些最终能够证明宗教教义的人是不可能告诉我们的，他们不可能从九霄云外降下，来向我们做担保。沉醉、狂喜和喜悦即使能够动员起一座城邦，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将其建立。让人与人在一起的，是一种归属感，一个价值观的共同体，一个大家共享的文化，大家共同克服的危险，对最弱小者的共同关怀。一个只根据互爱的逻辑统一起来的世界纯属乌托邦，只可远观，却不可付诸实施。靠它来消灭冲突和不平等是危险的。这无异于把赌注压在"普世同情"(sympathie universelle，傅立叶语)上，而同时却知道它处在不可触及的视野里。

"因为缺乏爱，人类已经疯狂了"，西蒙娜·韦伊说道。地球上的爱不够，而基督教哲人马克斯·舍勒走得更远：所以一切不过是数量问题，范围问题。需要向我们可怜的人类注射大量的情感，就好比为了让银行更好地运行而向其注射流动性一样。但以爱情名义相杀，未能消除杀戮的事情屡见不鲜。这纠缠不休的亲密主义反面是节制，审慎，是超然于世、遗世独立、不向同时代的人宣泄既张扬又短暂的情感的能力。让我们重申：与其用对第三者的仇恨强行将个人聚到一块儿，不如放自由给个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必要懂得，残忍是可以从所有花朵汲取蜂蜜的(包括最慷慨的花朵)，而对田园诗的狂热与出于蔑视的狂热具有同样的威力。不论某种美德有多么令人钦佩，也不要让它来统治人类家庭，以免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爱的意识形态作为民主时代一切不确定从属关系的隐喻，它不能取代政治意识形态，而后者本身源于神学时代。不再把爱视为人间救赎的宗教，才能更好地将它作为私人幸福的奥秘来称颂。让我们只把这个词用在亲密关系里：爱国家，爱人民，爱被剥削者，爱人类，都太过华而不实，难免令人怀疑会不会被挪作他用。将级别区分开来的做法一旦得到承认，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寻内心，追寻吸引所带来的无序冲动。

身体，巴洛克式的小古董

60年代的年轻人曾以身体的名义掀起暴乱。而今天看来，身体与其说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受到了管制，切割成了有规则的形状。从儿时起身体就是受无情监视的对象，我们表面上歌颂身体，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报复它，将它修剪成一座法式庭园。且看欧洲的一些女性或者男同性恋，他们倾向于全身脱毛：不论是腋下还是其他地方，毛发都要小心翼翼地清除，就仿佛是在消除某种中世纪的残留，而梦想着找回婴儿般的肌肤。我们会发现，同样是这个鼓吹人在床上要有兽性的社会，也是一个要将毛发、将皮肤上的动物性消灭，将体味视作犯罪，想要给我们磨皮、擦亮乃至消毒的社会。谁还胆敢展露腋毛一定会招致不幸。汗水浸湿的毛发，阴毛茂密的耻骨、工兵的罩衫，在高贵的鼻子面前散发臭气的难民，所有这些都以体面、以卫生的名义消失了。

悲剧和魔法维度下的身体，以及它的分泌物、体液和腐烂，我们可以在今天某些法国女性文学中找到（Catherine Cusset, Claire Legendre, Lorette Nobécourt, Claire Castillon, Nina Bouraoui）。这是我的灵魂，蒙田以来的经典作家曾这样说。这是我的性别，当代自传体小说高手这样说，仿佛女性的性别首先对于女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谜。比如，说人肥胖是个忌讳，而时

尚却在推广那些又瘦又高、着装华丽的女性。瘦骨嶙峋的时装模特的胜利，纯粹的垂直生长，这是贯穿我们时代的那个脱离肉体的梦想的图样。逃离物质世界同时也引爆了厌食和肥胖。身体用它的纠正机制给予报复，它或是完全消灭了脂肪，或是让它迅猛生长；它让自己缩小或是膨胀。厌食症的谜题就在于，为了让人超越躯体的宿命，它使得人的骨架一览无余，骨瘦如柴得让人想到尸体。它自称是天使，是纯净的精神，而其实是有生命的死者，是尖锐骨头的堆砌。

这也就是为什么身材圆润，处在肥胖和清瘦之间的阶段，似乎是身体最可欲的状态。它是身体的某种华章，闪闪发光，充盈而自然，肉体向各个方向生长。当超重的人因为体型不佳而失去性感的时候，身材圆润的人突出着自己的性感。圆润的面颊令人回想起童年，凸起的腹部，结实的大腿，这样的体态引人爱抚和触摸。体重和肉块的和谐分布兼具了优雅与大度：且看美国画家罗伯特·克鲁伯（Robert Crumb）作品中强健女性的风味，比如有发达腿肚的强壮女生。真正的美不是遵循教条，而是体貌那令人晕眩的多样性。欲望喜欢多余的肉，喜欢丰满，它更喜欢某些器官的怪异，后者正因为自己的过度生长而吸引人：异常巨大的臀部，丰满的胸部，特大的生殖器。身体由此走入了神话的维度。它也许会失去控制，因肥胖而变成柔软的巨人，也会变成健身者那凸起的肌腱，令人想到经典的被解剖者的形象（一个肌肉极其壮硕的运动员是一个没有皮肤的存在，好比是一个

翻过来的手套)，甚或在跨性别者那里出现短路：拥有女性生殖器的强壮男子，有阴茎的女人，胸部丰满的大力士。我们是在哪里看到身体的？不是在杂志，不是在模特的行列，而是在街上，在海滩。夏天是宝藏揭开面纱的季节，身体外面只覆盖了薄薄一层裙子或者T恤。我们让这些令我们惊讶的隆起，这些巴洛克式小古董黏住自己，而它们不受任何美与丑、常规与异常的标准所评价。

在爱当中，物质的充盈并没有害处。

尾　声

别为表现真我而害臊！

欲望的解放者和良好风俗的维护者有着相同的执念：去治疗别人。有些人对他们的禁忌情有独钟，另外一些人则向往享乐主义的社会。但是，我们的激情仍然在反抗着进步主义圣经的劝说，反抗着守旧主义圣经的抨击。我们的激情并不在乎自己是否道德，是否符合历史的意义而径自绽放。我们不会回到女权主义的已有成果上，但我们也不再会用古老的法术（如一见钟情，长相厮守，忠贞不二）来终结前者。爱没有生病，它有深渊也有壮丽，每时每刻都展现出它应该有的全貌。它依然是我们无法掌控的那部分存在，难以收编，对意识形态免疫。我们无法挽救它造成的创伤，无法纠正它所实施的排斥：它一直是不纯粹的，同时用金子和泥浆做成，是一道暧昧的魔法。我们应当从它那里保留住它最好的东西，它的活力，它编织人际纽带的能力，它对生活富有激情的认可，既精致又痛苦，并且在无尽的谜题中

寻找某种可能答案的魅力。爱情的智慧,心灵的神圣,对私人领域的超越,18世纪以来,将这种情感并入理性、理智或者伦理的圈子里的诱惑非常之大。不过,我们没必要给它戴上那么多桂冠:它足以为自己辩护。男人和女人的自身条件可以发展,个人有可完善性,而爱是没有进步的。它将永远出人意料。对于这个刚开始的世纪,这是一条好消息。

生命走到暮年,我们开始怀疑有时候是不是做错了。我们未能有合适的话去抚慰需要它的朋友和需要我们照顾的孩子,我们曾抛弃了一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伤害了我们珍爱的人。我们时而软弱、吝啬,时而又崇高、慷慨。这就是心灵的丰富之处,即使在再卑微不过的地方,心灵也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超越自我。对于那些正在担心受骗或者受嘲笑的人,我们需要重申:不要为你们的自相矛盾感到羞耻,也不要为表现真我而害臊,不论是天真、多愁善感、忠诚还是水性杨花。别被吓住了!通往喜悦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

我们尽可能地去爱,也就是说,不完美地去爱。

"轻与重"文丛(已出)

01 脆弱的幸福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孙伟红 译
02 启蒙的精神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马利红 译
03 日常生活颂歌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曹丹红 译
04 爱的多重奏　[法]阿兰·巴迪欧 著　邓刚 译
05 镜中的忧郁　[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郭宏安 译
06 古罗马的性与权力　[法]保罗·韦纳 著　谢强 译
07 梦想的权利　[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译
08 审美资本主义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 著　黄琰 译
09 个体的颂歌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苗馨 译
10 当爱冲昏头　[德]H·柯依瑟尔 E·舒拉克 著　张存华 译
11 简单的思想　[法]热拉尔·马瑟 著　黄蓓 译
12 论移情问题　[德]艾迪特·施泰因 著　张浩军 译
13 重返风景　[法]卡特琳·古特 著　黄金菊 译
14 狄德罗与卢梭　[英]玛丽安·霍布森 著　胡振明 译
15 走向绝对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朱静 译

16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
[法]保罗·韦纳 著　　张竝 译

17 图像的生与死　[法]雷吉斯·德布雷 著
黄迅余　黄建华 译

18 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
[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张亘　夏燕 译

19 伊西斯的面纱　[法]皮埃尔·阿多 著　　张卜天 译

20 欲望的眩晕　[法]奥利维耶·普里奥尔 著　　方尔平 译

21 谁,在我呼喊时　[法]克洛德·穆沙 著　　李金佳 译

22 普鲁斯特的空间　[比利时]乔治·普莱 著　　张新木 译

23 存在的遗骸　[意大利]圣地亚哥·扎巴拉 著
吴闻仪　吴晓番　刘梁剑 译

24 艺术家的责任　[法]让·克莱尔 著
赵芩岑　曹丹红 译

25 僭越的感觉/欲望之书
[法]白兰达·卡诺纳 著　　袁筱一 译

26 极限体验与书写　[法]菲利浦·索莱尔斯 著　　唐珍 译

27 探求自由的古希腊　[法]雅克利娜·德·罗米伊 著
张竝 译

28 别忘记生活　[法]皮埃尔·阿多 著　　孙圣英 译

29 苏格拉底　[德]君特·费格尔 著　　杨光 译

30 沉默的言语　[法]雅克·朗西埃 著　　臧小佳 译

31 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
[法]娜塔莉·海因里希 著　　何蒨 译

32 爱与公正　[法]保罗·利科 著　　韩梅 译

33 濒危的文学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栾栋 译

34 图像的肉身　[法]莫罗·卡波内 著　　曲晓蕊 译

35 什么是影响　[法]弗朗索瓦·鲁斯唐 著　　陈卉 译

36 与蒙田共度的夏天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刘常津 译

37 不确定性之痛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王晓升 译

38 欲望几何学　[法]勒内·基拉尔 著　　罗芃 译

39 共同的生活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林泉喜 译

40 历史意识的维度　[法]雷蒙·阿隆 著　　董子云 译

41 福柯看电影　[法]马尼利耶 扎班扬 著　　谢强 译

42 古希腊思想中的柔和
[法]雅克利娜·德·罗米伊 著　　陈元 译

43 哲学家的肚子　[法]米歇尔·翁弗雷 著　　林泉喜 译

44 历史之名　[法]雅克·朗西埃 著
魏德骥　杨淳娴 译

45 历史的天使　[法]斯台凡·摩西 著　　梁展 译

46 福柯考　[法]弗里德里克·格霍 著　　何乏笔 等译

47 观察者的技术　[美]乔纳森·克拉里 著　　蔡佩君 译

48 神话的智慧　[法]吕克·费希 著　　曹明 译

49 隐匿的国度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杜蘅 译

50 艺术的客体　[英]玛丽安·霍布森 著　　胡振明 译

51 十八世纪的自由 [法]菲利浦·索莱尔斯 著
唐 珍 郭海婷 译

52 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
[意]帕特里齐亚·隆巴多 著
田建国 刘 洁 译

53 什么是催眠 [法]弗朗索瓦·鲁斯唐 著
赵济鸿 孙 越 译

54 人如何书写历史 [法]保罗·韦纳 著 韩一宇 译

55 古希腊悲剧研究 [法]雅克利娜·德·罗米伊 著
高建红 译

56 未知的湖 [法]让-伊夫·塔迪耶 著 田庆生 译

57 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
[法]雅克·勒高夫 著 杨嘉彦 译

58 列维纳斯 [法]单士宏 著
姜丹丹 赵 鸣 张引弘 译

59 品味之战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赵济鸿 施程辉 张 帆 译

60 德加,舞蹈,素描 [法]保尔·瓦雷里 著
杨 洁 张 慧 译

61 倾听之眼 [法]保罗·克洛岱尔 著 周 皓 译

62 物化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罗名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悖论/(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著;董子云,朱珣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7633-9

Ⅰ.①爱… Ⅱ.①帕… ②董… ③朱… Ⅲ.①婚姻问题—研究—中国 ②恋爱—研究—中国 Ⅳ.①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117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爱的悖论

主　　编 姜丹丹
著　　者 (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译　　者 董子云 朱 珣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633-9/B·1125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